

• 585422

137-8
56382,3
F.8 4.2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第 八 辑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二分册

(美)包华德主编

沈自敏译

林东民校

7-8
382,3
4.2

成都师范学院图书馆
基本馆藏

中 华 书 局

1980年2月

数字资源
PDG

585422

137-8
56382;3
T.8.42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137-8
56382;3
T.8.42

译 稿

第 八 辑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二分册

(美)包华德主编

沈自敏译

林东民校

(征求意见稿)

中 华 书 局

1980年2月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第 号

第 号

民国名 辞典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

中华书局排印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中国书店代发

北京体育报社印刷厂印刷

1989年2月印刷

定价0.75元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编印凡例

一、编印《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目的在于组织协作，征求意见，反映工作进展情况。

二、《丛稿》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负责编辑。

三、《丛稿》专登有关中华民国史资料一类的稿件，供历史教学、研究工作参考每辑字数不定。

四、所有中华民国史初稿及其所附资料，一般都先在《丛稿》登载，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改为定稿。但《丛稿》登载过的稿件，将来《中华民国史》一书及其所附资料不一定全都编进去。

五、欢迎投稿，但只限于中华民国史及有关资料。

六、欢迎对《丛稿》提出批评意见。

七、译稿如引用，请核对原文。

目 录

张道藩	(1)
张作霖	(3)
张宗昌	(12)
章宗祥	(17)
张资平	(20)
张元济	(21)
赵尔巽	(25)
赵恒惕	(27)
赵元任	(30)
陈 诚	(36)
陈济棠	(45)
陈其美	(49)
陈嘉庚	(51)
陈锦涛	(57)
陈庆云	(60)
陈炯明	(61)

陈友仁	(69)
陈衡哲	(74)
陈光甫	(79)
陈公博	(85)
陈果夫	(91)
陈立夫	(97)
陈 篆	(104)
陈铭枢	(107)
陈璧君	(112)
编者说明	(115)

张道藩

张道藩(1897——)，在南京和重庆担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高级职务，1942年曾随同蒋介石访问印度，1952—1959年在台湾任立法院长。

张道藩，贵州盘县人，他的家庭是贵州有名的世代书香之家。张道藩出生前的约一百年中，他家族里出了六名进士。张道藩的祖父于三十二岁时死去，家道因而中落。张道藩的父亲虽是个博学之士，但却屡试不中，找不到机会象他的祖先那样当官作吏。张道藩从他的父亲习读中国典籍。1911年当他在本地高小读书时，通过他留学日本的亲友寄回的报刊而接触到当时的激进知识界的思潮。

张道藩于1914年毕业后，无力继续上学，1915年2月，十八岁时受聘在附近的普安县一所私立初小教书。他在高小毕业时名列第一，所以能教数学、音乐、绘画、书法等各种课程，只有体育课使他感到为难。

那时他已与秘密的政治活动有间接联系。他七叔是反袁运动的中华革命党成员，委托张保藏本地会员名单和其他文件。1916年袁世凯死后，随同任国会议员的五叔去北京继续上学。他过天津时去拜访他叔父的朋友严范孙，经严之劝，他进了南开中学读书。

1917年6月，国会解散，张道藩的五叔失去了议员席位，无力资助他继续读书。幸而他的五叔祖任察绥烟酒专卖局长，为张道藩在包头分局谋了一个职位。在包头期间，他通过函授学习英语、日语，两年后决定重新上南开读书。他回南开时，正好是五四运动时期，他在课堂上花的时间很少，而用很多精力从事群众鼓动宣传。当时吴稚晖等人倡议勤工俭学，张道藩决定去法国。他不顾叔祖反对，于1919年11月从上海去巴黎。他在上海等船的时候，他和同行的十七名赴法学生，一起得到孙逸仙在上海寓邸的接见。

1920年1月1日抵伦敦后，留英的中国学生对勤工俭学的学生们说，如果法语不流利就很难在法国找到工作，张道藩因此决定在英国留学。他叔祖资助

他进曼彻斯特的一所私立高等学校读了一学期，然后进伦敦一所天主教学院。1921年，他是通过伦敦大学斯来德艺术学院入学考试的第一个中国学生。1924年毕业后，他去巴黎，在全国最高艺术学院学习了两年。

张道藩在伦敦时，曾协助组织过一个工商学（工人、商人、学生）各界协会，其目的在改善华侨的社会生活和文娱。1922年冬，他不参加政治活动的决心动摇了，经刘纪文、邵元冲的劝告，加入了国民党。第二年，他被选为国民党伦敦支部负责人，

1926年4月，他离欧洲回国，6月底到上海。他在上海作了一次关于裸体问题的公开讲演震惊了保守的中国人，因此被逮捕。

广东省政府农工部长刘纪文邀他去参加工作。他离开上海去革命气氛炽烈的广州。张道藩先为刘纪文秘书，1926年秋刘纪文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工作后，张道藩任农工部代理部长。1926年11月，国民党党务负责人陈果夫在一次会议中遇到张道藩，请他去贵州主持党务。张乐于回本省，接受了任务，1927年1月去贵州。当时贵州由一个专横的军阀周西成统治，他禁止国民党在他的统治地区内活动，1927年5月3日张因拒不交出电报密码而被逮捕。1927年9月18日张获释后，没有人再敢庇护他了。他在住医院医治好他狱中所受创伤后，12月离贵州去上海。

1928年2月，经陈果夫、刘纪文推荐张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该部为陈果夫所控制。9月，张任南京市政府秘书长。1929年3月，他以南京代表身份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他因选举程序问题和胡汉民争执而惹怒了胡，他不得不离去南京的工作岗位，任江苏省党部委员。

张于1929年夏任青岛大学教务长，他在山东耽了没有几个月，去浙江任浙江省政府教育厅长。几个月后，陈果夫的兄弟、国民党组织部长陈立夫聘张道藩任副部长。自此，张道藩来往于南京杭州之间处理党政事务。1931年9月，日军侵占东北，学生群众因反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怒而毁捣张道藩在汉口的住宅。张道藩不得不当了替罪羊，辞去浙江的所有职务，去南京任蒋介石的私人秘书。

1932年11月29日，张道藩任交通部次长，以后他还担任了其他部的次长。他在1935年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6年秋，他从交通部调到内政部。1938年1月，他随同他的上司陈立夫进教育部为次长，并协助陈立夫为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副部长。1938年下半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文化运动委员会资历较深的委员。1939年任中央政治学校教务长，那是训练国民党干部的一个最高机构。1941年提升为该校副校长并主持校政，该校一直由蒋介石担任校长。

1942年2月，张道藩随同蒋介石访问印度与甘地和尼赫鲁会晤，在会晤时，蒋夫人任翻译，张道藩作记录。张道藩本人还和尼赫鲁三次长谈，了解印度国大党的组织和力量。1942年12月7日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943年10月调任中央海外部，1943年12月，日军进迫贵阳，他回本省贵州组织民众抗击日军。

1945年，张道藩进入了国民党核心中的最高地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1948年选为立法委员，到台湾后，在1952年为立法院长，1959年辞去院长职，继续任立法委员。

张道藩在国民党中国的文化、文学、艺术组织中还起了领导作用，他有时参加业余戏剧演出，他创作和翻译过几个剧本，例如《赎身》、《密月旅行》、《谁的过失》、《密电码》（电影剧本）、《最后的堡垒》、《真诚的爱国主义》，先后于1934—1937年在上海出版。他还翻译过康斯坦勃的《近代欧洲绘画概要》和桑赫尔的《遗忘了的原因》。

张作霖 字：雨亭

张作霖（1873—1928.6），人称为大帅，统治东北的军事头目。最初，他是奉天地方军的一名头目，1919年后统治了满洲，成了一个独立王国，直到他死去。1924年后他的势力扩展到北京，成了革命军统一全国的一个障碍。后来他的儿子张学良继承了他的满洲统治者的地位。

关于张作霖的早年生活，在1928年他去世不久所编的家谱中提供了一些资料。根据这些资料来源，他生于奉天海城县，行四。长兄幼年夭折，二兄是个土匪被处死，第三个是姊妹。他父亲张有财约死于1882年，他母亲再嫁给村里的一名兽医。年轻的张作霖既出身农家，又未受过教育，当时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出息。

他在二十岁前就开始当兵，隶于宋庆的毅军，参加过1894—1895年中日战争。战后回奉天组织武装防卫本县。他颇有领袖才能，建立了他自己的一支实力充裕组织良好的部队。他在奉天训练地方武装时，和后来当伪满洲国总理大臣的张景惠、吉林督军张作相来往密切。因为他不在清政府的军事编制之内，所以被看作是土匪。

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张作霖的部队成了日军一支非正式的友军，经常袭击俄军。在这次战争中，张作霖增强了军事实力，在南满树立了威望。战后，他和盛京将军赵尔巽谈妥，编其部队为一个团。张作霖从此找到了一个政治靠山，虽然当时并未立即走运。后来，赵调归京师，但于1911年4月又回沈阳任东三省总督。辛亥革命前夕，赵尔巽所统的部队有四十营，分为五路，张作霖为前路巡防队统领，驻洮南府。

武昌起义，赵尔巽从辽源、通辽一线调后路巡防队至沈阳，张作霖感到政治机会来到，他自作主张进驻沈阳。赵尔巽对此默加承认，不久又让他统率驻沈阳铁岭一线的中路巡防队。蓝天蔚统率的第二混成旅发动叛变，张作霖很快把叛变镇压下去，他对维持东北地方治安作出很大贡献。

民国政府成立，1912年袁世凯掌握了政权，东三省名义上受北京统治。奉天巡防队改编为第二十七、第二十八两师。1912年9月，张作霖升为少将，统率第二十七师，原左路巡防队统领冯德麟统率第二十八师。

1912年11月，张锡銮继赵尔巽为奉天都督，他与张作霖、冯德麟早有交情，所以颇能得到他们的服从和尊敬。1915年袁世凯准备在北京称帝，张作霖、冯德麟起初表示拥护，但袁世凯委任了他的亲信段芝贵为东三省军务督理兼奉天督军。段芝贵的父亲段玉衡（译音）在张作霖几年前和清政府协谈时曾作过担保。段芝贵的任命很明显是对张作霖在满洲的政治雄心的挑战；袁世凯在

任命段芝贵的同时，命令张作霖第二十七师调往湖南。

显然由张作霖自己在背后策划的“群众反对”张的调动，张作霖才免于调往湖南。1916年12月，反袁帝制运动已在云南掀起，张作霖故意让人散布满洲将告独立，计划成立保安会。张作霖威胁段芝贵的权力，袁世凯如要保持奉天安宁，就只能给张作霖委以重任。段芝贵辞职离沈阳，张作霖即被委为奉天巡按使。

袁世凯死后，张作霖着手巩固其在南满的地位。他控制二十七师，任奉天督军兼省长。二十七师五十三团团团长汤玉麟打算反对张作霖。事被发觉，汤玉麟带了少数部队逃往新民，张作霖令张作相以骑兵追击，经冯德麟二十八师五十五团团团长张海鹏出面干预，汤玉麟才获救。

张作霖拟对此不加追究，但冯德麟却想利用这个机会，他和第二骑兵团团长吴俊升联系企图倒张作霖。这个计划张作霖知道后，他多方调动，派二十八师五十六团去辽西剿匪。1917年5月底张作霖调二十七、二十九师袭击冯德麟，宣布撤换师长，冯德麟为了解除他的困境，和张勋谈妥，他仓促离去，参加七月间的张勋复辟活动。从此，张作霖又控制了二十八师。

1917年，张作霖又取得了一次胜利，他的支持者孙烈臣由内阁总理段祺瑞任命为黑龙江省督军。1918年，张作霖依仗其奉天的军力，支持段祺瑞、徐树铮向直系的冯国璋施加压力。段祺瑞再次出任内阁总理后，1918年9月，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以此作为酬谢，这一年中，张作霖又增加了七个混成旅的军力。1919年中，吉林督军孟恩远反抗张作霖的领导，张作霖将他逐走，任命张的支持者鲍贵卿为吉林督军。自此，他完全控制了东北，在他最后的十年中，实际上东北已成了他的独立王国。他这几年在华北的政治军事活动，虽无成效，但由于日本的支持，他完全控制了长城以外东北各省。

1917—1920年间，张作霖、段祺瑞互相利用，密切合作。1919年下半年，徐树铮不顾张作霖视蒙古为东北势力范围，在蒙古一带建立个人势力范围，因此与张的联盟关系破裂，但段祺瑞则继续支持徐树铮。张作霖和曹錕等直系军阀联合，直奉联军多次挫败段祺瑞的军队。7月13日，他扬言正在派兵入关。7月18日直军在保定附近击败段祺瑞皖系的安国军，第二天段祺瑞辞职。战争

获胜者在新政府的组成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1920年8月中，奉军退回满洲，带走缴获的段军大量军械装备，这更加重了直系军阀和张作霖的不和。

当时外蒙情况的发展，吸引了张作霖和日本方面的注意。1921年春，斯坦培格的白俄旧军干涉失败，3月，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在乌兰巴托成立。5月，俄国红军进入外蒙。外蒙当局虽已宣布脱离中华民国，但民国政府仍任命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以维持该地区的中国的势力。这一任命，使张作霖的势力伸向内蒙，达到戈壁以南。张作霖的亲信在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区担任领导职务。1921年6月6日，俄国红军和蒙古联军占领乌兰巴托，7月10日，改临时人民政府为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苏联支持蒙古新政府，并于11月5日签订友好条约。征蒙的大量军费就落入张作霖腰包。他又转向华北的政治活动。

1921年12月，张作霖把他选择的工具梁士诒扶上台在北京当内阁总理。张作霖又和段祺瑞联合，他在华北的地位炙手可热，因此引起他的名义上的同盟者直系的警觉。曹锟、吴佩孚不愿将华北让给奉系。1922年1月，吴佩孚迫梁士诒去职，张作霖力图保持梁的职位，但并未奏效。张作霖调动部队进入关内，1922年4月爆发第一次直奉战争。4月19日张作霖通电声称此举乃系统一“后方”。4月22日，曹锟通电反对，称统一之举不需使用武力。其他北方军阀，包括冯玉祥在内，支持曹锟。1922年5月1日张作霖声称今后东北问题当由沈阳东北当局单独处理，满洲方面正与广西、广东的“西南当局”取得合作。张作霖暂时和这些松散的集团联盟，其中包括孙逸仙。

5月3日，在北京附近的长辛店一战，奉军失败，张作霖将部队撤回东北，吴佩孚统治了华北。总统徐世昌在5月1日撤消了张作霖一切职务。但是冲突并未结束，因为张作霖拥有十万兵力，在东北和日本又有特殊关系，他自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充实军力准备再次争夺华北。

1923年初，孙逸仙派汪精卫和张作霖及段祺瑞的支持者浙江督军卢永祥商谈，劝说他们以国民党政纲为基础，结成三角同盟。张、卢坚持以吴佩孚必须推翻，中国必须统一为结盟的先决条件。

张作霖在沈阳执政的地位，造成当时北京政府的对外关系复杂化。张作霖的政府拥有主权国家所具有的职能，其中包括与外国政府签订条约。这种尴尬

的局面在有关中东路问题上就很明显了。1924年5月31日，北京政府和苏联签订了一个规定中东路地位及两方的路权的协定。要使该协定生效，必须得到张作霖同意，因为中东路在满洲境内行驶。北京政府派专使去沈阳征求他的同意，但此行失败了。张作霖在中东路问题上的处境是狼狈的，如果他违反北京政府正式签订的协定不见得能得到日本的支持，并且他又准备和吴佩孚重新开战因而又不敢恶化对莫斯科的关系。

苏联政府利用了这个机会，派代表库兹尼佐夫和张作霖在1924年9月20日单独签订了一个沈阳苏联协定，在这个协定中俄国人所获得的中东路的权益和1924年5月的协定中所载的相似，而那个条约却是张作霖所拒不承认的，这样，俄国暂时又恢复了在北满的特殊地位。1924年9月协定另一个特点是，张作霖无视北京政府在有关满洲问题上不征得他的同意而签订国际条约的权力，张作霖虽因此取得了面子，但创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沈阳协定承认了东三省张作霖政府是反抗中央政府的一个独立的政权，这为1932年满洲国宣布独立打下了基础。

1924年9月1江浙战争发生。张作霖立即宣布支持卢永祥并向热河进兵，在张进兵同时，吴佩孚向省会承德增兵。9月5日，孙逸仙发表宣言反对曹锟、吴佩孚，9月18日宣布即将进行的北伐，旨在推翻军阀及其靠山帝国主义。

10月初，张作霖袭击山海关，吴佩孚往北面调兵守卫山海关，因吴部冯玉祥倒戈而形势大变，冯弃守古北口，直向北京进军，举行政变，10月又倡议和平解决问题。冯玉祥在北京的政变是事先与张作霖商定的。冯玉祥军和奉军张宗昌部切断布防在长城东端的吴佩孚部的退路。此次战役以直军惨败告终，从而使奉系在华北的地位空前强大。

北京的新政权是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的联盟，但他们一旦获得胜利，联盟就开始瓦解。其中重要问题之一是和华南国民革命力量的关系问题。在南方，孙逸仙、国民党正和共产党联合而日趋巩固。张作霖反对革命变革，1924年12月，他会见来北方和实力派军人商谈国事的孙逸仙。他感到孙逸仙的主张和他与段祺瑞的大不相同。孙逸仙已身患重病，12月底才到北京，冯玉祥

已和他的同盟者不和而散伙，张作霖、段祺瑞显然反对孙逸仙所希望建立的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新政府。1925年3月，孙逸仙去世，局势更加混乱了。

张作霖和奉系军阀向南方推进，1925年初到达上海地区，并准备沿陇海路向西推进到河南地区。但在这一年里他不断遇到拥有武装的军阀的抗争。在长江下流的孙传芳于1925年10月击溃奉军，张作霖昔日的盟友冯玉祥又从河南加以胁迫。鉴于军事形势不利，又由于他向段祺瑞施加政治压力所造成的在北京的恶劣处境，张作霖将他的主力部队撤往长城，调出关外。

当时冯玉祥和孙传芳、吴佩孚联合，纠集部队从华北驱走奉军，张作霖派代表游说冯玉祥意在拆散他们的联合，冯玉祥表示不另结新盟而赞助和张作霖联盟，实际上以此争取了奉军将领郭松龄叛反他的上司张作霖。1925年11月，郭松龄通电要张作霖让位给他儿子张学良。郭松龄此举的目的在于使冯玉祥国民军袭击华北时，转移张作霖的注意力于满洲。郭松龄的行动即使没有苏联的实际帮助，也显然得到苏联同情。由于日本立即干预沈阳地区的局势，此举失败，郭松龄被捕，1925年12月被处决。

苏联和日本为了在满洲这个要害地区争夺势力范围，因此他们都密切注意满洲形势的发展。张作霖由日本官员的间接帮助战胜了郭松龄，但是对局势的稳定起不了多大作用。1926年1月，他又发泄他的反俄情绪，为了想干脆取消苏联在满洲的铁路权益，1926年1月21日，东北当局横蛮逮捕中东铁路苏方总办伊凡诺夫，三名苏方经理，和多名苏方公民。第二天，莫斯科也同样以横蛮态度提出最后通牒，限三日之内释放被捕人员，恢复铁路正常运行。苏方的军事威胁迫使张作霖退缩，1月24日在沈阳签订协定，恢复铁路原状。

在国内政治领域内，张作霖在1926年1月和吴佩孚联合行动，吴佩孚是张作霖的当然同盟者，因为他们两人都力求对冯玉祥加以报复。冯玉祥慎重估计了对方能集结起来向他进攻的军事实力，决心辞离各职去莫斯科访问。他的国民军在华北被击败，退回到内蒙地区。这一年，以广州为基地的国民革命军在7月开始北伐，经湖南而入长江流域。奉军和长江下游的孙传芳达成协议；1926年12月，北方军阀正式联合共同抵御由南方汹涌而来的革命军，12月1日，他们在天津开会，宣布成立安国军，以张作霖为总司令，孙传芳、张宗

昌、阎锡山为副总司令。吴佩孚虽加入了这个联盟，但他不为张作霖所信任，所以没有担负司令职务。

1927年春，张作霖在北方的地位受到沉重打击。唐生智、张发奎率领的革命军强攻在河南的奉军，而冯玉祥又表示同情国民革命，从侧翼攻击张作霖的部队。5月28日，张作霖下令奉军南线部队撤至山东、直隶，6月5日，阎锡山宣布投从国民革命军并劝张作霖加以效法。6月18日，张作霖公然自封大元帅，这是袁世凯、孙逸仙曾拥有过的职称。他并表示要留在北方首都。他在北京把持了最后的短命的至高地位，实际上意味着这个早已没有实权的北京中央政府确已终结了。

张作霖在北京居于尊位的最后一个阶段，中苏关系更加恶化，这在相当程度上由于蒋介石1927年春反共政变而加剧。张作霖自日俄战争以来对俄国人、无论白俄或赤俄一贯心怀疑窦，他并不以1926年中东路事件的失败为戒，又对华北的苏联利益和苏方代表进行了一系列沉重打击。2月28日，张宗昌扣留驶往汉口的苏联船只“潘姆亚·列宁娜”号。可能由于张作霖获得情报证据，因而袭击了苏联驻北京使馆。4月6日，张作霖下令由北京警察厅警察和他的部队进使馆区搜查苏联使馆宅邸，劫走中文俄文档案数车，其中有苏方特工和共产党在中国活动的材料。同时又逮捕了三个月前就躲藏在苏联使馆内的李大钊和其他共产党人。

中国民族革命兴起，1926—27年蒋介石的北伐军向北方挺进，这件事引起了日本田中将军为首的内阁的关切。日本的有势力集团认为中国本部的冲突可能会扩大到华北以至满洲，那样就必然损害他们的特殊利益。田中任总理大臣后，即促张作霖手下的日本顾问和张作霖商讨兴建满洲五条铁路的财政建筑问题。1927年，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和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在北京也进行了对话。这一些行动，都是为了使中国和世界都了解到日本继续视满洲为其特殊势力范围的意图。1927年5月底，国民革命军进占河南后，将进迫山东，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和财产派部队进驻山东。

1927年夏，东京催促张作霖采取将部队从华北撤到满洲的良策，以便得到日本帮助而巩固其地位。1927年中，张作霖估计，由于华中国民革命阵线内部

的分裂扩大，他在华北的地位可能还有希望。

1928年4月，国民革命军又由蒋介石统一领导，向北方最后进军。5月初，日本又在山东省会济南进行干预，企图牵制国民革命军攫取日本在那里的权益。1928年5月18日，田中内阁同时向北京、南京发出照会，明确提出其所谓积极的日本政策。照会警告说，华北倘仍动荡不安，“日本政府将不得不采取适当有效步骤以维持满洲的和平和秩序”。东京又警告说，日本将阻击“败兵或追截部队”进入满洲。又特别警告张作霖说：他的部队不准撤往长城以北，除非其部队和平地撤离北京。

这样，张作霖在北京的地位毫无指望了，他成了国民革命军统一中国和日本开发东亚计划的绊脚石。张作霖对日本的警告非常气愤，但他认识到没有其他现实选择的路可走，只得屈从，撤离北京。1928年6月1日他向驻北京的外国使团告别，6月3日离北京去沈阳，6月4日晨五时半，张作霖的专车遇炸翻毁，张作霖身受重伤，几天后死去。出事地点在沈阳近郊南满路和京沈路交叉处的一座桥梁。这次谋杀事件，显然是事先妥为布置的，埋电线、雷管、炸药的准备工作需要好几个小时。一般都认为这次谋杀是日本人干的，此后查明系日军参谋河本大佐等人布置行动的。他们刺杀张作霖，是实现关东军占领满洲的整个庞大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1928年6月张作霖大帅之死，结束了满洲近代历史上引人注目的一页。他的长子张学良少帅，还在沈阳巩固权力，维护满洲的张家王朝达三年之久。

张作霖身材瘦小，容貌雅致，看起来不象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满洲军阀。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前，有一个西方记者在沈阳访问过他，据该记者的描写，张作霖“瘦弱的小个子，棕黄的眼睛炯炯发光，笑容可掬，举止文雅”，他又说，倘偶然与张作霖相遇，会认为他是一个“沉浸在专心研读孔子论语的恬静生活中的人”。他的照片也给人以相同印象。事实上，他虽自恃庄重，但一旦发作，便粗暴凶残。他机灵但无才智，他善洞察但不敏锐。张作霖出身贫寒农家，而他却使张氏家族有财有势，这是民间熟知的典型故事，当时的观察者们听到大帅被刺的消息后，激于反日情绪而对之更加以渲染。

由于环境和地理条件的关系，在张作霖活着的时候被认为是亲日的。他

最初是在日本扶持下上台的，他为维护日本的利益充当了制止苏联势力在东亚大陆扩张的有效工具；而日本人则明里或暗地支持张作霖在满洲的统治。他死后，不少中国作者称赞他为了在大事情上抵制日本，因此在小问题上向日本妥协让步，并认为他在同日本打交道时一贯机灵警惕。事实上，日本支持张作霖并非日本协同一致的国家政策，对满洲应采用何种适宜的行动方针，在日本的军政人员中间往往有不同意见。

张作霖所实施的反覆无常的政策，他的投机取巧的态度以及他的专横统治，常被人指责，但他的积极成就也得到重视。正当国内混乱分裂，日俄在满洲存在着相互争夺的政治和军事利益的情况下，张作霖确实使东三省保持高度稳定达十多年之久。张作霖用以统治其地区的力量，有几方面因素。经济上，他依靠满洲的农业资源和税收；军事上，他依靠扩建铁路网和聘请外国专家发展沈阳兵工厂；在满洲相对平静的局势下，他能发行地区货币并维持相当稳定的币值。张作霖进兵华北，严重地涸竭了他在满洲的财源，并且部分地抵销了他在满洲地区统治的积极成果。张作霖统治满洲的时候，国内军阀混乱时的物力损毁，农业上、经济上的瘫痪，人力摧折这些现象并未在满洲出现。

矛盾的是：张作霖的所作所为又往往促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统一运动。他向华北扩充势力，他在华北军阀政治斗争中的权力平衡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样他就弥平了地域性和全国性的界限，而使满洲成为全国政治结构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因此，他为东三省最终从政治上、经济上统一于全国开拓了道路。

张作霖除长子张学良外，还有几个儿子。张学思（1903—）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和南京中央军校。他对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监禁一事深有感触，他自己也在西安事变时被拘留到释放蒋介石时为止。后来，他在张学良旧部万福麟五十三军中服役，递升为上校。中日战争时，他对国民政府在抗日问题上采取消极政策表示不满，因此投入共产党军队的吕正操、聂荣臻部。中日战争末期，他在共产党冀热辽军区的一个分区担任司令。1945年后，他回满洲旧地参加国内战争。1948年10月，共产党进占沈阳时，他也在那里。1949年后，他任辽宁省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一直到1954年，并担任过沈阳东北大学校长之

职。以后，他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军学校副校长，1956年，授予他海军少将军衔。1954年，他是人民代表大会辽宁代表。张学铭（1908—）毕业于东京步兵学校，1930年张学良进入华北，他任天津警备司令。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在满洲国民党军队中任职，后来可能因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被击败他就投降了共产党。1959年他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的特邀代表。张作霖的又一个儿子张学曾在纽约联合国组织秘书处任职。

张宗昌 字：效坤

张宗昌（1881—1932.9.3），军事统领，1922—25年为张作霖部下，1925—1928年山东省督军。

张宗昌生在山东掖县祝家庄，出身于一个平庸家庭，他父母从事社会下层的行业，父亲是吹鼓手和剃头匠，母亲是一个召神呼鬼的巫婆。张宗昌十二岁时随父亲打铙钹。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贫穷的张家可能是在一次大批移民的热潮中由山东去南满。张宗昌在哈尔滨一个赌窟当抢手，因此结识了一批小偷扒手。起先他是一个少年惯犯，以后成了南满村落里的土匪。

青年时，张宗昌体魄魁梧身高逾六尺，他敢作敢为，生性好斗，经常出没在满洲艰苦的边地环境之中。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他曾参加俄军作过战。有些传记作者说他曾在帝俄军队中当过队长，但对此种说法应持慎重态度。无论如何，张宗昌在沙皇部队为时极短，俄国失败后，他又到满洲当土匪了。

1911年革命时，张宗昌年已三十，虽未经正规训练，但他对打仗已颇有经验了。有关他在1911—1912年动乱时期的活动，撰写他的传记作者可能加以渲染夸大，说他带了一小股土匪从关东半岛渡海到烟台，在他本省山东支援共和革命，以后又去上海，他带领的一股杂牌部队编入了革命军的一个团，在革命的军事行动结束时，他被任命为团长。接着江苏督军程德全改编部队，张宗昌

才获得正规军衔。他的原部调往江苏西北打土匪，1913年任师长。

1913—1916年期间，张宗昌隶属江苏督军冯国璋部下，屡有递升。1916年袁世凯死去，1917年冯国璋去北京任代总统，张宗昌为侍从武官长。1917年夏至1918年秋，冯国璋任代总统期间，张宗昌在北京陆军部任军事教育总监。

张宗昌在北京期间，一度回满洲为冯国璋处理1917年布尔塞维克革命后逃往哈尔滨的白俄军队。他又回到山东探望父母，有一小队大车随行，满载绸缎、工艺品和其他高级生活用品。但他此行并不顺利，本地乡绅仅出于政治上谨慎考虑而欢迎他。他母亲被他父亲在经济竭蹶时卖给了一个米商，这次竟拒绝他儿子进门。张宗昌重视家庭感情，他母亲拒不会见是他终身憾事。

1918年，张宗昌又上战场，统率第六混成旅和北京政府所属部队一起去南方征讨广州南方政府的护法军，他的部队驻在湖北，后来成为师长，大概1919年到1921年，他的部队驻在江西，这几年中，他并无显赫功绩。

1922年是张宗昌生涯中的转折点，他去满洲投效张作霖。从外表上看，他两人迥然不同，张作霖矮小瘦弱，而张宗昌貌似笨熊。但是他们的出身相同而又以相似的愤嫉目光来观察二十年代的中国。张宗昌受到信任，为张作霖镇压了反对张作霖的吉林兵变，被任为绥宁镇守使。张宗昌从前曾与俄国人打过交道，所以张作霖交他负责东北的白俄军队。自1920年瓦伦将军在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失败后，仍有不少反布尔塞维克军留在西伯利亚，争夺的要塞地区在海参崴，那里白俄军势力继续顽固了两年之久。1922年11月，为数不多的白俄军进入吉林东部的琿春。琿春在满洲、朝鲜、西伯利亚交界处，白俄军被张宗昌缴械投入军营。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是奉军第一师师长担任后援任务。张宗昌无疑是一个能打仗的人，他指挥的部队常能取胜。他的部队是1924年10月冯玉祥兵变后开入天津、北京的第一支奉军。张作霖由于冯玉祥的支持在华北战胜了吴佩孚，接着实行其向长江流域推进的计划。

1924年12月，北京政府免除江苏督军齐燮元，任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1925年1月，张宗昌统率奉军和卢永祥一起进入南京。齐燮元倒台后离上海去日本。1925年2月，张宗昌和孙传芳商定，以卢永祥为江苏督军。张宗昌这个

奉军的显要人物，已据有苏皖鲁三省地盘，3月底，移驻徐州。一个月后即1925年4月，他就任山东省督军。

6月，张宗昌正式就职，这就开始了他专横的个人统治时期。山东是他的原籍，出于乡土感情，略有改革，但他对本省同胞毫无社会责任感。残忍野蛮、敲诈勒索是他统治山东的特点，他横征暴敛以支持省里的军费和他个人的巨额费用。他手下许多人都贪污腐化。他不断招兵买马，到1927年兵额达到十万人之多。同时，他通过税收预征到十多年之久以及大量的苛捐杂税等办法，积聚了他私人的大笔财产。

张宗昌在山东的个人统治期间，民间传说他的“三不知”，不知钱财有多少，不知军队有多少，不知小老婆有多少。他部队里有一支四千多名的白俄军，人们称之为“祸军”，张宗昌在那个时期指挥的战斗中，白俄军是一支异乎寻常的力量，在十分险恶的环境中作战，这些雇佣军既无所顾虑，也不顾死活。张宗昌的部队里还有几千名十岁左右的儿童军，他们挂着特制的短步枪，由张宗昌的儿子指挥。张宗昌的家里拥有四十多名很多国籍和各种类型的妇女当小老婆，据说大多数是白俄妇女，有时候她们在张宗昌大摆宴席时作为女主人出场。当宴请外国客人时，张宗昌经常身穿西服，他仪表非凡地主持西方式喜庆宴会，宴会上使用的餐具是欧洲的瓷器和水晶玻璃器皿，席上摆满法国的香槟、白兰地以及进口的雪茄烟。

尽管张宗昌在山东的统治是悲剧和丑剧的混合物。但他占有极大地盘，因此在这期间的互相残杀中，他据有重要地位。他在政治上和张作霖密切关联，因此直接参予华北、华中的事件。1925年底、1926年初，奉军击败冯玉祥国民军中，张宗昌是一个突出的军事统领。1926年张作霖和他的获胜部队进据北京，张宗昌任直鲁联军总司令，他的山东部队是组成北京卫戍部队的一个部分，在北京他仍然按照他自己维持社会秩序的意志，作出独特的决定行事。他以传布过激思想的罪名封闭《京报》，枪决该报主编邵飘萍。另有一个新闻界人士林白水，因在主办的《社会日报》上刊登的小说被张宗昌认为是对他的侮辱，被张处死。蒋梦麟当时在北京，他曾表示对这个“罪恶昭彰的军阀”的畏惧，说他“体如大象，脑如笨猪，性如猛虎”。不管这些论断是否确切，

但张宗昌在北京采取的统治办法和他在乡间采用的办法一样。1926年春，他的部队在山东对红枪会的叛乱发动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在他本省，张宗昌的军队惯用“开瓜”（劈开脑壳）、在电线杆上挂了一串串死人脑袋作为维持统治权力的手段。

对北方军阀最大的威胁是1926年从广州出发的北伐。1926年秋，国民革命军进入长江中游占领武汉，吴佩孚的军队沿京汉路撤到河南。张宗昌当时在长江下游支援孙传芳。1927年2月，这两个将军在南京设联合司令部，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守卫第一线。在那个时候，张宗昌直接卷入了对外交涉。1927年2月28日，他扣留了驶往汉口的俄国船只“潘姆亚·列宁娜”号，逮捕几名苏联信使和国民政府主要顾问鲍罗庭的夫人，查获了一批宣传品。张宗昌把逮捕的苏联公民解送到济南，可能是由于他查获的情报材料，促使张作霖于4月6日袭劫北京苏联使馆。

当时，河南的战局逐渐恶化，3月初，张宗昌去徐州。1927年春，吴佩孚的处境岌岌可危，北面东面有张作霖的部队压来，西面受到冯玉祥的挺进部队威胁，南面有唐生智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对峙。吴佩孚一败退，张宗昌的部队向北撤退，5月底，张作霖下令将奉军撤到河北、山东。

张作霖为了挽救他那摇摇欲坠的军事机构，1927年7月改编军队，张宗昌、孙传芳各率一军。8月，他们又联合从徐州向南出击，虽然他们到达长江流域，但孙传芳的部队在国民革命军李宗仁指挥的钳形进攻下遭受重大伤亡，同时打击了张宗昌部的战斗力。当时，西线又传来更坏的消息，张宗昌大为恼怒，1927年11月6日，他处决了一批年初被他拘捕的军官，其中有国民军将领郑金声，郑是在河南的春季攻势中被张宗昌俘虏的。这原是张泄私愤的惯用手法，但处决郑金声却在五年后给他带来了致命的后果。以徐州为司令部的张宗昌，受到何应钦第一集团军和冯玉祥第二集团军的联合攻击。12月中旬，第一集团军攻占徐州，张宗昌向北撤退到山东。

1928年4月，国民革命军又发起进攻，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挺进，张作霖准备在德州、保定一线设防，张宗昌弃济南撤往德州。4月，日军在青岛登陆，声称保护日本在山东的利益和侨民。5月初，日军和正在挺进中的国民革

命军之间发生冲突。当时蒋介石在济南，他为了避免和日本发生严重冲突，当即把部队撤退到徐州。但是这一最后机缘并不能挽救奉直鲁军阀联盟的失败，5月底，奉军放弃保定向山海关全面撤退。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沈阳附近被炸身死，留给他继承人的重任是：为了避免进一步遭受损失，只能把联军从华北撤走。

张学良继承了他父亲张作霖。这位少帅和国民革命军达成协议，奉军平安撤至满洲，并宣告战争结束。1928年6月11日奉军正式下令全面撤军，当时张宗昌的部队集中在冀东，拖延执行撤军命令，也许是张作霖的总参谋长杨宇霆默许而有意延搁。白崇禧率国民革命军由北京出击奉军，奉军终于被迫撤至满洲。1928年9月中旬，张学良在沈阳通知白崇禧，他已将违令部队解散改编。这是国民革命军和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这个松弛的联盟间长期流血内战的最后一幕。

张宗昌留在沈阳，那里杨宇霆是经验不足的张学良的对手。1929年1月，杨宇霆被少帅处决，张宗昌在新满洲的地位也成问题了。他自认为在中国政界他还有势力，就迁往大连去了。国民革命的潮流驱走了张作霖，从而威胁日本在满洲、华北建立特殊地位的计划，某些日本人认为在他们反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活动中，张宗昌还可以加以利用，1929年头四个月中，张宗昌在日本的支持下，力谋恢复在山东的地位。

1928年日本沿胶济路进行干涉，阻止国民革命军进据鲁东北，1929年2月，张宗昌趁日本船由大连到龙口。他一到山东，马上纠集旧部，游说那些心怀不满的华北一带的顽固势力。3月初，田中总理大臣在东京对关于张宗昌和日本之间有秘密谅解的报导表示“无丝毫根据”。日本进行干预的蛛丝马迹是很明显的。张宗昌返回山东为期不长，4月间，他的部队狼狈撤走，1929年4月23日他自己也乘船回大连去了。日方只准他在大连作极短暂逗留，只容他换一下服装并从他妻妾中挑选两个小老婆，然后即去日本，住在别府温泉。他在日本旗下栖身，偶而回中国。

1932年9月初，张宗昌借口扫墓由北京回山东老家，那时山东在韩复榘统治下。他带着大批随从于9月2日到济南。情况虽复杂，但有一种似乎有理的

假设，即是他准备在韩复矩扶持下在山东政界重新上台。原定在济南举行的一次会议，因为他的一个老部下未到而未开成，张宗昌感到可能对他有危险，于是他声称收到急电，因母病危即需赶回北京。1932年9月8日，在火车临出站前几分钟，他在专车中和石友三等要人告别时，突然遇刺。刺客郑继成，系国民军骑兵师长郑金声的侄儿和过继嗣子，郑金声在1927年被张宗昌处死，郑继成曾在他的义父墓前发誓必报此仇。郑继成因刺杀张宗昌被捕入狱，但七个月后他获特赦释放。

普遍地把张宗昌描述成是民国初年一个“坏”军阀的典型。张宗昌被描绘成具备了他所处时代的种种丑象。由于这种描绘带有浓厚的偏见和陈词烂调，因此他的真情和传说极难区分。可以把他看成是这样一个人，他的一生是靠实用、强权、暴力和欺诈求得生存和发迹的。在他的早年生活，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他对人类产生感情；在他后期的生涯中，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他的信念，那就是人生最重要的是权力。对张宗昌来说，社会的权力就是基于个人握有地盘、金钱和军队，私人的权力就是握有财产和人。山东的人们称张宗昌为“狗肉将军”，张宗昌在中国很出名。张宗昌为西方人所知也许主要是通过林语堂用讽刺笔调写的《狗肉将军回忆记》，这篇文章载于1940年出版的林语堂著《爱情和讽刺》一书中。

章宗祥 字：仲和

章宗祥（1877——？），曾在日本学法律。早期民国政府中担任司法总长。1916年段祺瑞任命他为驻日公使，1917—1918年参加西原借款的谈判。因反对与日本订立秘密协定而掀起了五四运动，章宗祥被斥为卖国贼。

1877年，章宗祥出生于浙江吴兴，在浙江从塾师习读经书典籍，1895年中秀才后不久去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学法律。他是在日本接受近代教育的最早一批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结识了同时在东京求学的曹汝霖。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教长吴汝纶去日本视察，章宗祥曾充当他的翻译。1903年，章宗

祥取得日本明治大学法学士学位。

他回国后，一度在北京京师大学堂教书，清庭授予进士衔。1905—1911年间，他在北京政府机关做事。最初在法制局当编审，协助工商部尚书载振审订商法。1907年在工商部任职，他还在内务部法制局工作，同时兼任为清政府立宪作准备的法典编纂局的负责人。1907年，徐世昌出任东三省首任总督，章宗祥陪同徐去奉天视察。1908年章任北京巡警厅丞，新的巡警制系由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的陆宗輿创立。章宗祥在北京巡警厅任职至1910年。1910年4月汪精卫因谋刺摄政王被捕，据说章宗祥设法保护汪精卫。此时，章宗祥曾去德国。1910年章返回法律工作岗位，在北京任法典编纂局编修。1911年6月，他被任命为清内阁法制局付职。章宗祥在担任这些制法工作中，和在日本的老同学曹汝霖共事。

1911年10月，武汉起义爆发，清政府召回袁世凯，袁世凯派章宗祥去上海随唐绍仪和共和革命党人谈判。1912年1月唐绍仪辞去北方代表团首席代表职务，章宗祥同时辞职。1912年4月，袁世凯当了共和国临时大总统，任章宗祥为内阁法制局长，7月又任命为司法总长，参议院反对章宗祥和其他五个人的内阁任命。1912年6月章宗祥改任大理院首席法官兼法制委员会主任。1914年2月，孙宝琦继梁启超而为内阁总理，章宗祥终于取得了司法总长的地位。4月，袁世凯任命他为农商部总长。1914年袁世凯在北京的政治权力声势赫赫，他的忠诚部下章宗祥的政治前途亦大可乐观。

袁世凯的权威虽达到了顶峰，但他对手下的主要军官的控制却在逐步减弱。由此，1916年春，他终于被迫放弃了他恢复帝制的计划。4月，段祺瑞组新阁，章宗祥临时留任司法总长，他的同伙曹汝霖留任交通总长。6月，袁世凯去世，接着在北京政治上进行大改组，章宗祥失去了他在内阁中的职位。

1916年6月底，章宗祥继其友陆宗輿之后出任驻日公使。1916年10月，寺内正毅继大隈重信为日本首相。重信任内，曾于1915年迫袁世凯政府接受声名狼藉的二十一条。1916年秋，曹汝霖向段祺瑞提出一项新的建议，段祺瑞在北京当时具有当年袁世凯差不多的权力。这个建议提出借用日本的帮助，使段祺瑞用武力统一全国。章宗祥既是驻东京的使节，又是曹汝霖的密友，就成为进行

谈判的当然渠道了。

东京的谈判在段祺瑞和总统黎元洪之间进行权力斗争的背景下进行。他们争论的中心是对德宣战的问题。段祺瑞认为对德宣战而获胜则全国和他的政府都可以受益，段祺瑞终于获胜，1917年8月在北京向德国正式宣战。从此章宗祥一心一意实施与中国盟友日本合作的政策。为获得日本大笔贷款的秘密谈判从1917年春季开始。1917年9月起至1918年9月，商谈一系列称为西原借款的协定。谈判过程中曹汝霖、陆宗輿是在北京的主要人物，而章宗祥则是在东京直接参予谈判的人物。秘密协定的结果是把段祺瑞的北京政府和日本的军事、财政利益紧紧联结在一起。为酬答日本的巨大借款，段祺瑞把中国的铁路、矿产以及其他权益出让给日本，并同意两国军事上进行合作。通过这些协定从1917年到1918年日本在中国的势力登峰造极无可匹敌，一直到1931—32年占领满洲。

作为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犯了一个特别不幸的过错，当1918年9月24日他与日本外务相签订换文时，日本政府提出日本在山东的地位的要求，章宗祥说了一句“中国政府欣然同意”。一般都认为中国希望通过参加欧战收复山东的全部主权，日本在欧战爆发时就强行进入山东，夺取了德国在山东原有的特权。1918年9月换文，使一度曾是暗中的希望归于破灭。同时中国与日本订了该协定和其他协定这件事，在1918—1919年冬天巴黎和会上公开了。这些协定，使得美国想帮助中国收复德国在山东的原有权利无能为力了。

中国公众对此掀起的愤怒浪潮产生了重大的政治效果，和日本签订密约负有责任的章宗祥被召回京磋商。1919年春，他离东京时遭到中国留日学生在车站举行了规模很大的示威，怒斥他的卖国行径。章宗祥回国后先在天津逗留了几天，1919年4月30日，陆宗輿到天津去把他接到北京。他在北京自有住宅，但是却住在曹汝霖家中。谣传章宗祥将去欧洲代陆征祥担任巴黎和会的中国首席代表，公众的愤怒更加高涨了。5月3日晚北京学生纷纷集会怒斥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輿为“三个卖国贼”，他们出卖中国的权利和资源换取日本的借款。第二天，学生的示威队伍向曹汝霖的住宅前进。当示威队伍抵达时，陆宗輿不在场，曹汝霖逃进使馆区避难，唯独章宗祥被捉住了殴打得不省人

事。当时传说，章宗祥被打死，但不久发现他已转入北京的一家日本医院，他的伤势并不严重，当然有点疼痛。

随之而来的称之为五四运动的全国抗议运动，最坚决的要求之一是将被称为“三个卖国贼”章、曹、陆三人免职。其实这三个人不过是段祺瑞政策的代理人而已。当时北京政府的总统徐世昌最初拒绝学生们的要求。他发出指令逮捕袭击章宗祥等人的学生们，并对那些忠于职守的官员公开地加以赞扬。但是，因此而起的罢工骚乱到处发生，特别是6月5日上海商界罢市，要求释放学生、罢免章、曹、陆三人，徐世昌被迫屈服。1919年6月10日，北京政府免除章宗祥等人的全部职务。

1920年1月章宗祥获得四等奖章，但是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卖国贼，他的政治生涯早已终结了。1925年他任北京通商银行总经理，1928年7月，北京政府垮台，南京的国民政府正式下令逮捕章宗祥。从此以后，章宗祥以及在华北的其他一些与日本有关系的人物在公开场合消声匿迹了。1940年传说他已死去，但在什么地方以及怎样死的都不得而知。章宗祥存有文稿《东京三年记》，转载在王芸生所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中。

张资平

张资平（1893——？），作家，地质学家，创造社的创办人，通俗浪漫小说作家。中日战争期间，他在日伪汪精卫政府中工作。

张资平出生在广东梅县。他父亲在艰难困苦中取得了一点功名（秀才），教他儿子读经籍。1906年，张资平进美国浸礼会所办的广东广益中西学堂上学，一直学到1909年。1910年考入广东高等警官学校，他在警官学校学习时，打算以刑法学为他的毕生事业。1912年，他参加广东省的政府奖学金考试，中试后去日本留学。

他在日本期间，对他今后职业需要的智力发展和个人发展很为重要。约在1914年，他在东京学日文时认识了郭沫若、郁达夫，和另一些爱好文学的中国

留学生。1922年，他虽在东京帝国大学取得地质学的学位，但他决定以文学为业。1921年郭沫若离日本回上海当编辑，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女神》，这本书使他很快成名。1921年7月，郭沫若又去日本和朋友们商谈创办文学刊物，其中有张资平、田汉、郁达夫等人，商谈结果，决定成立一个文学团体取名创造社。

1922—1924年间，是早期创造社的全盛时期，张资平同郭沫若和其他同人一起积极编辑《创造季刊》，这个刊物专门传布浪漫主义思想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张资平是杂志的经常撰稿人，他的第一部小说《冲积期化石》由创造社期刊的承印者上海大东书店出版，于1922年问世。不久张资平使自己成为一个通俗浪漫小说作家。

张资平后来中断了《创造季刊》的工作，1926年他在武昌师范大学当矿物学教授和地质系主任，他在那里开始学一点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学。1928年5月，他回上海在暨南大学和大夏大学教文学课程，那时，他放弃了浪漫派主题的写作而开始写一些政论文章。他还经营过书店、发行过期刊，但都为期甚短。据说，张资平和创造社的关系始终未断，直到1929年2月创造社被国民政府当局封闭。1929年后，他继续他的创作活动，还做一点生意。中日战争期间，他投向南京的日伪汪精卫政府。日本投降后，他暂在台湾躲避，不久又回上海，1947年6月他因投敌受审。此后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张资平是一个多产的长、短篇小说作家，又是一个热心的翻译作家。他早期的浪漫派小说最受人注意。他晚期的作品大部分以三角恋爱等老一套情节为主题，他描写的人物非常肤浅，他着重于肉欲的刻划。在他著作中所提倡的中国新民族主义精神只不过是1928年后采用的新名词而已。总之他的作品是通俗读物，仅供人消遣而已，他曾一度在国内享有盛名。

张资平结婚后，据说有四个孩子。

张元济 字：小斋 号：菊生

张元济（1866—1959.8.14）。商务印书馆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出版社，

主要靠张元济。张元济出版了一大套教科书，建立了涵芬楼图书馆，最先用现代印刷技术大规模影印了许多珍本书籍，其中包括二十四史和四库全书珍本。他创办编辑了《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杂志。

张元济出生在浙江海盐的一家书香世家，他继承了他祖辈的传统，喜爱善本书籍治学严谨。三十岁前，他在1892年中进士，当时，蔡元培举为翰林院庶吉士，他和张元济成为毕生之交。

由于中国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张元济等一批青年士大夫对此十分担忧，因此他们开始鼓吹政治改革。1898年他在北京当一名小京官，经推荐给具有改良思想的光绪皇帝作咨询，其他备咨询的还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1898年6月16日，光绪在内廷接见张元济、康有为，他们力陈废除科举制度、取消八股文的必要性，他们说，因为它束缚士人才智。事后张元济还向光绪上奏折主张改革官制废除叩头礼节。1898年秋短命的百日维新失败，张元济被免职永不录用。

张元济官场失意，回到上海，继续鼓吹要求改革。1902年当了官助的南洋公学（成立于1897年）校长，该校即是后来的交通大学的前身。学校课程注重外国语，张元济任译部首脑。这个职务，使他有获得选译国外教科书和为出版准备稿件的经验。他在南洋公学的时间很短，约1903年初他离开该校，那时该校很多学生和教员转到蔡元培新创立的爱国学社。

二十世纪初，张元济投身商务印书馆，此后他毕生致力于这一事业。商务印书馆是1897年在上海开设的一家小印刷店。义和团运动后，清廷迫于舆论的压力宣布筹办新政，几年前，这是被清廷坚决回绝的。改革教育制度是属于筹办新政的第一批项目之一。因此迫切需要近代学校教科书。同时，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知识界寻求近代知识的欲望日益增涨，因而对国外书籍的中文译本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死于1910年1月10日）、鲍咸昌（死于1929年11月9日）看到这种情况极为关心。他们为能获得厚利所吸引，便请人把大量日文书籍翻译成中文，可是由于请了不称职的学生翻译，因此译出的稿件令人失望。夏、鲍面对这一重大挫折，向当时夏、鲍办的期刊《外交报》的编辑张元济求教。张元济建议在商务印书馆设立一个编译所，用南洋公

学译部的人员为编译所工作，并聘蔡元培为主任。蔡元培主持后，建议商务印书馆集中力量出版学校教科书。然而，蔡元培本人不能用全付精力来管出版事务，他在1903年6月离上海去青岛。

然后，张元济接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主任，在张元济指导下，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由编辑部系统编定的教科书。编辑部除张元济外，还有蒋维乔、庄俞、高凤谦等人，他们都是有名的教育家。1904年十册一套的教科书的第一册出版，很快代替了很多当时使用的其他教科书，此后十年中，几百万套教科书印行发售。发行教科书所获利润，使商务印书馆很快成为民国时期国内的最大而又事业性最强的出版社。

张元济作为一个学者去行商，当然不以出版教科书为满足。他的才能又通过编辑出版普遍感兴趣的杂志而得到发挥。如他主编著名的《东方杂志》于1904年1月出版，这是民国时代最著名而又历时最久的一份普遍感兴趣的期刊，按期出版一直到1949年。1909年到1915年间，张元济又主持发行了一些通俗性杂志，如《教育杂志》、《小说杂志》、《少年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英文杂志》等等。

1905年，张元济开始在商务印书馆筹设一所善本图书馆取名涵芬楼。涵芬楼开始时规模一般，从浙江徐家获得了第一批珍贵书籍，这批书籍的成交是由徐家的老朋友蔡元培安排的。以后又从各处收集藏书，如盛昱、丁汝昌、端方收藏的图书。经二十年努力，涵芬楼扩展为东方图书馆。1924年该图书馆迁至闸北新址，1926年5月供公开借阅。1932年1月，日军进攻上海，闸北的图书馆烧成灰烬，只有寄存在公共租界金城银行保管库的一些图书得以幸存，但仅占总数七分之一而已。东方图书馆被焚之前，是中国最大的图书馆之一，有藏书518,000册。1951年，由张元济和古廷伦（译音）将其中珍本编成目录，取名《涵芬楼劫余书录》，这本目录计有宋版93种、元版89种、明版156种，手抄本192种，稿本17种。藏书中以地方志特别丰富，共2,671种，有许多元、明时的地方志。

因有涵芬楼珍藏的书籍，张元济着手大量影印珍本书籍。因为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当时国内图书馆纷纷建立，这为商务出版的影

印书籍提供了可靠的销路。张元济是一个有识之士，又是一个有素养的学问家，他并不以影印涵芬楼藏书为满足，他千方百计地搜集他计划影印的书籍的最好版本。影印前每本书都经精心校勘。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第一部重要丛刊是《四部丛刊初编》，经校勘后在1929年影印出版，《续编》、《三编》分别在1935、1936年影印出版。《续古逸丛书》在1923—1938年陆续影印出版。

中国的历史学家将会久远感谢张元济对影印二十四史所作的贡献。二十年代在中国通用的版本，都不能令人满意，张元济为出版二十四史，决心收集其最好的版本，他获得了许多宋元刻本。在整个艰巨工作过程中，张元济亲任主编，校勘差异，1930—1937年出版了全套《百衲本二十四史》。张元济和他的助手在校编过程中写下了很多笔记，张元济选辑其中重要条目附录于各史之后。1938年，他又加以选编成一单印本，书名《校史随笔》。

1935年11月，南京教育部和上海商务印书馆经几个月的商谈，决定由张元济主持，联合第一次刊印北平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文渊阁《四库全书》。这个计划最初的多次尝试都失败了，而且要翻印这庞大的藏书稿本看来是不可能的，关于选印那些书籍在学者中间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最后决定采纳陈垣的建议，选印四库全书中所收明代的永乐大典，出版了《四库全书存本》，其内容只是全书的约五分之一。

张元济除了这些编辑工作外，还抽出时间出版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和有学术价值的书籍，在1917年他编印了《戊戌六志士遗集》，选辑了参加1898年百日维新时他的爱国友伴的文章。晚清著名的学者和官员翁同和是1892年张元济中进士时的主考官，翁同和自1858年到1905年的日记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来说是重要资料，经张元济和翁同和的后人持久的耐心磋商，该日记终于在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照相影印出版。

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多年，1920年升为监印人，1930年任董事会董事长。他对商务印书馆，除业务经营和学术上对商务印书馆作出贡献外，还在1923年发明了一种新的汉字排版机，十分经济有效。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张元济已年过七十，过着半退休的生活，但是对国事仍非常关心。在他浙江海盐县老家，有一座他祖代张奇龄修造的藏书楼称为

“适园”，张奇龄是1603年中的举人。图书一直保存完好，经常有他的家人和海盐、嘉兴的学者照管。1939年，他把全部藏书捐赠给上海的沪春（译音）图书馆。这批图书的书目全部刊印在1946年出版的《适园图书目录》一书中。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张元济对国民政府的战后政策十分失望。1948年他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他出席第一次院士会议时，蒋介石虽在场，但张元济毫不畏惧地对国民政府企图用武力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政策提出严厉批评。

因此，共产党当局邀请张元济出席1949年9月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不足为奇了。当时他年已八十三岁，是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中年事最长的一位了。1949年他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1953年，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这几年中，他一直保持和商务印书馆的长期关系，他是董事长。1953年改为公私合营后他任总经理。1954年张元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海代表，1958年又被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1959年8月逝世，终年九十三岁。

赵尔巽 字：次珊 号：无补

赵尔巽（1844.7.7—1927.9.3），前清时任四川总督，东三省总督。1912年后任清史馆总裁，编修《清史稿》。

赵尔巽，奉天铁岭人，赵家是汉族正兰旗官职的名门，世居满洲。他的父亲系1845年进士，在山东任知府，1854年因抗击太平军死于任上。赵尔巽的三个兄弟，两人是进士：赵尔震，赵尔萃，第三个兄弟赵尔丰，任四川总督，辛亥革命时被杀。

赵尔巽受传统教育，1867年中举人，1874年中进士，入选翰林院。他在官场里稳步递升，1882年任御史，在此任中以敢言直谏著称。他在京师做官十多年，1887年调任地方。首任贵州石阡府知府，1893年升为贵阳道台，三年后任安徽按察使，1898年任新疆布政使。1899年他的母亲逝世，他便离职回山东居丧。1901年任陕西布政使，以后任代理巡抚。两年后，调任湖南巡抚，又

调京署理户部尚书，1904年去东北任盛京将军，1907年任四川总督，后又任湖广总督，1908年又回任四川原职。1911年初，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出任满洲新设的东三省总督。

1910年各地抢米骚动和其他骚扰的消息不断传到北京，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满洲地区和其他各省相继发生同样的动乱。由于赵尔巽尚有一些武力可依靠，例如张作霖的部队，因此，他能以谋略制胜革命派的首领，便在满洲采取主动。革命派原准备利用保安会夺取奉天的权力，可是赵尔巽使用手腕使他自己选上了保安会会长，因而维持了他原有的权力。1912年民国成立，总督的名称改为都督，赵尔巽接着就成了奉天都督，年底，他辞去此职，赵尔巽象其他的前清遗老一样隐居到青岛去了。

1914年8月，袁世凯的北京政府设清史馆按旧例编写清代历史，任赵尔巽为清史馆总裁。1915年12月，袁世凯准备登位称帝，他称赵尔巽、张謇、徐世昌、李经羲为“嵩山四友”以此表示这些老同事在新政权下将作为他的私人至交加以尊敬。1917年，张勋复辟时，赵被提名为枢密院顾问。1925年段祺瑞执政府期间，赵任善后会议议长，临时参议院议长。1926年，北京又经历了一次短期的权力变更。当段祺瑞离京去天津，张作霖趁此进逼北京，赵尔巽和王世珍维持故都的治安秩序。赵尔巽于1927年9月3日死在北京，临死前犹惦记《清史稿》的出版问题。

赵尔巽虽是翰林院的学者，但学识和文笔的造谐都不突出，因此请他负责编修清史并不是最好的人选。袁世凯依历代惯例设馆修史，其真实目的也许是收罗前朝遗老加以笼络取得他们的支持而已。但从某些方面来说，袁世凯选赵尔巽为总裁，可谓得人。修史者需要有理事才能和史学识见。没有象赵尔巽这样的声望和实际才能的人，这项修史计划在袁世凯死后政治动乱经费匮乏的艰难的十多年中恐怕难以继续。不论《清史稿》有如何的缺点，但从编写竣事而至付印出版，大多得力于赵尔巽善于应变的能力和持久的坚韧精神。赵尔巽深感此书的缺点，所以以《清史稿》为名，而并不定名为《清史》。

袁世凯在世时，修史工作的经费充裕，赵尔巽礼请了不少当时的著名学者参加清史的编撰工作，即使有的人工作极少甚至毫无贡献，也照样付酬。因

此,在修史初期,编撰工作并不认真,编撰人员之中,既无通盘合作,又无有效的组织制度,因此必然会产生重复,遗漏,矛盾百出等问题。当修史工作的经费缩减以至毫无着落时,赵尔巽只能节约开支并亲自多方设法筹款,常常向军阀劝捐。

1927年,赵尔巽见到国民党北伐即将成功,他渴望《清史稿》早日竣事出版。1927年9月,赵尔巽在临死前不久,把《清史稿》的工作交给袁金铠,他是奉天辽阳人,1911年前,他在满洲是赵尔巽下属,后来在日伪满洲国任职。

1928年,《清史稿》出版准备工作的最后阶段,编辑工作主要由袁金铠的满族人助手金梁负责,金梁擅自对稿件作了修改,有几处是重大修改。这一切在付印之前,没有被人发觉。一旦发现改动,当即订正,但经金梁之手修改过的已经付印的四百部《清史稿》已运到满洲了。所以《清史稿》就有了“关内本”和“关外本”两种版本了。其中最明显的不同是:“关外本”有张勋、张彪、康有为的传记,而“关内本”却没有他们的传记。

《清史稿》的付印,只是在国民革命军进据北京之前几周开始的。1928年6月28日,清史馆归由故宫接管委员会领导,不久,他们提出十九条理由提请南京国民政府封禁《清史稿》,其最主要的理由是该书“反对革命”。1928年后,《清史稿》一直列为国民党国民政府的禁书,1949年后则在台湾封禁。由于封禁《清史稿》,因此该书逐渐成为珍本书籍,书商对该书的要价暴涨,并且助长了非法翻印版本的《清史稿》出现。

《清史稿》出版后,指责极多,对《清史稿》的禁令也有各种意见。1945年,在重庆的历史学会请求教育部准许进行清史的重编工作,因为这对近代中国的研究十分重要。这项工作在1949年政府迁往台湾后才认真开始,1961—1962年在台湾出版了官方批准的八卷修正本《清史》。《清史》大部分是以《清史稿》为依据,其不同之处主要是对一些晚清人物的处理,例如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

赵恒惕 字:彝五 夷午号:炎午

赵恒惕(1880—)从1921年至1926年湖南军人、湖南督军,他任督军时

试图将梁启超的立宪主义者的理想付之实现。

赵恒惕，湖南衡山人，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父亲赵慈英是一个秀才，有点诗才，在当地颇有声望。他幼年在家中受旧学，以后去武昌语文学堂学习，然后他经公费留学考试及格，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他结识了两位湖南的反满积极分子黄兴和蔡锷，由他们介绍，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他于1908年回国，到广西，在蔡锷手下工作，蔡锷当时在培训军官。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时，赵恒惕受命率领一支广西士官生队伍去武汉地区在黄兴部下作战。

民国成立后，赵恒惕在湖南督军谭延闿手下工作，着手改编湖南军队。1913年所谓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下令逮捕赵恒惕押送到北京，经副总统黎元洪调解，赵恒惕获释并蒙准返回湖南，在谭延闿手下任湖南军第一师师长，为谭延闿效命反对袁世凯称帝和阻击入侵湖南的其他部队。湖南人程潜曾在日本和孙逸仙一起，在云南又和蔡锷、李烈钧一起，1916年反袁运动后，他返回长沙统率湖南护国军。赵恒惕和其他一些当地首领希望前都督谭延闿回湖南重新执政。1918年北京政府派兵进入湖南，以阻止湖南人掌权，结果，就任命了皖系北洋军阀张敬尧为湖南督军。

1920年张敬尧倒台，赵恒惕暂代湖南督军。1921年4月，省议会正式推选他为督军。在二十年代，赵恒惕是一个倡议联省自治运动的知名人士，这是二十世纪初梁启超曾鼓吹过的主张。持有这个主张的人们认为中国地大，各省情况又有很大不同，所以以实行如法美等国的联邦政府体制为适宜。二十年代的中国，重又出现了实行分封而治的议论。这种议论认为各省如能自行立宪处理省内事务，这样的区域性自治能避免中央政府滥用权力和各省之间的相互争战。

谭延闿在1920年7月就在湖南施行省自治运动了。谭延闿在长沙一当上省长，赵恒惕马上把湖南作为施行自治的先驱。由十三名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起草了省宪草案，又经各县选出一百五十人开会审订。经过多种程序，湖南省宪于1922年1月1日公布。省宪对中央和地方的权限有明确规定，省长由全省公民普选，全省公民有创议权，选举权，罢免权。由于受湖南的影响，其他各省，如浙江、江苏、陕西、江西、四川、广东、福建起而效尤，准备立宪。一些军

人如陈炯明、唐继尧，一些学者和政界人物，如章太炎、熊希龄、梁士诒和唐绍仪也起而支持，而事实上只有湖南一省颁行过该省省宪。

赵恒惕之所以从事自治运动的根本目的是很现实的，他不过是想加强自己的地位以抗击外省的侵犯，并想采用自治体制消除全国政府权力过度集中的危险，如袁世凯统治的时期那样。事实上，湖南的例子并不可取，湖南公民并未享有省宪规定的权利。1924年10月1日，省宪进行修订，省长的权力更大了，同时，在赵恒惕的立法统治下的湖南也未能取得社会安定。从外部来说，湖南的地理位置使赵恒惕没有办法使湖南省从南北双方的政治军事冲突中摆脱出来。以广州为根据地的南方政府，想要控制湖南作为进入武汉和长江中游的通道，北方军阀则觊觎湖南想要利用它作为南向两广西向四川的必经之路。

赵恒惕自己虽然是隶属于国民党，可是为了阻止谭延闿和程潜的部队从广州返回他们的家乡湖南，又不得不仰求吴佩孚的支援。1923年夏，赵恒惕和谭延闿之间的战争爆发。经过一些零星战斗，赵恒惕于9月1日退出了省城长沙。后经吴佩孚的援军从北方赶到，赵恒惕才算取得了胜利，11月，战争结束，他又当上了湖南省长。唐生智在1923年的战斗中很出力，所以赵将他由旅长提升为师长。1924年赵恒惕卷入湖北省的时局，他把他的湖南部队的一部分兵力投入去稳定该省的局势。吴佩孚利用这个机会，加强他在湖南的据点岳州的实力，岳州是湖南的门户，又迫赵恒惕和他另行新建联盟。1924年下半年，吴佩孚因他的老部下冯玉祥的倒戈而动摇了他在华北的军事统率地位，1925年3月，赵恒惕邀吴佩孚去岳州避居。

在湖南本省，赵恒惕于1924—26年间与他的老部下唐生智发生了冲突。1926年3月，赵恒惕最后被迫让位，由唐生智当湖南省长。唐生智那时在接着发生的北伐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赵恒惕退休住在上海，以“联省自治”的口号为政治纲领。使赵恒惕当了湖南省的五年主宰，但联省自治运动却毫无结果。赵恒惕统治湖南的时期，正是共产党的活动和工人运动在湖南蓬勃发展的时期。关于赵恒惕的统治情况，在共产党的党史中有所描述，主要是因为他采取镇压手段迫使当时共产党的积极的组织者毛泽东于1923年4月和1925年6月两次离开湖南。

虽然赵恒惕作为军界的头面人物的地位于1926年结束了，但他在湖南的政界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日本投降后，1946年，他又出现在政治舞台，他在长沙当选为湖南省参议会主席。1949年国共和谈破裂，淮海战役中国国民党大溃败时，赵恒惕离开上海去香港。他和蒋介石关系从来虽不密切，但他后来也到台湾去了，在台湾，他无声无息地生活在贫困的境地之中。

赵恒惕的幼弟赵君迈从清华学堂毕业后去美国留学，曾任他家乡湖南省衡阳市市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任东北长春市市长，以后任上海渔业管理局局长。赵恒惕有四个儿子，一个和他一起在台湾，两个在中国大陆，一个在美国。

赵元任 字：宜重

赵元任（1892——），国际知名的语言学家。他原先研究语音学，制作了第一份有关中国主要地区方言的详情记录，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建立了基础。在美国，他对语言学研究的范围极广，例如利用近代语言学的方法来进行汉语教学。他写过《国语入门》、《粤语入门》等书。他曾把《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译成中文。

赵元任原籍江苏武进（常州），他生在华北天津，出身于世代书宦之家，他有一个祖先叫赵翼的是《二十二史札记》的作者。清末，他的祖父在北方做官，赵元任幼时随全家先后在北京、保定和河北其他地方居住过，因此他能说北方方言。他五岁时，家里为他请了一位江苏籍的老师，他学会了用常州方言背诵儒家经典四书，同时，他又从他的姑母那里学会了常熟方言。这样，赵元任开始发觉在中国口语中的方言差别。赵元任又学了中国的音乐，因为他父母是有名的昆曲客串演员。

1900年，赵元任随同全家回常州，他父母都在1904年在常州去世，第二年，他去苏州住在一个亲戚家里，仍由塾师教他。1906年他进了常州溪山小学，开始受新式教育。1907—1910年他在南京江南高等学堂学习升大学的预备

课程。

1910年，赵元任报考清华公费留学美国，名列第二。1910年秋进美国康乃尔大学学习，与胡适同班。他们两人在伊萨卡学习的日子里，建立了永恒的友谊。胡适学哲学，赵元任学数学和物理，他还学西方音乐。在康乃尔大学时，他和最早受西方教育的中国数学家之一胡明复同房居住，胡明复后来在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14年6月赵元任和胡适两人同时在康乃尔大学获文学士学位，然后，两人继续留在伊萨卡研究哲学达一年之久。赵元任在康乃尔大学期间积极筹组中国科学社，该社在1904年成立，其目的是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和促进科学研究。另有两个在康乃尔的中国学生学化学的任鸿隽和学机械工程的杨铨对此也很热心。该社于1915年创办了一份《科学》杂志。最初几年，《科学》是在美国编定（先在伊萨卡，后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然后送到上海印刷发行。这是致力于促进科学而刊期又最久的杂志之一，继续出版到1950年。

1915年，赵元任和胡适都离开了康乃尔大学，胡适去哥伦比亚大学从杜威学哲学，赵元任去哈佛，除学物理外，他又学了哲学和作曲。1918年，赵元任在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又获得谢尔登旅行奖学金在芝加哥和伯克利学习了一年，然后他又回到伊萨卡担任1919—20年学年的物理讲师。他自1914年从康乃尔毕业后的六年中，发表的论文主要是关于数学和物理学，其中不少发表在《科学》杂志上，此外，他还发表了一些关于汉语标音的论文，登载在《中国学生月刊》上。那时，他还开始作曲。

1920年，赵元任在美国留学十年后回国，在清华大学教数学，他在五四运动高潮时期，进入北京的知识界生活圈内。当时杜威在中国，由他著名的中国学生胡适为他老师在北京和其他各地讲演时当翻译。1920年10月，罗素来中国，赵元任担任罗素讲演时的翻译。这两个陪同杜威和罗素的年青翻译者的知识广博、口齿清晰给中国听众印象很深。罗素的哲学和他的人品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访华还意外地导致协助他翻译的赵元任开展一个新的事业。1920年冬，赵元任陪同罗素在各地访问，他用流利而正确的中国各种方言翻译罗素的讲演。赵元任的语言才能得到了确认，他在朋友们鼓

励下决定集中力量研究语言学。

翌年夏天，赵元任成家，1921年6月1日他和杨步伟结婚，在北京举行简单的婚礼，只有两个好友胡适和朱君国参加，他们夫妇两人在自撰的结婚证书上签名。杨步伟出身于皖南望族，她祖父杨文会以提倡研究佛学闻名，他是设在南京的著名的佛经发行所的创办人。杨步伟出身于一个旧式家庭，幼年时受传统教育，以后去日本留学学医，获得医学学位，她在北京行医时和赵元任相识。

他们结婚后不久同去美国，1921年秋赵元任在哈佛大学任汉语讲师，汉文教学虽在哈佛大学早从1879年就试行过，但这早期的尝试并不成功。四十年后，又重设汉文课程，从中国聘赵元任去任教。从此以后，哈佛大学一直开设汉文课程。赵元任除教汉文外，又研究音韵学和音乐。1924年，赵元任离哈佛去欧洲游历进修。他在瑞典遇到高本汉，高本汉是欧洲学者研究中国音韵学的先驱，赵元任和他商讨翻译他1915年出版的巨著《中国音韵学研究》的可能性。

1925年，赵元任回北京清华大学教书，他在美国录制过汉语唱片，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发行他的《国语留声片课本》。二十年代初，他的专业著作集中于语音学领域，他经常关心的是汉语发音标准化、汉字按照发音拼写、提倡试用汉语罗马字母化、研究汉语口语的声调等问题。1929年，赵元任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音部的工作。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他已是汉语学术研究的权威人士。

1926年，他调查长江下游的现代吴语方言。十年前，高本汉曾系统地录制了北方方言，但严格说来，他只录了发音，对声调却未作深入研究。赵元任循高本汉的方法，但他收集的不仅是吴语的发音而且收集了吴语单字和词组的声调。他的这一工作，第一次最详情的记录了中国的一种主要方言。1928—1929年，他又进而研究两广的粤语。1934年，他又和罗常培一起调查了皖南的徽州方言。

1935年，赵元任对中国方言研究规划有所改变，他着手尽可能多的记录各种方言，尽可能仔细收集每种方言的材料，以便识别每种方言的基本特征。他希望，按照这次修订的计划能在较短时间内对国内各种方言的分布情况完成初

步调查。1935年，赵元任亲自调查江西和湖南的方言，翌年又调查了湖北的方言。他的同行语言学家李方桂和几位赵元任训练出来的助手也参加了这一工作。一个省的方言调查大致在一个月內完成。三十年代由赵元任及其合作者所建立的研究体制为今后中央研究院在这方面的工.作创立了一个非常可取的楷模，甚至在1949年后，共产党主持下的全国方言普查工作也是按照赵元任所创立的方法进行的。

除进行广泛调查外，赵元任还鼓励详细记录和集中研究个别方言，并附以录音。1939年出版的他的《钟祥方言记》是运用这一方法的范例。除记录汉族方言外，赵元任还将藏语和瑶族方言的歌谣标上语音符号，这项工作是在1929年出版的《第六代达赖喇嘛仓洋嘉错赞歌》、《瑶歌记音》中作出的。赵元任在从事这些研究工作的同时，在中央研究院认真地建立了记录档案。

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一般认为是汉语的近代科学研究的基础，但这一巨著的价值在中国只是后来由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翻译和校订成中文才显示出来。译本体现出精湛的学识，其中增订的材料更提高了它的学术价值。

赵元任还写了很多题材丰富的语言学的专业论文。他所探索的问题从汉语标音、汉语方言、中国的国语直到中文与英文对比的研究以及语言学分析方面的各种问题。赵元任所创行的声调符号对汉语和其他音韵语言的学者都是一个重要工具。他的《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这篇论文是对近代理论语言学的重要贡献。赵元任除了他的专业研究外，还当了国民政府教育部施行的语文教育计划的顾问，他还协助在中国创办使用无线电广播进行语言教学。

赵元任非凡的才艺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年份中发挥得特别突出，他作为一位作曲家，那时的创作最多：1928年出版的《新诗歌曲集》，1934年的《儿童节歌曲集》。中国学音乐的学生没有不知道他的歌曲的。1931年陈衡哲编的《中国文化论丛》，其中关于音乐的一节由赵元任执笔，这是一篇有关中国古代音乐的精采的概论。赵元任的语言才能在他的译作中亦表现出来，他早期的译作是1925年出版的米尔恩独幕喜剧《最后五分钟》，而《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才是真正显出他才能的一部译作。1922年1月出版了他的译本，译文的风

格和奇妙的情趣据说简直可以和加乐尔的原著媲美。他还译完了《走到镜子里》，但是译稿在战时丢失。

1938年秋，赵元任出国，由夏威夷大学请去教书。1939—1941年，他在耶鲁大学教书。1941年他去哈佛编辑由燕京哈佛社主持的汉英字典。赵元任后来在哈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设立的海外行政学院主持汉语教学工作。赵元任在哈佛的工作，对在美国的汉语教学工作有很大影响，为1945年后汉语学习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他最大的贡献是在汉语教学中运用了近代语言学的方法。赵元任与哈佛大学远东语文系的杨联升合编的《国语字典》于1947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他一人所写的《粤语入门》。1948年哈佛出版他的《国语入门：中国话速成课本》，是一本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广泛采用的课本。

《国语入门》的导言虽很简短，但对近代中国的语言学作了透彻而专门性的说明，在近代汉语语法的分析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以往对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都以书写材料为依据，赵元任却研究了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汉语口语的语法。进而言之；在赵元任之前，大多数语法学家都沿袭西方语法规则，其中有些人只是照搬奥托·杰珀西的概念来解释汉语语法。而在《国语入门》中，赵元任把近代描写语言学的规律和方法系统地应用到汉语中去，课文中的注释对很多语法现象作了深刻说明。

赵元任的重要贡献得到了公认，1945年被选为美国语言学会主席。1946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二百周年纪念时获得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47年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那一年，他离开坎布里奇去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任东方语文和语言学教授。1952年荣任阿加西士讲座教授，直到1960年退休。他是美国东方学会主席，美国文艺科学学会会员。1962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授以荣誉博士学位。

赵元任自1938年后一直在国外，但他仍为中国效力，1945—1947年他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代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语言学研究工作仍在他的有才智的指导下进行。1959年1月，他以富尔布赖基金研究奖金获得者的名义去台湾，在国立台湾大学讲授语言学概论并主持了一系列汉语语法的专业讨

论会。赵元任夫妇访台湾成了当时台北社会上和知识界的一件大事，他们在台湾岛上三个月的活动本地报纸都作了详情报导，赵元任在台湾大学的讲演获得广泛赞赏，以后编印成书，书名《语言问题》，在1960年出版。这是第一本用中文写的普通语言理论书籍。他离台湾后又去日本访问，在京都大学作汉语语音和语法的演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赵元任的专业论著注重于汉语概论，汉语方言的调查方法，以及语言、思想、逻辑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他继续对中国方言进行一些研究，特别是台山方言，这是从广东迁居美国的华侨大多数人习用的方言。他按照他以前的方法研究台山方言，着重词和字组的语音研究。1962年，他相处五十年的老朋友胡适去世，赵元任写了一篇文章论胡适家乡的方言，即皖东南绩溪的方言。

自从五十年代初期以后，赵元任的主要工作是准备对标准汉语语法作基础研究。近年来汉语研究在美国的发展，需要着重对口语作系统的理论阐述，从中国语言学发展的观点看来，精密分析近代汉语的语句结构是为将来对方言和古代语言语句结构的研究提供新的十分必要的基础。在科学语言学的总的领域内，赵元任最先把先进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汉语研究上来。《中国话的文法》试行本1965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1947年以来，聚集在伯克利地区的重要的中国学者群中，赵元任和他热心的夫人显示出一种非凡的个人作用。

1961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出版赵元任六十五寿诞纪念文集举行集会，这次集会正好又逢赵元任夫妇结婚四十周年，赵元任的老朋友，研究所所长李济在集会上向他们夫妇致颂词，李济以典型中国式的比喻，把赵元任的好学比之于六世纪的佛教朝圣者玄奘一样，玄奘从中国经过艰苦的历程绕道中亚到达印度，这段经历记载在玄奘的名著《大唐西域记》中。李济说：“玄奘的成就主要是因为有菩提萨埵的帮助和卫护，而赵夫人就是赵元任的菩提萨埵。”赵元任夫人的自传《一个中国妇女的自传》，原系中文，由赵元任译成英文，1949年在美国出版。她还写过一本《中国食谱》。

陈 诚 字：辞修

陈诚(1897·1·4日——1965·3·5)，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的地位仅次于蒋介石。1949年国民党政府撤出大陆后，他任台湾省长。1954年他当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1950—54年，1958—63年前后两次任行政院长。

陈诚浙江青田高市人，家有薄田，不甚富足，有幼弟两人，姊妹两人。

1913年，陈诚进丽水第十一师范学校，1917年毕业后进杭州省立体育学堂。陈诚因家境困难，他的学业时有间断，但1918年终于在杭州毕业。1919年他进保定军官学校炮科第八期，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个广东人罗卓英(1896—1961)，他和罗结成终身友谊。

由于1920年7月的直皖战争，使军校的学业停顿，陈诚去广东投入粤军第一师三团。1920年他加入国民党。1921年保定军校复课，他又回保定学习，1922年6月他毕业于该校第八期。他被分配到浙军第二师六团第三连，驻守在他的家乡浙江。经见习后，1923年2月去广东，在粤军任中尉副官，四月升上尉连长，参预北江、西江战役，曾负伤，伤愈后任直属连连长。

1924年6月，黄埔军官学校成立，9月，陈诚任军校炮兵教官，从此开始了他和蒋介石经久的关系，其关系与何应钦不相上下。那时何应钦是军校军官教导团教官。1925年1月，陈诚任国民党党军炮兵二营第一连连长，罗卓英为另一连连长。他们两人都参加了1925年对陈炯明的两次东征战役，因他们在惠州决定性战役中作战有力，陈诚被提升为少校炮兵营长。

1926年1月，陈诚任黄埔特务班长。7月，北伐开始时，他任司令部中校参谋，不久调任第一预备师第三团团长，12月，又调任该师六十三团团长，该师属何应钦东路军指挥，负责夺取被孙传芳军队占领的沪宁。1927年2、8月间获得预定战果，4月，陈被提升为准将，任二十一师副师长，兼六十三团团团长，7月任该师师长。

4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陈诚任南京警备司令。8月，蒋暂行辞职，8月底，陈诚在一次重要的龙潭战役中击退孙传芳的反攻。10月，陈诚被任命为第三师师长，但未上任，而任军事委员会军务处副处长兼上海军务处处长。12月，蒋介石复职，陈诚任军务处代处长。1928年1月，蒋介石又大权在握，3月，陈诚任军训处处长。

1928年4月，北伐军继续进军，陈诚任蒋介石行辕警卫司令、炮兵司令。国民革命军接着进占北京的胜利之后，开始改编，7月间，陈诚担任十一师副师长，10月，任该师三十一旅旅长。1929年6月，他成为十一师师长，同年秋，任第二军副军长在河南和冯玉祥的国民军作战。11月，他在鄂北襄阳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进而又率领部队进入豫南于1930年1月在京汉路上的确山打败了唐生智的部队。

国民政府反对国民军的斗争一直继续到1930年，当时北方反蒋联盟开始形成。3月，陈诚任蚌埠警备司令。5月，以冯玉祥、阎锡山为首的北方联盟公开反抗南京当局，不久，陈诚即率部在豫东北作战，夺取了归德。1930年7月，他又打下了被山西傅作义部队包围的山东曲阜。9月，陈诚部参加收复郑州的战斗，解除了来自北面的对蒋介石的威胁。

11月，陈诚等军官陪同蒋介石去日本观看军事演习。陈诚在日本还参观日本的军事学校和访问华侨界，他对中国的强邻有了一个初步而又有些混杂的印象，12月回国后，任第十八军军长。1931年1月，又兼任十四师师长，副师长是周至柔，他是陈诚的浙江同乡和保定同学，原在十一师时，在陈诚手下工作。

1930年，在南京的第一次所谓剿匪战役中，何应钦没有能消灭共产党的威胁。1931年2月，陈诚率领他十八军的第十一师和第十四师到江西，发动第二次战役。6月，蒋介石亲自指挥第三次战役，陈诚任第二路军总指挥参加这次对共产党的征伐。1931年9月，沈阳事变，日本开始侵占满洲后，国民政府的第三次反共战役停止。

1931年10月，陈诚又兼任五十二师师长。当时，国内战事比较缓和，陈诚的私人生活也发生了一次变化。国民政府的第一任行政院长谭延闿在1930年9月临死前，托附蒋介石为他的三女儿谭祥找一个合适的丈夫，那时，陈诚和他的妻

子正离了婚，蒋介石就把谭祥介绍给陈诚，他们在1932年1月1日结婚。

陈诚又回到江西的战斗任务上，1932年8月陈诚解除了共产党对赣州的围困，但共产党的势力日益强大。1932年12月，在组织第四次反共战役中，陈诚被调到赣中抚州前线指挥一次新的进攻。2月，他调去指挥赣粤闽边区国民政府军中路军，归他指挥的有十一个师的兵力。7月，当这次征伐正处在松散踌躇不决的最后阶段，陈诚从战场指挥岗位上调走，去负责在赣北新成立的庐山军官训练团。9月，他被任命为第三路军总司令兼第六纵队司令。1934年10月，共产党在江西的据点终于被突破。

在此期间，陈诚于1934年5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下属的军官训练团副团长，同年12月，由陈诚指挥肃清江西共产党余部的军事行动，这次江西军事行动的成果之一，是在陈诚指导下编了一部缴获的中共文件摘要的册子，取名为《赤匪反动文件汇编》，1935年出版，1960年又在台湾分六册再版。这部文件，详细地叙述了1935年初中国红军的历史、组织和计划，大量引用了在这次所谓清剿中所缴获的共产党文件。

1935年8月，蒋介石在武昌行营新设了一个陆军整理处，陈诚为主任。这一机构主管改组中国陆军的繁重任务。6月，蒋介石下令，全国骑兵、炮兵工程兵各部队直隶于陈诚的统率之下。由于一些最强的骑兵、炮兵部队由半独立的军人所控制，因此那道命令具有特殊意义。同时在江西又设立了炮兵训练中心和工程兵训练基地，由罗卓英负责督导那两个专业机构，陈诚则着力于江西庐山训练班训练军官的工作，并负责在四川峨嵋山设立军官训练团，作为统管川、黔、滇各省军官训练基地。这个计划反映了南京当局对全国加强有效统治的努力。

完成了这些工作后，9月，陆军整理处管辖的工作缩减，10月，武昌行营撤销。1935年11月10日宜昌行辕成立，陈诚任行辕参谋长，整理处亦迁往宜昌，陈诚仍兼任该处主任，陈诚在1936年1月将两个机构合并，并于1936年2月迁回武昌。同时，陈诚于1935年秋，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6年2月，进入陕北的共产党进犯东面的山西，山西省主席阎锡山要求援助，蒋介石即派陈诚前去。阎锡山任陈诚为第一路军司令。5月，击退共产

党后，陈诚被任命为晋、陕、绥、宁边区剿共国民政府军总司令。这一步骤表明国民政府控制力量的加强，尤其是对山西省。

当时，两广联合反蒋势力在华南再度活跃起来，1936年6月，行辕参谋长陈诚把大批部队开进湖南。湖南省主席何键采取中立态度，但因陈诚迅即占领湖南战略要地衡阳，促使何键倒向政府方面。陈诚又与广东方面的余汉谋接触，答应给予酬报，1936年7月8日，余转向国民政府方面，瓦解了广东的军事指挥机构，挫败了西南的军事叛乱。

蒋介石趁机向广西军人摊牌，陈兵广东胁压广西，任陈诚为第三路军总司令，罗卓英为前敌指挥。蒋介石在广州，与广西首领的政治谈判正在进行。9月初，在军事政治的双重压力下，达成协议，广西将领服从南京当局的领导，至少在名义上如此。陈诚被任命为中央军校广州分校主任，9月，又被加委为广州行辕参谋长职务，他的主要任务是整顿两广。

那时，南京政府在从事两项任务：收复为日本豢养的蒙族人占据的绥远地区，消灭西北的共产党势力。1936年11月，陈诚又调回武昌行营任副主任兼参谋长。11月初，绥远发生战事，晋绥部队联合，从德王的蒙族军队手中收复百灵庙，陈诚即去太原和归绥，分别同阎锡山和傅作义商讨向察哈尔商都进军的建议，协议达成后，陈诚于12月4日飞往西安向蒋介石请示批准，此时蒋介石已到陕西指挥一次新的讨伐共产党的战争。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变，陈诚和其他一些军政首领亦被拘留，直到蒋介石从西安飞回南京后才释放了他们。在这激烈的12月，陈诚被任命为南京的军政部次长，但他在有关西安方面的工作并未结束，1937年1月4日，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他当时负有两大任务：一是协助汤恩伯在绥远作战，二是破坏张学良杨虎城部队的联合，防止他们和共产党力量会合，防止共产党势力向陕甘扩展。陈诚亲到渭河前线，从军事政治两方面作布置。张学良已随委员长到南京被监禁，因此他的工作方便不少。他成功地策动冯钦哉叛离杨虎城。1937年2月9日卅六师占领西安，以所谓改编为名，采用调动、遣散和合并的手段，一步步吃掉了赫赫一时的东北军和西北军。

他在西北的工作完成后，1937年6月任庐山军官训练团主任。国民政府高

级军官集中在庐山进行夏季整训，从政治军事两方面讨论1936年12月在西安释放蒋介石时达成的协议。西安谈判，使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和日本的对华态度都发生了改变，结果是中日战争在1937年7月7日爆发，那时庐山会议正在进行。

1937年8月，淞沪战争开始，陈诚前去视察防务。9月，陈诚任该战区的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不久加任第四预备军副指挥官，11月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统管在淞沪杭地区作战的所有中国军队。

经三个月的引人注目的防守，国民政府军队在11月中被迫撤出淞沪杭地区。12月，陈诚在刘湘手下于汉口任第七战区副长官。南京失守，武汉成为临时的军政中心，蒋介石组成武汉地区司令部，任命陈诚为卫戍司令长官。1938年1月11日正式就职。

陈诚还负责筹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1938年2月政治部成立，陈任主任，黄琪翔、周恩来为副主任，郭沫若负责文艺宣传厅的工作。3月，陈诚在武昌主持全国会议，确定政工人员从事战时工作的条例。同月，他又任珞珈山军官训练团主任。

陈诚所担负的战时任务大为增加。4月，他担任全国航空委员会委员，5月，任中央训练团委员，军委干训班副主任，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九战区成立后，6月他任该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6月14日，任湖北省主席。7月初，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蒋介石为名誉团长，陈诚为秘书长。同月，他又担任了中央训练团主任。

当时日本已在进行积极的军事行动，1938年8月，溯长江挺进，试探武汉外围防御。武汉地区司令部的指挥工作于9月交给罗卓英，减少了陈诚的众多的工作负担的一部分，使其能通盘筹划第九战区军务。1938年10月底，国民政府军队撤出武汉，国民政府机关和机关人员向西迁至重庆。

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四川南岳召开的军事会议，陈诚提请辞去一切职务，但未被接受，1939年1月，严重大代湖北省主席，4月，薛岳代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当时，陈诚致力于其他事务，1939年2月，他任游击训练班副主任，3月，

任战区党务委员会委员，中央训练团训练处长，他又是训练团的教育长。1939年初到9月，陈诚在重庆主要是主持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工作。

陈诚自1936年9月升为上将，1939年5月，又升为二级上将，8月，任中央训练团特别党部主任。1939年9月他去湖南前线协助薛岳指挥长沙保卫战的第一次战役。10月，陈诚负责第六战区的指挥工作。1940年2月，他率领部队去广东在韶关阻击日军进攻。

1940年6月，日军占领宜昌，守卫战时首都重庆的任务落在陈诚肩上。他辞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和三青团秘书长职务，专注于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和湖北省政府主席职责，以协调湖北地区的重大军事和政治措施。1940年9月1日，他抵达湖北西南的恩施，设立了他的新司令部，重新部署了他所统率的军队，着手进行使湖北成为防御重庆的要地的工作。

他在恩施的任务不过是处理日常军政事务而已，因此，1941年3月，又另加了军事委员会党务处主任的职务。1941年9月，为了支援长沙保卫战的第二次战役，陈诚对宜昌日军阵地发动牵制性的进攻，1941年9月攻入宜昌，不久又失守。

1941年12月，美国参加了太平洋战争。1942年全年，鄂西前线无重大军事行动。但1943年1月，美国陆军中印缅战区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中将在重庆和宋子文、陈诚举行多次会谈后，提议建立由三十个师组成的所谓Y部队。陈诚免去了其他职务，负责中美联合训练计划。当时，在蒋介石最高军事统帅部有三个主要对手：何应钦、胡宗南、陈诚。1943年2月17日，指令陈诚负责训练计划，并任参加拟定的缅甸战役的远征军司令长官。何应钦对此任命强烈反对。3月，陈诚离恩施去昆明。

陈诚按Y部队的设想着手进行计划、军队改编、训练工作，但是他的工作受到何应钦控制的陆军总部的阻挠。1943年5月，在第六战区日军沿长江发动进攻，发生了新的复杂情况，命令陈诚回恩施司令部指挥，他在5月中到达恩施。日军不过在宜昌以西的江面上虏掠了一些船只而已，6月初，日军又顺江退去了。陈诚下令军队追击，恢复了日军撤走的几个据点，于是宣扬取得重大胜利。

陈诚原应立即返回昆明，但他仍留在恩施，这确实反映了陆军总部对Y

部队计划的实施不给经费和兵员的事实。史迪威将军向蒋介石建议将云南和广西合并为一个战区由陈诚指挥，1943年春拟定的远征计划要在12月1日前完成。何应钦有蒋介石为后台，反对这一计划。陈诚终于返回云南，但在11月，他辞去远征军司令长官的职务而去重庆。1943年下半年，史迪威率领称作雷多部队的中美联合部队从印度进入缅甸北部，获得史迪威所预期的战果。

1944年4月中旬，日军执行“一号”计划，大规模进攻河南，国民政府部队惨败。日军继续南进，5月，陈诚应召去西安观察形势，6月，他在重庆和蒋介石商谈后，被任命为第一战区司令，1944年7月15日正式任职，在陕南汉中设司令部。在陈诚统率下，计有九个集团军二十三个军的兵力。

日军的“一号”计划继续向南进军，横扫河南，直入广西，陈诚新的工作岗位的主要使命是遏制西北陕甘宁地区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削弱共产党人在华北日益增强的势力，在那里他们已渗入到日军后方的乡村。陈诚并负责指导河南和陕西的国民党行政公署。当日军在衡阳打败了薛岳的顽强抵抗，1944年9月10日占领了桂林时，陈诚再次把他的注意力转向政训工作以及政治策略问题。

10月，在蒋介石坚持下召回史迪威。魏德迈中将代史迪威来华后，制订“ALPHA”计划，其目的是在日军的继续进攻中保住贵州、云南。魏德迈建议由陈诚负责实行这一计划。蒋介石却任命了何应钦，在美国压力下何应钦终于被迫放弃军政部长一职。1944年12月1日，陈诚接替了何应钦的职位。陈诚当军政部长后的首要任务是借助美国的训练和装备，把中国军队改变为一支供战后使用的有效力量。国民政府一直关切中国共产党潜在的威胁，1945年1月，又任命陈诚为后方地区现役总司令。

1945年5月，陈诚再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6月，他任国防研究处副处长。日本投降后，陈诚乘飞机到汉口、北平、南京巡回视察。战争结束时，国民政府的部队有四百三十万人之多，但是军队的改编，特别是何应钦控制下臃肿的高级指挥机构的改组仅仅进行了一部分。1945年10月，陈诚再次任中央训练团主任。1945年12月，陈诚任中央军事机关改编委员会主席，根据美军体制改革指挥机构的工作计划在1946年5月完成。

这一工作，名义上算是完成了。1946年6月1日新设国防部代替军政部。

新部长是白崇禧。陈诚预知这一改变，他在5月被任命为海军部长，6月他又继何应钦而为参谋总长。

陈诚在这个参谋总长的位置上起关键作用，他是高级军事人员中保定系的高级军人，可以直接见到蒋介石，而白崇禧是一个桂系军人，只能通过行政院の例行手续行事。当时在华日军大部分已解除武装遣送回国。战争结束了，但中国的国内政治问题并未解决，在国民党和共产党间进行调解的使命，先由赫尔利将军担任，后由马歇尔将军继任，这项调解使命进行过程中敌对的气氛越来越强烈。1946年4月初，陈诚继张治中为三人调停委员会的国民党代表。6月30日马歇尔停战协定期满，中国的内战又开始爆发。陈诚又与他的宿敌共产党对战了。1947年2月，陈诚升为一级上将。

内战更为激烈，当时的焦点在满洲。1947年5、6月的攻势中，共产党取得重大进展，7月，国民政府实行全国总动员，8月，任陈诚为东北行营主任和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1947年9月1日在沈阳就职，他的任务是恢复已趋恶化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在他领导下取得了一些成就：调整紊乱腐败的行政机构，撤换高级将领，改变军事计划。但是为时太晚了，当陈诚在满洲管事的时候，共产党已掌握了主动权。

由陈诚提议，南京方面增调九万部队去满洲，又在当地招募兵员以增强战斗力。1948年1月，共产党发动一次战役将国民党军队分割成孤立的几个部分，然后袭击国民党在满洲的交通线。陈诚以胃病复发（胃病倒是真的，但这是早在1943年就有的病）为由，要求免去他的职务。1948年1月17日由卫立煌将军接替他，卫立煌担任东北行营代主任和东北剿匪总司令。陈诚继续当参谋总长，回到南京。

在1948年4月普选后，5月初，政府内阁包括国防部长白崇禧在内全体辞职，陈诚辞去参谋总长，由蒋介石的另一名亲信顾祝同替任。

陈诚因胃溃疡在上海动手术。10月，共产党歼灭了在满洲的国民党军队，陈诚去台湾。1948年12月29日，国民党在淮海战役中面临最后崩溃时，陈诚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他在1949年1月5日正式就职，并兼任台湾警备司令。由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陈诚这一新任命具有新的意义。1949年1月21日，蒋

介石辞去总统后指示陈诚要把台湾作为撤退国民党的一个安全基地。

但是，他并未从大陆的事务中脱身。当形势趋于恶化，1949年7月19日，行政院任命他为在台北新设的东南行营主任，他于8月15日就职，为中央政府机关和机关人员撤到台湾作出了努力。

1949年12月，吴国桢继陈诚而为台湾省主席，陈诚则集中力量为国民政府抢救贵重财物，国民政府于12月7日撤离了大陆上的最后落脚点成都。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正式担任流亡在台湾的国民政府的领袖，几天以后，陈诚在台北当了行政院长。1950年8月国民党中央改组委员会成立，陈诚又当了改组委员会委员。

两年后，1952年10月，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陈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担任行政院长的陈诚和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合作，在台湾实行了基本的土地改革。如果这一改革是在大陆实行，国民党也许能保持其权力。陈诚把这一成就写入署名为《台湾土地改革纪要》一书中，这本书在扉页上引用了1953年通过的立法中的一段内容。他的一本有关土改成就的英文书1961年在台北出版，书名《台湾的土地改革》。

1954年3月在台湾举行的选举中，陈诚当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11月，他担任新设的光复大陆计划委员会的头目。1957年10月，台北召开国民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陈诚被举为国民党副总裁，仅次于蒋介石。1954年，陈诚当了四年行政院长后，由俞鸿钧继任，1958年6月，俞鸿钧辞职，仍由陈诚接任。1960年3月陈诚再次当选为副总统，又由立法院再次批准为行政院长。

1961年7月到8月，副总统陈诚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他去美国的特殊任务是希望美国取消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决定，但另一目的是为其政府促进友谊。他完成了这两项使命。1963年3月，又以同样的方针，他访问了南越和菲律宾。虽然陈诚在台湾是蒋介石的正式继承者中的第一位，但反对他的派系斗争很激烈。1963年11月，再次肯定他国民党副总裁的地位。但同年12月15日，面对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所拥有的雄厚的政治实力，陈诚辞去行政院长职务。1965年3月5日，陈诚因肝癌死在台北。遗有妻子，四个儿子，两个女儿。

陈诚除了著有关于土地改革的书籍之外，还写了《如何实施耕者有其田》。

《八年抗战经过概要》、《如何走向安全和平之路》、《革命的道德》、《从政回忆》等书。

陈济棠 字：伯南

陈济棠（1890—1954. 11. 8），广东军人，1928年第四军军长，1929年广东军队的司令。他最出名的是使广州保持了半独立地位，成为反对蒋介石统治运动的组成部分，他控制广东一直到1936年。

广东防城县是陈济棠的出生地，该县在广东沿海的西南端，与印度支那毗邻。他在受初等教育后，即入广东黄埔的广东陆军初级学校，后又在广州的陆军速成军校深造。他开始服役时任排长。

1922年，陈济棠初露头角，任粤军陈铭枢的第四团营长。当年，陈炯明策动反对孙逸仙并要挟广东所有部队参加他的行动。陈铭枢离开了团长职务，由陈济棠暂辖第四团。他的部队驻守在西江沿岸，邻近广西。孙逸仙征伐陈炯明，得到杨希闵的滇军和刘震寰的桂军的帮助。那时，孙逸仙派老练的国民党领导人邹鲁去驻在广东西部、南部的粤军中游说以期再得到他们的支持。此举发生了作用，陈济棠表示支持孙逸仙领导的革命事业。1923年孙逸仙重建在广州的权力，李济深统率广东各部队，陈济棠在李济深部下当第三旅旅长。

1925年，国民政府准备北伐，改编加强了它所属的各个部队。广东部队编为第四军，李济深为军长，该军下辖四个师，陈济棠任第十一师师长。1926年夏北伐开始，李济深留守广州，负责后方防务，陈济棠和十三师师长徐景唐随同留守。

1927年8月1日，共产党在南昌发动了未获成功的起义，部分余部转向广东，企图在广东建立他们新的基地。陈济棠率部在东江地区阻击共产党人。继之，李济深、张发奎因争广州的控制权发生冲突，陈济棠站在李济深一边。1927年12月，共产党利用这混乱机会，成立了广州公社。叛乱迅被扑灭，张发奎对发生共产党起义事虽无直接责任，但他认为暂时离开广州为宜。

1928年，李济深又在广东重建了他的权力，任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任第四军军长。年底，陈铭枢继李济深任广东省长。1929年，李济深因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反对南京当局的叛乱有牵连而被监禁在南京。陈济棠越过他的上司陈铭枢而统率了粤军。在南京召开的一次整编会议决定裁减军队，军改编为师，师改编为旅或团，陈济棠仍有力地控制广东地区。

陈济棠的声望突然高升，1930年他被选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当时看来他与南京国民政府关系不坏。但这种和谐的关系为时很短，此后数年中，他是威胁国民政府的最难对付的地方势力之一。1931年5月，胡汉民在南京被蒋介石逮捕，加速了国民党内部的重大分裂。有一批政界领袖，包括陈友仁、孙科、唐绍仪、汪精卫，他们在先有陈济棠，后有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的武力为后盾，在广州另立政府。内战危机在即。

1931年9月日军侵入满洲挽回了这一局势，国民党首领联合起来抗日。广州政府虽解散，一些分裂派人士重新进入南京国民政府，但是广州仍保持其独立状态，成立了两个半独立性的机构：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对两广有自行处理的权力。这两个机构，得到胡汉民和当地国民党元老的支持，而铁腕人物无疑是陈济棠。陈济棠在他已有的军事实力之外现在又掌握了政治权力，由于至少在名义上得到广西的两个首领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支持，使他的地位得以增强。

陈济棠于是着手巩固其地位扩展势力。实际上他的有效权力只限于广东，因为广西的首领不受广州的权力约束。陈济棠第一件事是扩军，将原来的三个师改编为三个军，另建独立师，由可靠的广东军人统帅。他的大哥陈维周统率税务警察，由六个装备优良的团组成。陈济棠虽无海军，但他着手筹建空军，由黄光锐指挥，广东空军在全国是显赫一时的部队，陈济棠在广州近郊燕塘设一所培养空军人员的航空学校和一所军官学校。

从表面上看，三十年代初广东和南京的关系正常。南京对广州的两个半独立性的机构小心谨慎佯作不知。陈济棠与南京继续来往，他甚至还得到南京政府的财政资助。1933年，南京方面在江西加紧征伐共产党，任命陈济棠为围剿战役的副司令，蒋介石为总司令。后来剿共部队改编，陈济棠任南线总指挥。

1934年秋，共产党开始长征，陈济棠采取步骤阻其进入广东。除此以外，他对撤退的共产党军队并未作有力的追击。

陈济棠的军力日盛，他的抱负也日增，1933年他颁布广东经济发展三年计划，声称他的措施是和孙逸仙的全国发展计划相一致的。前几年，广东在李济深和陈铭枢治理下，在广东农村恢复秩序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并在建立工业企业方面已开始进行。陈济棠依仗他极大的权力和财源，使他能获得更多的实际成就。

经济发展的努力，主要集中在建立一些制糖厂，糖厂的设备从捷克进口。他还设立了一家纺织厂和其他工业设施，改建扩大了在石井的广东兵工厂，省公路网逐步得到扩充。广州市公共事业有所改进，新建珠江大桥，在石碑近郊为中山大学建造了庄严的校舍。

陈济棠还注意社会问题。他在华南提倡尊孔运动，主张在学校里学习中国古代经书，官方提倡尊崇古代名人，三国的关羽和宋代英雄岳气。他道貌俨然发颁命令禁止妇女穿着短袖衣衫，并采取其它措施制止过份暴露女性的妖艳。他虔信手相、面相和风水。据说他要任命一个重要人选时，先要对其人相面，由相面术士卜测其人是否可靠。他把父母的遗骨迁埋到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故乡花县，据说那里风水很好，墓葬者的子孙必获富贵荣华。

日本的侵略意图日见明显，广东的独立地位为南京所难以容忍。陈济棠和李宗仁、白崇禧一起利用对日政策问题，企图攻击蒋介石，使他们自己得手，以此来对付南京。情况渐趋明朗化了，1936年初，胡汉民去世，南京方面认为结束广州叛逆状态的时机到来了。但是陈济棠在李宗仁支持下试图抢在南京之前行动。由于南京方面对日本侵略中国没有行动反应，陈济棠佯作要抗击在满洲的日军，声称派遣讨伐部队北上。1936年8月，两广部队确实北上进入湖南，号称抗日救国军，陈济棠任总司令。

但是，他的打算未能得到真正的普遍支持。7月4日，一部分广东空军驾驶员驾机投向国民政府，7月8日，他的高级部属、他的集团军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经蒋介石策动到了南京，这对陈济棠是一个致命打击。前张发奎部下，现任陈济棠的东江地区绥靖主任李汉魂也宣布效忠南京。陈济棠见到他的打算

已失败，乘英国炮艇悄悄离开广州。国民政府撤消陈济棠一切职务，由余汉谋继任，并正式取消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不久，广西回到国民政府手中，两广的半独立地位结束了。

陈济棠在香港短期逗留后去欧洲旅行，先到意大利，以后又到其他国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据未经官方证实的传说，说他给政府战时国库献出大量钱财，总之，国民政府对他过去的活动加以宽恕。1940年7月22日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在重庆新设的农林部长，任职到1942年。战争初期，他在香港住了很长时间，1941年12月日军占领时，他正在香港，但在1942年初，他设法逃出香港回到重庆。不久，陈济棠被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

日本投降后，陈济棠到广州居住，在那里他热心于教育事业，和一些旧部一起创办了珠海大学，后来迁到香港改为珠海学院。

1949年中国共产党军队席卷大陆时，他又被召回为国效劳。1949年4月，国民政府改海南岛为特区，企图以此岛屿为反攻据点，由陈济棠掌管特区。海南岛原是中国最不发达、最被忽视的地区之一，而陈济棠大力改善当地的状况，并以个人资财支援该地方政府。但是国民政府当局对此仍然忽视，蒋介石把兵员资财都搬运到台湾去了。中国共产党向南进军异常迅速，尽管陈济棠有良好愿望和积极努力，但海南岛终于在1950年春被占领。

陈济棠在台湾退休，他在军界失去地位，在政治上也不再是一个有势力的人物，蒋介石给了他一个空名差事。陈济棠对教育的兴趣并未减退，1954年他卧病期间还准备为纪念孙逸仙在台湾创办一所学校。11月他死在台北。

三十年代初，由于陈济棠的极权统治，广东人民对他并无好感，他为了维持他的军队和实行他的经济计划而加重人民的税收负担。他苛刻的道德观也引起了人们的批评。但是回顾一下陈济棠在广东的七年统治，可能会有更为善意的看法，虽然赋税沉重，经济如果说不上繁荣但确实是相当稳定，农村中社会秩序安定，与民国初期盗匪横行的情景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发展工业的基础，但在抗日战争中大部分被毁。陈济棠晚年倾心促进教育事业，获得了一致好评。

陈其美 字：英士

陈其美（1878—1916.5.18），反满革命家，蒋介石早期的恩人，孙逸仙的支持者，他招募人员、组织起义、1911年11月占领上海。在二次革命期间和事后，他调遣力量反对袁世凯。

陈其美，浙江吴兴人，出生小康之家，兄弟三人，行二。他父亲是一个商人，略有学识，他打算让陈其美经商。陈其美在本乡受初级教育后，十五岁时在吴兴附近石门一家当铺里当学徒。当时虽然工作平凡，但年青的陈其美仍为国内民族革命的激情所感动。1894—1895年中日战争中国失败受辱，陈其美极为愤怒。约1900年，他离开石门到上海进了一家丝栈。当时的上海是一个反满运动的重要中心，陈其美就此投身于政治活动，他在二十五岁左右，成为一个革命者而开始新的生涯，1905年，他去湖南长沙，他的幼弟陈藹士在那里当军官。陈藹士曾留学日本，深知近代教育的重要性，决定资助其兄陈其美去日本留学。

1906年陈其美抵东京时，正好同盟会和它的机关刊物《民报》成立不久，他很快加入这个新组织，他先学警监法以后转到一所陆军学校学习，他虽然在学习，但实际上更多的是从事政治活动。陈其美在东京遇见了一个年青的浙江同乡蒋介石，大约在那时，蒋来日本进陆军学校，陈其美把他拉入了同盟会。此后，这位青年士官生就成了陈其美的密友，并把他当作政治上的良师和兄长。但据国民党有些资料称：陈其美把蒋介石介绍给孙逸仙，此说似属讹传，因为孙逸仙在1908年春被迫离日本。

同盟会加紧计划反满起义，陈其美回国。他经家乡浙江去北京、天津，为共和革命多方召纳人员，在上海公共租界成立了一个指导革命活动的秘密总部。1909年夏，陈其美和他的一帮人策划在长江下游沿海的两个重要省份浙江、江苏举行罢工。但此计划为叛徒告密而被清政府所悉，两江总督端方粉碎了这个准备中的行动。陈其美坚持不懈继续活动。1911年春，他在香港听到广州

黄花岗起义的消息，装成一名记者赶到当地，救出了几名同志。广州的4月27日起义失败后，他回到上海。1911年7月，他在上海和宋教仁、居正等人正式建立中部同盟会，他们致力在长江地区协调组织革命起义，而以武汉和南京为中心目标。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点燃了推翻满清统治的火焰。面对清政府强大的军事压力，长江中游各省的及时响应是十分重要的，陈其美冒着个人生命危险，率领革命武装在1911年11月攻占上海。这个胜利，产生很大的心理影响，几天之内，苏州、镇江等地都宣告独立。陈其美成了沪军都督，又进一步组成联合部队，攻占南京，南京原来由清军张勋据守。革命军在上海、南京的胜利，为1911年底南京新的临时政府的成立和孙逸仙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提供了可能。

此后四年中，陈其美目睹孙逸仙和袁世凯之间为争夺中国的统治权而斗争。陈其美从事革命事业直至完全胜利，他深知袁世凯反对共和的意图，因此他反对和北方妥协。但在袁世凯的势力得到增长后，1912年8月袁终于迫使陈其美放弃沪军都督一职。

1913年6月到9月，陈其美在二次革命中统率上海的反袁武装。但是，他的处境日益危险，1913年11月被迫逃到东京和孙逸仙会合。他在日本约有一年光景。这一期间，革命党中间，甚至在那些老党员和孙逸仙的追随者中间，弥漫着悲观失望和怨天尤人的情绪。但是陈其美坚决支持孙逸仙，1914年7月改组为中华革命党的时候，陈其美成为党的总务部长。

1915年初，陈其美去上海，他计划在长江各省扩大孙逸仙势力的努力再度受挫。在北方，袁世凯为称帝稳步地作准备。1915年中，陈其美在东京和孙逸仙多次商量后回国，组织力量反袁。1915年11月，陈其美策划刺杀了袁世凯的上海镇守使郑汝成。12月，陈其美策动夺取停泊上海的肇和军舰。肇和舰起义失败，陈其美等人很快被袁世凯的优势兵力所压倒，但这一事件对激起反袁舆论却具有政治意义。1915年12月底，蔡锷从云南发动讨袁运动，新的革命热潮扩大到其他省份。袁世凯为了消灭他在上海的敌手终于在1916年5月刺杀了陈其美，袁所派特务使用诡计进入陈家，用枪击毙陈其美。陈其美当时仅四十一岁，他的死是孙逸仙和孙的政治势力上的一个重大损失。

陈其美同时代的人都认为陈其美是孙逸仙的忠诚信徒，是为孙逸仙的事业而坚持奋斗的活动家。陈其美在日本对蒋介石的早期培植具有特别重要意义，蒋介石对这位早期的恩人和至友经常夸赞。陈其美早年的一些密友，例如张群、黄郛、邵元冲、吴忠信等人，以后都成了蒋介石的忠实助手。他的侄儿陈果夫、陈立夫在1924年后国民党的党务机构中起领导作用。陈其美的妻子姚文英（译音）寿命很长，1961年10月9日在台湾逝世，享年八十三岁。

陈 嘉 庚

陈嘉庚（1874—1961.8.12），新加坡橡胶、船运企业家。他以他个人的资金创办厦门大学，他一个人支持厦门大学达十五年之久，此外他还在老家福建集美村创办了一些其他学校。中日战争期间，他任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主席，联络东南亚华侨团体支援中国抗战。1949年后，他住在中国，支持北京政府。

陈嘉庚出生在福建同安县集美村。他父亲陈如松在1880年留下他妻子和两个儿子只身去新加坡谋生。此行颇有成就，虽然并不显著，但他两个孩子因此能于1882年上村塾读书，那时陈嘉庚才九岁。

1890年秋，陈嘉庚十七岁时，第一次去新加坡帮他父亲经商，他父亲主要从事出售大米的生意，1892年担任米店经理的他的叔父离职时，由陈嘉庚代为暂时经营。第二年，陈嘉庚的母亲要他回福建结婚。那时他正是二十岁，他结婚后在家呆了两年，直到1895年才第二次去新加坡，他到新加坡后，从他叔父那里接过那家店铺进行经营。1897年，他母亲去世，但他未能及时回家，到1898年他才回去办丧事。1899年，他带着老婆和幼弟第三次到新加坡。1900年他又回国安葬他母亲。他原来准备即刻回新加坡，但为了照料商务却在厦门逗留了两年，到1903年他才第四次去新加坡。

由于陈嘉庚不在新加坡，又由于他继母（陈嘉庚的父亲已在新加坡续娶继室）挥霍无度，致使家业败落，终于破产。那时已三十一岁的陈嘉庚，并不因此

灰心，筹集了一些资金在1904年开办了一个小规模的红薯罐头厂，不久又开了一家米店。他的红薯罐头生意发展很快，陈嘉庚就自营红薯种植园供罐头厂制作所需要的红薯。

那时，橡胶工业在马来亚才刚开始，前景未可预测。陈嘉庚虽非本地区从事橡胶种植业的第一个中国人，但他是最早从事这项事业的人之一。他起先在他的红薯种植园中试种一些橡胶树，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橡胶业，成为他发财致富的基础。1906年，他还清了他父亲在米店倒闭时欠人家的债务，那时他父亲告老还乡，1909年在福建老家去世。

那时，中国民族革命浪潮波及海外华侨。1905年孙逸仙在日本成立同盟会，1907年在新加坡建立支部，知名的中国人大都参加了。陈嘉庚当时虽未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但他加入了同盟会，在1909年和一些革命同情者剪去了发辫。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受到海外中国人士的热烈欢迎。一个月后，孙逸仙回上海担负革命领导工作时路经新加坡，陈嘉庚答应孙，愿筹款五万新加坡币支持共和事业，陈嘉庚完成了这一承诺。当福建省的领导人随其他各省之后，宣布赞助革命，陈嘉庚从福建同乡中募集了二十万新加坡币，汇给在福州掌权的革命领导人。马来亚的捐献在道义上和钱财上极大地支持了革命力量。

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陈嘉庚以及大多数华侨希望中国的艰难成为过去，而着手国家建设的时候已经到来。陈嘉庚的事业，特别是橡胶种植业蓬勃发展。1912年，他又回到福建，决定着手促进他本乡的儿童教育，他劝导集美的父老们把孩子们送进学校，他的劝说非常见效，因为他准备出资支助这个事业。1912年陈嘉庚创办了小学，以后发展到登峰造极，在1920年建立厦门大学，在中国这或许是由一个人出资办的最大的教育事业了。

1913年，陈嘉庚又去新加坡，这是第五次了。在此之前，他曾尝试在暹罗扩展他的红薯种植业，但未成功。但在新加坡，陈嘉庚的公司仍然控制着红薯罐头工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初对陈嘉庚不利，因为他的红薯在欧洲的销路断绝。但是他在这一行业中的损失很快从其他的行业得到补偿。

1915年，陈嘉庚毅然决定从事航运业，这也许是战时获利最多的行业。他租用了二艘船，来往于新加坡、印度、波斯湾的港口之间。他和政府订有运

输供应物资的合同，因此他获得运输损失得以赔偿的保障。同年，他又将菠萝罐头厂的工人转到橡胶产品制造业。在这之前，陈嘉庚已是一个颇有名望的橡胶种植主，进而生产橡胶制品是合乎自然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陈嘉庚所有的企业中获利最多的是航运业。陈嘉庚从自己经营事业的经验中预感到需要防备租船主停止延长租船合同的危险，因此他自己买了两艘船只，这两艘船只在1918年被德国海军击沉，但船只都是保了险的，陈获得赔偿。

1917年正当陈嘉庚的夫人去世那一年，他已是一名百万富翁了。他感到有财力可以进一步实行改善他故乡的教育事业的计划了。他派幼弟回福建创办集美师范学校，以培养师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陈嘉庚已拥有家财四百万新加坡币，他想退出企业界而从事促进教育事业。他把弟弟召回新加坡经管他的事业，他自己则回到老家督导集美学校和新办的集美师范，他又办了一所水产航运学校。

他在本乡逗留期间，开始他那雄心勃勃的教育事业，准备为福建青年和东南亚青年办一所大学。陈嘉庚献出捐助学校创办基金一百万新加坡币，定名为厦门大学，他审慎地避免炫耀他自己的名字。他希望东南亚地区的其他福建巨富即使目前不能但能在今后支助这所大学，但这一希望落空了。厦门大学于1921年4月6日正式开学，第一任董事会中有黄炎培、蔡元培、余日章、汪精卫等人，陈嘉庚请汪精卫当校长，汪婉言辞谢，乃请北京政府教育部参事邓萃英当校长，邓以保留北京职位为条件，陈嘉庚大为失望，乃请他的朋友林文庆当校长。林医生放弃了他在新加坡收入很多的医生职业来当厦门大学校长，从1921年开始一直到1937年为止。1937年政府当局接管了厦门大学。

由于陈嘉庚在新加坡的企业相当顺利，他想他能长期支持这一所大学。留在新加坡替他管事的弟弟因身体不好在1922年不能再管事了，陈嘉庚又去新加坡。

战后景况依然繁荣，橡胶业尤为发达，陈嘉庚的事业这时候发展到了顶峰，1923—1925年三年间，他累集了资财一千多万新加坡币，其中三百万用于厦门大学 and 集美各学校。他的财产包括一万五千英亩橡胶种植园，几座生胶加工厂、一所锯木厂、菠萝罐头厂和一家米店。他特别注意为他的橡胶产品扩大市

场。但1926年，陈嘉庚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了。

1928年5月3日济南事件后，新加坡华侨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并筹组山东济南惨案筹赈会，陈嘉庚是该会会长。陈嘉庚的《南洋商报》斥责一个新加坡巨商继续进口日货。陈嘉庚指控大火毁尽他的一座主要橡胶厂乃是报复行动。该厂虽因保险而有所补偿，但陈所受损失仍达五十万新加坡币。

由于世界经济萧条，1929—1931年不断给马来亚橡胶投机业以打击，陈嘉庚已趋衰落的财运进一步受到影响。1931年陈嘉庚的经济状况竟至于如此狼狈，他的债主强行将他的全部财产交由债权人指定的监管者监管，陈嘉庚只是保留了月薪很高的公司总经理的职位。他还竭力取得公司对厦门各校的支持。情况愈来愈不妙，1934年初公司不得不清理。好在公司成立之初，陈嘉庚已将资金转移，这才使得陈嘉庚免于个人破产。陈嘉庚在马来亚的橡胶业失败引起南京国民政府的注意，华侨事务委员会曾提请政府给陈嘉庚以援助，但是毫无下文。

陈嘉庚主要关心的是厦门大学的命运。即使在他1934年前处境极为困难的那几年，仍未中断他的支持。同时他和政府协商希望由政府接管这所学校，他又努力争取其他巨富的支持但未成功。1936年，他为厦门大学筹得四百英亩的橡胶种植园，使学校又能维持一年。1936年他的女婿李光前和远房兄弟给了他帮助。经长期磋商后，教育部于1937年接管了厦门大学。

1937年夏，中日战争爆发。陈嘉庚虽已年逾六十而又家财丧尽，但他爱国之心仍未稍懈。1938年陈嘉庚当选为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简称南侨总会）主席，该会旨在动员华侨为中国政府战时所需资金进行捐献，这个总会是十二个地区的地方救济机构的联合组织，有四个机构在英属领地（新加坡、马来亚、缅甸、北婆罗州），其他的在菲律宾、法属印度支那、暹罗、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南婆罗州、香港。但香港救济会从未积极参加活动。上述地区，几乎包括了整个东南亚。居住在那里的华侨的活动一般只限于各自的地区，即使在同一地区，华侨还通常以省籍划分。在此之前，东南亚的华侨从未为一个共同目标团结在一个组织中，陈嘉庚当选为这个组织的主席，突出地显示了全地区的华侨对他的信任。

南侨总会是在1938年10月19日正式成立于新加坡的。选陈嘉庚当会长是得到国民党当局认可的。国民党当局承认陈嘉庚在华侨界的声誉。从1938年到1941年，该会是华侨爱国主义的突出标志。由于种种原因，例如中国币制贬值，各地政府的各种限制，东南亚华侨为支援重庆抗战而募集款额的总数实在无法计算。据陈嘉庚估计：1939年到1941年的三年期间东南亚华侨的捐献平均每月有中国币七百三十四万元，约等于三十五万美元。该会又召请了大批华侨回国支援汽车运输工作（估计在战时超过三千人）。

1939年后半年，经中国政府批准，陈嘉庚组成的回国慰问团，1940年由陈嘉庚率领回国周游全国。此行对他的政治观点有很大的影响，他在重庆虽受到应有的礼遇，但他所遇到的政府领导人却大都使他失望。他曾是1911年前同盟会新加坡支部老会员，但他拒绝了国民党头面人物请他参加国民党的建议。他去中国共产党战时首都延安的访问，使他支持毛泽东。陈嘉庚思想上远非皈依共产主义，但是延安的领袖们的廉洁奉公和工作效能使他印象很深，特别是与那些在重庆掌权的人相比较。陈嘉庚又到了南方各省，曾去福建。他觉得在他访问过的所有地区中他的故乡福建省是最被忽视的地区，此后不久他积极发起驱逐战时国民政府福建省省主席陈仪的活动，但未有成果。

1940年12月31日，陈嘉庚回到新加坡，他虽开始公开抨击国民政府，但仍继续负责南侨总会的工作并为保卫中国筹集款项。尽管陈嘉庚对重庆的领导表示不满，而他个人的廉洁奉公，却为海外同胞所公认，1941年他再次当选为南侨总会会长。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总会的工作结束，他把手头所有的捐款全部汇往中国。

新加坡自日军占领后的境遇，使陈嘉庚无法耽下去，1942年2月8日，陈嘉庚经苏门答腊去爪哇，不久，爪哇也被日军占领。在战争的几年中，陈嘉庚乔装着在爪哇多处居住。1944年初他开始写他的回忆录。陈嘉庚在爪哇能隐蔽居住下来，这是他从早年在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所作的贡献中得到了好处。在爪哇的许多校友在经济上支助他，并设法保护他，以免被日本特务发现。

1945年8月战争结束，陈嘉庚再不用躲藏，他回新加坡去。10月2日，他从爪哇去新加坡途中，参加雅加达为他举行的盛大欢送会，他不顾朋友劝告，

在这次会上坦率陈言。他说，他1940年回国旅行，虽受到蒋介石的善意款待，但是他认为私人感情应与国家利益分开。1945年10月6日，他到达新加坡，10月21日，为他的到达，举行了欢迎集会，在这次会上，他又批评了重庆政府。

早在1945年10月18日，曾在重庆举行了一次公众集会，庆祝陈嘉庚安抵新加坡。此会的十个发起团体大部分是属共产党方面的，但政府方面表示同意，由政府官员邵力子主持这次集会。参加此会的显要人物有黄炎培、柳亚子、郭沫若、沈钧儒。毛泽东派人给大会送去锦旗，冯玉祥为大会撰写了一副对联。

陈嘉庚立即着手结束南侨总会的事务，并开始调查战时华侨所受损失。他还试图缓和战后在新加坡出现的劳资紧张关系。由于日本侵略中国而使华侨空前团结，这种团结在日本占领东南亚后又得到增强，可是随着和平的到来，又趋于瓦解了。尽管陈嘉庚曾在战时危急时期取得成功，但在和平时期，他却无力把华侨团结起来加以领导了。

陈嘉庚见到国共冲突已不可抑制，他深信共产党必定获胜。1946年底，他创办了《南侨日报》，该报成为中国民主同盟在马来亚的喉舌。陈嘉庚本人也越来越多地公开抨击中国国民政府。

1946年9月，他写信给杜鲁门总统，要他停止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在他看来，这种援助只会延长中国内战。1947年12月25日，他写了一篇文章断言美国援助中国国民党必然失败。早在1947年6月9日，他曾发表声明斥责国民政府独裁无能。他的主要论点是：中国虽收复了三万平方公里的台湾，但中国政府却丧失了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外蒙。

1949年初，陈嘉庚又一次回国游历，这次他去到共产党占领的地区。他到北平时正好赶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1949年9月政协正式开会，陈嘉庚以著名的华侨代表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陈嘉庚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49年底，他访问全国各地，在他重访福建时，在集美受到盛大的热烈欢迎。他为了结个人和企业的各样事务，经江西、广东、和香港回到新加坡，于1950年2月15日到达。3月4日，陈嘉庚在一次群众欢迎集会上对共产党新政权大加赞扬。1950年5

月，他出版了一册他的文集，书名《新中国观感集》。

陈嘉庚除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外，又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1953年他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后又当选为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华侨代表，大会在1954年召开并通过了宪法。1958年他又当选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是两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委员。1956年10月，他协助组成了归国华侨联合会，当选为联合会主席。

陈嘉庚晚年在北京和他的家乡福建两头居住。他已年逾八十，身体渐衰。1961年8月12日凌晨在北京去世，临终前他的儿子陈国华在侧。北京许多高级首长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其中包括周恩来、朱德。陈嘉庚遗体葬在他的故乡集美。北京政府为了表彰他，1962年出版了一本附有精致插图的《陈嘉庚先生纪念册》，载有他的生平事迹和逝世时情况。每逢他逝世的日子，还特地集会纪念他。在集美师范学校还为他盖了一所纪念堂。

1920年，陈嘉庚的长女陈爱雷（音）和李光前结婚，就在此时，陈嘉庚指定其女婿为他在新加坡的企业的总经理，其长子陈国青为香港集育（音）银行经理。

陈 锦 涛 字：澜生

陈锦涛（1870—1939.6）他在清政府和民国初期南北政府中历任财政要职，其中有如驻伦敦财政专员、财政总长等。最后他以任南京日伪政府财政部长（1938—1939年）终其生涯。

陈锦涛广东南海人，初受教育后，去英殖民地香港进皇仁书院受英国式的教育，毕业后在书院任职。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他去天津在盛宣怀创办的北洋大学教书。

1901年，陈锦涛由中国政府资助去美国深造，进哥伦比亚大学学数学，1902年获硕士学位。后又去纽黑文进耶鲁大学研究院研究政治经济学，他的学位论文是《社会循环》，1906年他获得博士学位，他是第一个获得耶鲁大学博

士学位的中国学生。他回国后，应清政府考试获第一名，清政府授以进士衔入翰林院，这是清政府在1905年取消科举制后设立的考试制度，此时进士头衔的获得比科举制度时的进士头衔要容易多了，因此，一般不被人重视。由于陈锦涛考上第一名，因此广东人有时候称他为“洋状元”。

陈锦涛在清朝最后五年中担任过多种官职。他先是广州视学，后调为北京视学，后又让他担任财政工作，曾任大清银行稽核，北京财政部预算司长、统计局长。1908年在他任职印铸局副局长后，清政府派他去美、英、法、德四国考察邮票印制技术，了解防止伪造的印制方法。陈锦涛认为美国所使用的方法最佳，他就聘了两个美国专家到北京为印铸局工作，一个原是纽约美国钞票公司铸版部的威廉·格兰特，还有一个是劳伦左·哈奇。

陈锦涛掌管邮票工作短短一个时期后，便去主持币制改革委员会的工作，并任大清银行副总裁。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时又当了清朝最后召开的资政院资政。11月袁世凯出来主持新政府时，袁任陈锦涛为财政部次长，但陈锦涛谢绝了这一任命。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逸仙器重陈锦涛的学识和资历，任命他当财政总长。3月政府的大权由南京移到北京，陈锦涛被任命为财政部次长，但他并未就职。1912年陈锦涛大部时间都在国外，他是出席海牙国际汇票会议和波士顿国际商会大会的中国代表，他还参加了旧金山的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他在1912年9月回北京，被任命为中央审计局局长。

民国初年，虽然那些争权的军人和政客认为陈锦涛是个中立分子，但他仍在袁世凯治下任政府官员。1913年后期去欧洲担任中国财政专员，机构设在伦敦。此后回北京任总统府顾问。1916年公众谴责袁世凯的称帝阴谋但并未影响到陈锦涛的声誉。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但实际上袁世凯原有的权力大部分落在段祺瑞手中。段祺瑞组阁，任陈锦涛为财政总长，1916年夏至1917年10月他还担任代理外交总长，后由伍廷芳接任。

由于他受过美国教育又有在伦敦担任财政专员的经验，因此驻中国的西方外交人士对他很钦佩，例如，当时美国驻北京代表芮恩施曾说道：“他是中国

官场中熟知西方银行财政的少有的一位人物——一个有学问的人，言行稳重，他认真热心地把有效而又精细的现代审计方法推广到政府的各个部门中去”。又说：“见过他的人都对深为信赖”。

陈锦涛身为财政总长并兼任盐务署督办，盐务是一项税收多的美差，向来为中国官僚所垂涎。1917年5月陈锦涛因贪污案被撤去财长职务。据说这是在北京的所谓交通系（见梁士诒）玩弄的诡计。陈锦涛被捕监禁又加审讯。这项诉讼拖了数月，真相很少公布。1918年2月，最后由冯国璋颁发总统特赦命令，陈锦涛才得幸免。

1920年后期，孙逸仙领导的广州南方军政府又任命陈锦涛为财政部长。但是他留在北方恢复他的政治创伤，邀他到广州担任的职务就由唐绍仪、伍廷芳两人分担了。

直到1924年，他一直未公开露面。1924年11月，段祺瑞又出来接过权力，担任北京政府的首脑。1925年陈锦涛再次出任盐务署督办，不久许世英在北京任国务总理时，陈锦涛当上了财政总长。

1926年中，南方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陈锦涛辞去北京财政总长职务，去上海了解时局。当北伐军抵达长江流域时，国民党当局一在武汉，一在南京的两个中心之间的严重分裂进一步加剧。1927年春，南京当局和共产党及武汉国民党的联合破裂。陈锦涛在浙江杭州被捕，监禁了一些时候，据说是因为南京方面怀疑他和武汉政府串通一起。

陈锦涛被释后回到北方转而研究学问去了。1929年秋他被任命为北京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他在清华耽到1930年初，然后暂去天津退休。早在1935年，汪精卫在南京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时，曾邀请陈锦涛出来任职，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请他当币制研究委员会主席。他虽曾去南京为国民政府工作，但以后为日伪政府效劳而终身。日伪政府1938年8月在南京成立，以梁鸿志为首领，它的统治权力仅限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日军占领地区。陈锦涛被请去任伪政权的财政部长，一直到1939年6月他死去为止。

陈锦涛的所作所为，其内在动机是难以推测的。大概说来，国内一般人认为他是一个学者而并非有势力的官僚。陈锦涛对印铸局在技术上的贡献是有用

的。国民初年预算和币制的改革工作，陈锦涛也有其功劳。1928年前，他是北京政府中的一个少有的理财专家，他的技能够得上西方的水平。不幸的是在民国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尖锐的中国派系政治斗争，浪费了陈锦涛的学识，埋没了他的才能。

陈庆云

陈庆云（1897— ），飞行员的先驱人，在军事上协助孙逸仙，训练出不少中国航空驾驶员。1934年任全国航空委员会委员，1936年任中央航空学校校长。1949年去美国居住。

他三岁时就随父母去日本，早年在横滨上学，所以他被视为是一名华侨，但是他却出生在广东。他通过他家在日本的亲戚，对孙逸仙领导的政治活动发生了兴趣。

1916年，孙逸仙在美国的追随者热情支持在美国训练一批中国飞行员的设想。这个计划主要是根据林森的建议确定的，林森当时受孙逸仙委托在美洲负责国民党的活动。第一批选定的中国学生二十人，其中有陈庆云。陈庆云显然是在日本的党部推荐的，又无疑得到孙逸仙、廖仲恺两人的特许。陈庆云到美国，进了纽约布法罗库的斯飞行学校，他在那里完成了训练课程。

他在1917年回国，立即投身于孙逸仙的事业，那时孙逸仙在上海。1918年陈炯明率粤军进福建时，派陈庆云去日本大坂购买飞机。他买了一架旧式库的斯双翼机，飞到福建漳州，成为陈炯明部下的飞行队长。孙逸仙决定在广州成立新政府，以广东为军事根据地进而统一全国。他敦促陈炯明率部队返回广东，以驱走桂军对广东的控制。陈庆云奉命到香港为此次战役获取支援。他途中在澳门买了一架美国飞机，驾机飞到广州，企图使用该机向桂军投掷汽油弹骚扰司令部，造成桂军混乱。孙逸仙在广州这一基地初步稳定之后，在他的大本营里建立了航空局，成立了两个飞行大队，一个由陈庆云指挥，一个由出生于美国的张惠长（1898— ）指挥。

1925年孙逸仙去世后，蒋介石在广东设立了一所航空学校，校长张惠长，教官陈庆云。他的学生中如毛邦初（1904— ）、王叔铭（1904— ），都是以后中国空军的重要人物。1928年广东空军为引起公众重视，举行了两次远程飞行。陈庆云是参加其中一次飞行的驾驶员之一，这次飞行的路程是，广州、汕头、福州、杭州、南京、长沙、梧州、回广州。在中国那时机场简陋又无气象预报，这两次长途飞行可称为壮观。

1929年，陈庆云被任命为广州附近的虎门要塞司令，1931年他又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省公安局长，1934年离广东另任新职。当年南京国民政府把军政部的航空署扩大为全国航空委员会，陈庆云是其中的一名资历较深的委员。1936年他被任命为杭州中央航空学校校长。1937年日军入侵，政府撤迁，陈庆云随同航空学校迁到云南昆明。国民政府计划动员华侨捐款，购买抗战需用的飞机，为此设立了一个团体。陈庆云在这团体中担任了重要职务。1938年他出国去南、北美洲，长达一年之久，向那里的华侨募集基金。他回国后在1941—1944年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海外部次长，1945年任部长，1949年辞职去美国居住。

陈庆云作为国民党官员的经历是相当平稳的。他在党内地位的递升完全靠他早年和孙逸仙的关系。他引人注目的主要原因是他早年当飞行员的功绩，那时中国的航空事业还在非常初级的阶段，而这项事业的发展主要靠陈庆云这样坚毅的人才。

陈庆云和黄淑香（音）结婚，有子一人，女四人，都在美国读书。

陈炯明 原名：陈捷 字：竞存 赞三

陈炯明（1878.1.13—1933.9.22），反满革命家，民国初年广东都督，1913年，袁世凯撤了他的职，乃参与反袁活动，统率孙逸仙护法军。1920年10月他进占广州，孙逸仙任命他为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1922年，孙逸仙撤了他的职，从此不再支持孙逸仙。不久他占领广州，1923年又被逐出，1925年为两次东征军所击败。

陈炯明广东东部沿海的海丰人，出身于旧式士绅家庭。陈炯明三岁时，丧父。他父亲在1878年中秀才，陈炯明在私塾中受学，1898年二十岁时中秀才。陈炯明青年时受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运动的思想影响。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他和一些同学组织了一个社团研究近代政治和军事。1903年清政府改革教育体制后，陈炯明进了新成立的海丰短期师范学校学习，1906年他二十八岁时又在广州进了广东政法学堂学习，1908年毕业。

这几年中，陈炯明对国事日益关心。1908年初他在海丰组织了一个秘密革命团体，他在本县日趋活跃。1907年4月，惠州府官厅行事不轨，陈炯明率众前去斥责。不久，他又和同伴在海丰组织了一个议事会，主张地方自治和禁绝吸食鸦片。1909年，他们在海丰创办了《自治报》，由陈炯明主笔，该报着重宣传海丰地区的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必要性。

1909年，清政府预备立宪，令各省设咨议局，陈炯明被选为广东省咨议局议员。9月咨议局开会，陈炯明在会上竭力要求消除在省政方面的一些弊病，特别是禁赌，他认为赌博是广东民众的最大恶习。1909年底，陈炯明为广东咨议局三代表之一去上海出席全国咨议局代表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要求清政府从速行宪组成立宪政府。陈炯明在上海时和一些革命首领有来往，正式加入了同盟会。

1910年初，陈炯明回广州，继续在咨议局中力促禁烟禁赌，同时还开始积极参加革命运动。1911年3月，他在邹鲁、朱执信协助下，创办了一份《客报》，除推动禁赌运动外，又在广东军队中进行革命宣传。同时，他和同盟会的领导人一起准备于4月27日由黄兴领导在广州举行大规模武装起义，以后称为黄花岗起义。陈炯明在参加这次失败的起义后，逃到香港，黄兴、胡汉民也去香港避难。这次起义后发生的一件事是一份有争议的关于起义的报告，这份报告由受伤的黄兴口述，胡汉民笔录。在口述中，黄兴指责了一些参加起义的领导人贻误军机，其中包括陈炯明和胡汉民的堂兄弟胡毅生。据说笔录时，胡汉民加以篡改，为其堂兄弟开脱，把责任都归于陈炯明。此举激起陈炯明对胡汉民的忿恨，也可能是他以后脱离革命党的一个原因。

武装起义接连失败，使革命党人士由灰心丧气转而走向绝路，采用暗杀手

段。1911年夏，陈炯明和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及在香港的另一一些人，准备在北京、广州等地刺杀几名满清大臣。他们的计划尚未成熟，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陈炯明急于赶回家乡，率领部队向惠州进军。11月，清军投降，陈炯明占领惠州后，他自封为由东江流域的几支地方部队组成的革命军首领。他在惠州的胜利，直接影响到全省的军事形势。广州很快转入革命党手中，宣布广东独立，举胡汉民为都督。1911年11月18日，推陈炯明为副都督。月终，他亲自带领了一批人马进入广州。12月，据说胡汉民因陈炯明一伙的压力而辞职，去南京投奔孙逸仙。陈炯明促使临时省议会选他自己为广东代理都督，不久又选举为广东征讨军总司令。

陈炯明成为广东省政府中的军政首脑后，他企图实施他的禁赌禁烟的愿望，他还倡议了一项拆除广州旧城城墙、重建广州的计划。但他的当政期在1912年春结束了，当时，孙逸仙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和胡汉民一起从南京回广州。陈炯明不能肯定革命首领们能否容纳他，因此他跑到香港去了，把广东省都督的职务留给原任者。后来，他获得胡汉民不会对他怀有恶意的保证，才回到广州，接受新政府的聘请，出任广东绥靖处经略，绥靖处专管剿灭省内盗匪。1912年冬，总统袁世凯任命陈炯明为广东护军使，原清军广西巡防营济军统领龙济光为护军副使。

陈炯明据此护军使的职位经常排挤胡汉民而设法增强自己的势力。据悉袁世凯任命陈炯明为护军使，是为了挑拨陈、胡之间不和这一特殊目的，这是袁世凯破坏国民党势力的全盘战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这表明袁世凯和国民党之间争夺权力的第一次较量的开始，在1913年夏季的所谓二次革命时则达到了高潮。6月14日，袁世凯任命陈炯明继胡汉民而为广东都督。但当袁世凯开始向南方进军攻击安徽、江西的国民党军时，陈炯明几经踌躇后，决定与国民党和其他南方的讨袁势力共命运，他在1913年7月18日宣布广东独立。袁世凯令龙济光率军攻入广州，驱走了陈炯明，龙济光取代了陈炯明广东都督的地位。陈炯明于8月4日逃离广州去香港，不久又和他的少数几个同伴去新加坡。

陈炯明在马来亚逗留了两年多，其间曾于1914年去过巴黎一趟。当时，孙

逸仙在日本改组其革命政党为中华革命党，要求全体党员履行表示效忠和服从的书面誓言的手续。陈炯明等几个老党员拒绝依从孙逸仙的要求，他们无视党的改组，仍自认为国民党党员。1915年夏，袁世凯的一批支持者拥袁称帝。陈炯明、李烈钧、熊克武等一些国民党中的反对派在新加坡组织了一个《水利促成社》，这个组织的秘密目的是为支援国内的反袁运动在华侨中筹募经费。

1915年底，爆发了由蔡锷领导的云南起义，这一起义标志着全面讨袁斗争的开始，陈炯明赶到香港，秘密回东江地区，招集了一支武装力量反对龙济光，龙是袁世凯在广东的主要武力支柱。1916年春陈炯明部攻占东江博罗，但多次进占惠州的战斗均告失利。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讨袁运动结束，继任总统黎元洪下令停战，但是广东方面继续攻打龙济光，至10月，龙济光终于失败。这时，陈炯明把他的军队交由新都督朱庆澜指挥，他本人则到北京去了。

陈炯明在民国的首都北京，向黎元洪表示敬意。1917年上半年他遍游华北各地，到过山西和南满。是年夏，他在回南途中，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发动了一次政变，解散国会，迫总统黎元洪辞职。陈炯明把他与孙逸仙的分歧暂置一旁，在上海站到孙逸仙一边，支持护法运动，护法运动的目的是迫使北京新成立的政府恢复1912年的临时约法和国会。7月，陈炯明和孙逸仙、程璧光上将，趁程的军舰到广州。孙逸仙在广州成立军政府任大元帅，反对北京的段政府。但是当时广东的军权实际上操在以陆荣廷为首的广西军人手中，陆荣廷在1916年反袁运动和把龙济光驱出广州的行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起先，陆荣廷答应支持护法运动，但当他在湖南达到了他的军事目的之后，他对反北洋军阀就没有多大兴趣了。孙逸仙及其追随者决心把护法运动的斗争坚持下去，促使同情这一斗争的省长朱庆澜，把他的二十个营的警卫部队交由陈炯明指挥。广西军人多方阻挠，但陈炯明最后还是统率了这些部队。1918年1月，他把部队改组为援闽粤军，誓师护法率部向福建开拔。

孙逸仙的意图是想把护法战争扩大到福建，陈炯明则显然企图用他的军事力量在广东东部建立一个军事据点，1月下旬他到汕头后，化了好几个月在那里加强他的地位。与此同时，广东军政府自从由桂系军阀操纵改组后，孙逸仙

退出了军政府离广州去上海。途中，5月下旬他在汕头停留，催促不愿前进的陈炯明继续向福建进军。6月间粤军向福建挺进，1918年8月底，攻占漳州，陈炯明设司令部于此。

陈炯明在漳州两年期间，他在他控制的闽南和粤东地区推行一项巩固军力和发展经济的计划，同时他又热心教育事业，创立了一些学校，并派当地青年去日本和欧美留学，其中包括像彭湃这样未来的共产党领袖人物。陈炯明在这些方面的活动给受五四运动新的爱国思想鼓舞的中国知识界的年青一代以深刻的印象，他们认为陈炯明和他的粤军是当时少数进步势力之一。陈炯明对俄国布尔塞维克革命后传入中国的新的政治思想也开始发生兴趣。1919年春，他在漳州办了一份《民声报》，他在《民声报》上，表示赞同社会主义的目标。该报有一期刊载了致苏联十月革命节的贺信。这些具有好感的重要表示，引起俄国驻华代表的注意，1920年4月，一个苏方代表秘密到漳州，表示愿给经济资助，陈炯明谢绝苏联的帮助，他给列宁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中国情况和俄国并不一样，因此社会主义在两国的的发展应有不同的过程。

朱执信、廖仲恺、蒋介石等革命党人常去漳州探望陈炯明，陈炯明通过他们保持和在上海的孙逸仙的联系。在护法运动失败和广东军政府处境恶化后，孙逸仙定出了另一行动步骤：在广州成立新的国民政府，以广东为统一全国的军事基地。1920年初，他派出密使去漳州，敦促陈炯明率领军队回广东逐走桂系军阀。直到8月，陈炯明才撤出漳州返回广东。经两个多月的战斗，粤军由本地民团帮助，于1920年10月26日击败桂军攻占广州，孙逸仙得到这一胜利消息后，立刻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他本人也准备回广州。

陈炯明再次获得了省长地位，便致力于家乡广东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他首先采取的措施有，把广州改为市，成立市参议会，任命孙逸仙的那位受过美国教育的儿子孙科为市长。其他改革和建设项目，有恢复他原来实行过的禁烟禁赌，普选地方长官，推行地方自治政府，计划建设全省公路网。他还重视使广东教育制度现代化的问题，为此目的成立了广东教育委员会，并由陈独秀为主席，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领袖之一，他不久以前在上海创立了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当时，陈炯明自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思想的信奉者，所以让陈独

秀在教育界放手工作，不管当时有陈独秀利用他的地位在广州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传说。陈炯明并委派他的学生彭湃负责海丰的教育工作，鼓励他在该县开展他早已着手的土地改革、组织农民的工作。

当陈炯明正忙于处理省内事务时，孙逸仙回到广州。孙逸仙于1921年5月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并宣告他关于在新政权领导下统一全国的意向。几个月后，他宣布进行北伐，令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负责攻击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陈炯明的部队很快越过粤西，于1921年6月26日攻克了梧州，接着在广西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九月底，陆荣廷军全部溃散，全省归入广州政府的统治之下。孙逸仙受到这些军事胜利的鼓舞，便决定北向两湖进军。那里是强大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的地区，因此，孙逸仙和吴佩孚在北方的主要敌手张作霖、段祺瑞结成联盟。

但是，陈炯明的个人野心和孙逸仙的革命目标发生了冲突。陈炯明成为国民党员已有多年，又是广东省党部的首脑，他在1920年之所以成为广东省长，主要是仗着他和国民党的关系。然而，他从来不是孙逸仙的忠实信徒，也不同意孙逸仙要求革命党的参加者履行向孙表示忠诚的书面保证手续。再者，陈炯明长期以来一心想成为统管广东省各项事务的有权有势的人物，他在取得省长职务后，愈益不愿孙逸仙和广州新的革命政府分享他在广东省的权力。他特别反对孙逸仙以广东为基地武力统一全国的计划，这一点，他得到久经战祸的广东老百姓极大的支持。陈炯明作为省长，虽还表示出一点进步倾向，但是他不愿意卷入和强大的北方军阀的争斗之中，他所关心的主要是在他领导下他的家乡广东省的发展。他为了反对孙逸仙加强国民政府集权的意图，赞同湖南赵恒惕和其他一些军阀所主张的中国实行联省自治体制。

当陈炯明得知孙逸仙准备进军湖南的计划，陈随即表示不愿参加。但孙逸仙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将计划实施，于是他到广西和陈炯明商量，他觉察到难以把陈争取过来，就提出了一个切实的妥协方案：孙逸仙督导从广西进攻湖南的战役，陈炯明回广州为北伐筹集经费，在掌管广东省的事务方面，陈炯明有独自处理的权力。11月初，陈炯明据此提议返回广州。但不久，事情就很明显了，陈炯明为了巩固他对广东省的统治，准备和国民党断绝关系，与直系军阀

联合。1921—22年冬他停止向孙逸仙的北伐军供应早已允诺的给养，而和湖南省长赵恒惕及吴佩孚秘密约定多方阻挠北伐军在湖南的进军。1922年8月，孙逸仙的最坚定支持者之一、粤军参谋长邓铿在广州被刺，陈炯明矢口否认，但公众舆论认为此事是由他干的。

此时孙逸仙终于明白陈炯明已不可依靠，他把北伐军从湖南撤回，迅速向广州进发，四月中抵梧州，孙逸仙令陈炯明前来孙的司令部。陈炯明虽不愿遵命前去，但当时又不便公开抗拒，因为他还有不少部队留在广西。他未去梧州，只是提出辞呈，离广州去他惠州的基地。孙逸仙被陈的抗命所激怒，解除了他的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职位。孙逸仙认为陈炯明再不能与他对抗了，乃于1922年5月4日又开始北伐。

孙逸仙的军队刚向粤北韶关进发，陈炯明的部队由陈的部下叶举率领从广西返回，占领了广州。孙逸仙令叶举率军加入在江西的北伐队伍，叶举置之不理，反而要求恢复陈炯明的原职。孙逸仙加以拒绝，但为表示和解起见，任陈炯明为新设的两广军务总监，陈炯明拒绝了这一任命，6月1日孙逸仙即将他设在韶关的司令部迁回广州，设法解决在广州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但是，孙逸仙此举反而使陈炯明及其支持者壮了胆，他们认为和这个革命领袖公开决裂的时机已到。陈炯明部下的叶举、洪兆麟等人，与北方取胜的直系军阀相呼应，6月11日要求广州、北京两个敌对政府的两个总统孙逸仙和徐世昌辞职，而由前总统黎元洪统一全国。当日晚，叶举的部队在广州市北部集中准备进攻总统府。孙逸仙事先预知兵变，逃到珠江上的一艘军舰上躲避，下令在江西的北伐军回师进攻广州，但在以后的几个月中，这一支部队也被陈炯明部队击退。在孙逸仙离广州去上海后，8月15日，陈炯明由惠州回到广州，重新担任粤军总司令。

陈炯明的胜利为时不长。北伐军余部由许崇智率领沿广东边界进入福州，遵照孙逸仙在上海下达的指示，从东边再次进攻广东。当时，孙逸仙又得到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的支持。1922年底，这些军队再加上从陈炯明部队中倒戈过来的部队一起围攻广州。陈炯明对此联合进攻力不能支，于1923年1月15日，他宣布辞职，回老家海丰转了一下后，就到香港去了。2月，孙逸仙回

广州，重建1917年的军政府，任大元帅。

陈炯明虽被逐出广州，但他在广东继续保持拥有军事实力的地位达两年多的时间。1923年初，他的主要部下叶举率领陈的基本上完整的部队撤退到惠州，5月，洪兆麟及其他军官所属部队重新又控制了汕头和粤东附近的地区。陈炯明从香港返回惠州，重新调整这些部队，11月间，对广州发动了一次进攻。其部队在抵达广州近郊后，被孙逸仙的滇桂联军击退。陈炯明在东江的部队在1924年一年中一直是孙逸仙再度成立的国民党广州政府的严重威胁。1925年1月，孙逸仙离广州，作最后一次北京之行，陈炯明着手再次袭击广州。为对付陈炯明的进攻，国民党政府由许崇智率军发动东征。次月，东征军右翼军由黄埔军校的学生组成，在校长蒋介石率领下，在接连几次的交战中击败了陈炯明的部队，3月底，占领海丰、汕头和大部分粤东地区。

陈炯明的部队战败，他本人去上海。但是到1925年夏，广州国民党领导层内部发生不和，陈炯明余部趁机又夺回了东征中丧失的大部分地盘。9月，陈炯明去香港，准备借助于吴佩孚的军舰，并和国民党内的熊克武叛军合作，把国民党势力逐出广州。然而，十月初，广州政府发动了由蒋介石率领的第二次东征。1925年10月15日，陈炯明的惠州据点落入蒋介石的部队手中，接着在11月初东征军又肃清了广东省内陈炯明的残部。

陈炯明在丧失其军事力量后，在香港定居，继续用政治手腕与国民党为敌。他被选为旅美华侨的一个政治团体中国致公党的总理，它是由早先秘密组织洪门会演变而来的。1926年2月，他组织了致公俱乐部，又在澳门、广州湾、厦门和马来亚等处设分部。1927年，他向全国发表公开声明，提出他关于统一中国的主张，他这项公开声明在1928年题名为《中国统一刍议》发行出版，章炳麟写了一篇序言，该书建议取消北方的军阀政府和南方的党派政府，并提议按建立联邦政府的原则来统一全国。但他的意见并不被人注意，该书出版后一月内，北京就落入国民革命军手中，国民党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1928年冬和1931年冬，他先后去华北和段祺瑞及其他失势的北洋军阀会晤，他们组织了“共和大同盟”反对国民党。1931年10月，陈炯明在香港设立了中国致公党中央总部，并制定了政纲，以含混笼统的条文提出了社会主义目

标。陈炯明不再拥有军事基地，因此他对中国的局势也就起不了什么作用了。他在1925年后组织反对国民党的政治力量的尝试，并未得到很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

1933年8月，他患肠炎进医院治疗，9月11日病逝，时年五十五岁。1935年4月，他的遗体由香港运往惠州埋葬，这里曾经多年是他在广东的主要军事基地。

陈炯明于1899年和当地一黄姓女子结婚，有儿女八人，最小的三个是儿子：定夏（音）（1917——）、定煌（音）（1923——）和定炳（音）（1925——）。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关于陈炯明的主要记载是他在1922年叛变孙逸仙以及以后不断反对国民党的史实。由于这些活动，国民党撰史人从不宽恕他，把他描述为革命事业的叛逆者，从而抹杀了他早期对国民党的成就所作的贡献和他在担任广东军事首领和省长时所起的重要作用。在陈炯明叛离之前，他任粤军司令时所建功勋是国民党能再次把广东作为革命军事基地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他在1921——22年任省长时，对行政工作和教育事业作了不少改进，他对政治上先进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彭湃等人的扶植，使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广东的发展有了良好的环境。

陈友仁

陈友仁（1878—1944.11.20），反帝人士，政论家、律师、政府官员，孙逸仙的亲信。以杂志编辑和政治文书撰稿人而知名。

陈友仁生于英属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岛圣费尔南多。他父亲陈康臣（译音）原籍广东顺德，据说他曾在太平天国军中服役，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太平天国失败他逃到西印度群岛，以理发为生。别人叫他阿陈，先到牙买加，后去马提尼克，在那里他和一个广东侨民的混血妇女结婚。这对夫妇移居到特立尼达，他们抚养六个孩子，五个男孩，一个女孩。陈友仁是长子。

陈友仁的外国姓名是尤琴·贝纳特·阿陈，进了圣费尔南多市立学校，后又进了西班牙港的圣玛丽罗马天主教公学。离校后在特立尼达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同时还为本地报刊写文章。当他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最高法院取得律师、财权诉讼师和公证人的资格时，他就开设了自己的事务所，以后他又取得法律辩护士的资格。他一直开业从事律师事务，直到1911年他离开这里，他的成就引起了同行们的妒忌，结果他成了种族歧视的牺牲者。

1911年他到伦敦，暂时当一名辩护士。同年底，他遇到孙逸仙，当时孙已获知武昌起义的消息，由美国经英、法回国担任公认的革命领袖。孙逸仙赏识陈友仁通晓法律，劝他回国为祖国利益贡献才智，随之在1912年初，陈友仁到达北京。9月，他被任命为交通部法律顾问，他担任此职直到1913年国民党的所谓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孙逸仙及其大部分追随者逃到国外时为止。

然而，陈友仁仍留在北京，任北京英文《京报》主笔。起初，他支持袁世凯统一全国，但是，当1915年底袁世凯准备实行帝制，陈友仁则加以反对。他在《京报》上发表了梁启超的《异者所谓国体问题》一文。1916年袁世凯死后，他继续贯彻公开批评政府的编辑方针。1917年5月18日，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出卖中国》的文章，揭露内阁总理段祺瑞和日本就日本控制中国军队正在进行秘密谈判，第二天陈友仁被捕入狱。据说，他自称系英国公民，要求英国驻北京公使馆干预而未成。不久，总统黎元洪下令将他释放，但《京报》停办。

此时，黎元洪受北方军阀的压力解散国会，孙逸仙发动了“护法运动”，孙逸仙由海军支持，会同一部分议员去广州召开了一次残缺不全的国会，由此而成立了以孙逸仙为首脑的南方新的军政府。陈友仁在广州和孙逸仙会合。1918年夏，陈友仁和郭泰祺、王正廷一起去美国，争取美国对广州南方政府的支持，但并无结果。

1919年陈友仁在法国，任出席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中以伍朝枢为首的南方代表的顾问。他为代表团起草了一些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要求废除1915年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以后他又去伦敦和欧洲其他城市游历，直到1920年夏才回国。那时他到上海，创办了《上海时报》，该报多少保持了《京报》的编

辑方针。

1922年，陈友仁重返孙逸仙处，任孙的外事顾问，是年冬，他参加孙逸仙和苏联代表越飞在上海举行的会谈。1923年1月，签订孙文越飞宣言，这标志了陈友仁在政治上明显地向左转变以及反帝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表露，这成为今后几年中陈友仁的政治态度的特征。

1923年2月，忠于孙逸仙的军队把陈炯明逐出了广州和附近地区后，孙逸仙回到广州，重建军政府，恢复大元帅职务，陈友仁很快回来任孙逸仙的外事顾问。1924年8月，广州商团准备叛乱，广州政府事先截获了接济他们的一批军火。英国当局图谋干预，以动用英国海军威胁孙逸仙。1924年9月1日，孙逸仙向世界发表声明并照会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对英国的“血腥的帝国主义”行径表示强烈抗议。这一些文件，都由陈友仁起草。10月底，商团又准备叛乱，于是孙逸仙组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特别委员会应付这一局势，委员会中除陈友仁外，还有许崇智、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谭平山。10月15日商团发动武装暴乱，但迅被扑灭。

1924年10月晚些的时候，孙逸仙应冯玉祥、段祺瑞邀请去北京商谈国事，陈友仁是孙的随从人员之一，担任孙的英文秘书，汪精卫则担任高级中文秘书。孙在北京卧病，1925年2月下半月当孙病势加剧时，一份政治遗嘱和一份家务遗嘱均由汪精卫起草经孙逸仙同意。1925年3月11日孙逸仙临死前一天，孙逸仙在至亲好友前签署遗嘱。陈友仁起草了一份孙逸仙致苏联遗书，重申国民党在为中国摆脱西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同苏联合作的政策。这封遗书经宋子文宣读后，由孙逸仙签署。这个文件后来在国民党内部引起很大争论，有些人认为孙逸仙在弥留之际，不可能充分考虑这份文件的内容。

孙逸仙逝世后，陈友仁仍耽在北京，编辑以中英两种文字出版的国民党的《民报》。8月，该报误刊张作霖死讯，陈友仁曾把张作霖称为“屠夫”，因此陈友仁被捕，解送天津监禁。1925年12月，冯玉祥的部队进占天津，陈友仁重获自由。他回到广州，新的国民政府已于1925年7月在广州成立。

1926年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友仁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1926年5月，广州政府的外交部长胡汉民离广州去上海，乃任命陈友仁为

外交部长。1926年6月，陈友仁被提名与宋子文、陈公博组成三人代表团与香港当局商讨1925年开始的香港反英罢工的解决办法，1926年9月，罢工结束。陈友仁还曾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向美国驻广州领事抗议拟订在北京召开的关税会议。

此时，北伐在总司令蒋介石统率下，于1926年7月从广州出发。10月，汉口落入国民革命军手中，11月中，广州政府派出五人委员会去武汉研究政府迁徙问题。这五个人是陈友仁、宋子文、孙科、徐谦、鲍罗廷。1926年12月13日，抵达武汉的领袖们组成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联席会议，作为重建中央政权时的临时权力机构。徐谦任主席，委员中有孙逸仙夫人，陈友仁以及其他从广州派来的先遣组成员。这个联席会议是1927年1月1日起在武汉正式行使职权的国民政府的核心。

陈友仁充分体现了他的反帝政策。1926年12月有十四名国民党员在天津英租界被捕后解送奉军，陈友仁为此以国民政府名义向英政府提出抗议，他义正辞严地指出英政府对其后果应负全责。那时，英国新任驻华公使兰普森去武汉视事，陈友仁于1926年12月11日会见兰普森，陈友仁向兰普森提出一项要求，即国民政府必须提取一部分关税余额。12月31日，陈友仁通电美国国务卿凯洛格，表示中国国民政府反对英国将华盛顿会议关于课征关税附加税和该项税款悉数交给征税口岸当局的决定。

1927年1月初，汉口工人示威游行，与守卫英租界的海军陆战队发生冲突，国民革命军强行收回英租界，交由陈友仁、孙科、宋子文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管理。几天以后，也以同样手段收回在九江的英国租界。日本和法国驻汉口的领事向陈友仁探询，日、法租界是否亦将有所变动，陈友仁答以租界必须无条件交还。1月中旬，外国战舰在上海集中。

当时，英国驻北京公使馆代理参事欧玛莱从英国驻汉口领事那里接过谈判事宜，陈、欧1927年2月19日和3月2日的换文，确定两地租界交还中国。陈友仁在外交上的胜利好象是达到了，似乎他为中国开创了一个革命外交的新世纪。南京的1927年的3月事件反映了同样的反帝情绪，在这次事件中，一些外侨被杀伤，外国财产亦遭破坏，外国企业尤其是设在汉口工业中心的纷纷被迫停闭，外侨也开始撤离长江流域。

但是，敌对势力也同样在活动。外国列强在上海调集了精锐部队，有些国家动用海军进行炮轰，以保护它们在南京的侨民。1927年4月3日，中国的游行示威群众袭击汉口日本租界，日陆战队当即用机枪扫射。陈友仁的所谓革命外交显然激起了强烈回击。鉴于国民政府与外国列强的关系上所遇到的困难，陈友仁准备使其政策转向缓和，但是那时要想改变政策已为时晚了。由于1927年4月张作霖在北京对苏联使馆进行突然搜查，陈友仁只得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表示“郑重道歉”，同时他谴责了北京外交使团对此事的怂恿。北京的事件不过是国内对武汉政府过激行动的第一次回击而已。几天以后，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对峙的国民政府。从此，陈友仁和稳健的南京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争执不休。5月间，他向国民革命军提出，要他们区分反帝和排外，这在当时还是难以分辨的。

1927年4月汪精卫从欧洲回国主持武汉政府。他原是一个稳健派，几个星期后，他对在他政府中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所推行的不断发展的过激政策表示不安，7月间，他开始清除这些势力。陈友仁、孙逸仙夫人、鲍罗廷等人从此去苏联了。

陈友仁到莫斯科后又去西欧，在那里旅居了三年。1929年2月宁汉合流执行保守政策，陈友仁被选入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政治会议，但这两项任命不过是形式而已。1931年2月，陈友仁才回到英国的殖民地香港，3月，胡汉民在南京被蒋介石拘捕，促进了新的反蒋联盟在广州组成，联盟的参加者有汪精卫、孙科、伍朝枢、唐绍仪，并得到两广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的支持，5月间在广州成立了一个反蒋政府，任陈友仁为外交部长。7月，陈友仁去日本为广州政府筹集军械、聘请顾问。这一行动从孙逸仙的泛亚洲主义的角度来说是合理的，但和陈友仁早年的反帝主张是不相符合的。尤其是执行这一使命正值中日之间在朝鲜和满洲发生流血冲突，因此，陈友仁此行受到普遍的谴责。

广州南京间的内战危机，因1931年9月日军袭击沈阳而消除，广州的分裂政府解散。12月29日，孙科在南京任行政院长，陈友仁任外交部长。1932年1月24日，陈友仁任职不到一个月就辞职了，因为他所主张的政策，在政府同僚

中得不到支持。第二天，孙科本人也辞职了。

陈友仁离开南京后在上海住了一些时候，1932年5月，他提出了改组国民党的要求，并预言日本和美国之间战争不可避免。1933年3月，他敦促美国干预中日冲突以免发生他所预言的更大规模的战争。当时，南方的一些首领成立了西南政务会议，使两广的地方行政事实上处于自治地位。政务会议的实权虽然操在两广军人手里，但也得到一些国民党元老如胡汉民、唐绍仪的支持。1933年5月陈友仁被任命为政务会议委员。

陈铭枢获得蒋光鼐和蔡廷锴率领的著名的十九路军在军事上的支持，以及李济琛的合作，于1933年11月发动了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了所谓人民革命政府。陈友仁和他同在武汉的同事徐谦亦是事变主要参预者，陈友仁任叛乱政府的外交部长。叛乱为时很短，1934年初，蒋介石轻而易举地将其扑灭。陈友仁因参预事变，被开除出国民党，他就退休去欧洲了。

1937年7月中日战争发生时，陈友仁正在巴黎，他应宋子文、王宠惠邀请回国，1938年10月到达香港。陈友仁虽又进入了国民党，但不愿参加战时政府，他在香港发表声明，要求蒋介石将政府的领导权交给五人委员会。1939年，欧洲爆发战争，他主张中国发表一项支持法英的声明。他谴责1939年9月的德苏条约和11月苏联入侵芬兰。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被日军占领，他在那里被拘留一段时间，然后于1942年春被解到上海。他在上海对日方劝诱他参加南京日伪汪精卫政府的活动坚决予以拒绝。陈友仁虽然身居敌战区，但仍放言无忌，斥责汪伪政府的和平政策是“傀儡的和平”。1943年时流传说他进了南京政府，据说他为此曾指摘日本军部的一些人是“一伙骗子”。他居住在上海一直到1944年5月20日去世，时年六十六岁。

陈衡哲 西名：莎菲

陈衡哲（1890.7.12— ），中国第一个女教授，曾在国立北京大学和国立

东南大学教西洋史。早期和胡适一起，用白话文写短篇小说和新诗。她除了给杂志写文章外，还创办了《独立评论》。她和任鸿隽结婚。1949年后他俩住在上海。

她家原籍湖南衡山，她本人在江苏常州出生。她的祖父陈忠英（音）、父亲陈涛（音）都做过县知事，是有名的学者和诗人。陈涛的母亲和妻子庄亚芙（音）都是有才艺的画家。陈衡哲就生长在有教养的环境中。她有兄弟两人，姊妹五人。

1903年陈衡哲十三岁时第一次离家，受了十一年中国的基础教育。她舅父庄恕谦对她影响很大。庄家是常州四大名门之一，是一个具有学问和担任官职的世家。庄恕谦精通中国经书古籍，由于他的求知心切，对西方科学文化非常喜欢，在多方面进行了探索。他希望他的甥女能以那些离开家乡到中国工作的有文化的和自立的西方妇女为榜样，她们与惯于屈从的中国妇女完全不一样。庄恕谦有一种论点，他把人分为三类：自求出路者，安于现状者，怨天尤命而无济于事者。他预言陈衡哲会成为第一类的人物，但他对陈衡哲说，要成为一个有自主力的人必须要有知识，不仅要有中国古代留传下来的知识，而且要从新式学校里学得西方知识。他强调青年一代应努力比老一辈更多地了解世界情况。陈衡哲由于听从她舅父的教诲，因而树立了要求学习和要求自立的愿望。

1911年前，她父亲在西南任官职时，她父母了解到陈衡哲要求受新教育的愿望，便让她住到广州庄恕谦家中。那时广州只有一所妇女可以入学的学校，是一所医学院，由于她年龄太小而不能入学。她舅父就以报纸、杂志、现代教科书为教材，亲自教她，另请了一个教师教她数学。她还从她舅父的言谈中获得从科学到道德观的广泛知识。庄恕谦后来调去粤南廉州新军当军官。他虽然很忙，但对甥女的课业从不疏忽。家庭授业终不过是一个过渡办法，因此，她舅母回江苏探亲时，就带陈衡哲到上海进了庄恕谦的朋友蔡元培所办的爱国学社。不幸，蔡元培不久离开上海，这所最早创办妇女教育的学校停办了，陈衡哲在上海进了另一所新设的女子学校，在那里上了三年学。但这所学校十分平庸，陈衡哲虽也学了一点英语，而其他方面得益甚微。

陈衡哲已到了传统的女子婚嫁的年纪，他父亲为她选了一位青年配偶。陈

衡哲得此消息后，经历了一场个人的大灾难，她追求知识和自立生活的渴望同她对父亲的责任感发生了痛苦的冲突，最后还是得到她父亲的允诺解除了婚约。1912年，当时她因违背父志情绪上仍然郁郁不乐，而又遇到经济上的困难和她对在上海的学校教育的不满，因而她离开上海去苏州附近一个小镇上姑母家居住。她姑母比她父亲长二十岁，是一个了不起的妇女。她坚毅勤奋，在成日操劳家务后，又常常在晚间学习直到凌晨三时，六时又起身奉侍她的公婆。她写得一手好书法，善于治家，长于烹饪而又精通诗、史和医道。但她家门不幸，丈夫和儿子都吸鸦片烟。她特别钟爱陈衡哲，在一段困难时期中，以她的力量支持了她的侄女，1914年春，她从友人处为陈衡哲谋得了一席家庭教师职位。

1914年夏，清华学堂在上海招考留美学生，清华学堂是当时一所政府以庚子赔款作为奖学金选送去美国留学的学生的预课学校。妇女准予参加考试这是第一次。陈衡哲在她姑母的鼓励下参加考试并被录取。她舅父当时在北京，从报上知道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等不及陈衡哲来信，马上写了一封贺信给她，表示他的自矜和骄傲。

1914年陈衡哲乘船离华去美国。当年，她为了准备进瓦塞学院学习，她先在纽约波基普西的一所女子学校帕特南堂攻读。1915年秋她进了瓦塞学院一年级，取西名为莎菲。那一年连同陈衡哲共有两名中国女生入学。在学院生活称心愉快，她在学习上进步极快。她决定以历史为主修课，在历史系主任沙罗门和欧洲史教授埃勒里能干的指导下学习。

1916年夏，她在纽约伊萨卡度假，遇见了她未来的丈夫任鸿隽，他正由康奈尔大学毕业准备进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化学。此后，他们两人经常通信。任鸿隽和另一个中国学生胡适那时主编《留美学生季报》，邀陈衡哲撰稿。他们三人在通讯中经常讨论胡适提倡用白话文创作文学作品的的主张。陈衡哲赞同这种主张，用半文半白的散文体裁创作了她第一篇小说《一天》，生动描写了学院生活，发表在《季报》上。以后，她又不断用白话为提倡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杂志《新青年》写短篇小说和诗歌。

1919年，陈衡哲大学毕业，她被选入美国大学生联谊会，获得瓦塞奖学金进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学习。1920年获硕士学位，她批评芝加哥大学重课堂讲授

而不重视独立研究。

1920年秋，她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西洋史教授，当时胡适是北大哲学教授。她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值得尊敬的第一位妇女。这正是中国知识界剧变的时代。1919年的五四运动使许多陈旧的思想方法发生动摇，新出期刊如潮涌起，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新的社会、政治、文学理论。陈衡哲为《新青年》、《努力周报》、《东方杂志》、《小说日报》、《现代评论》和其他主要报纸的文艺副刊写文章。

1920年，陈衡哲和任鸿隽结婚。两年后，她辞去北京大学的职务和丈夫一起到上海，在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工作。1924—25年，她在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教西洋史，任鸿隽任该校副校长。此后，她从事家务和写作，曾在1930年回北大教了一年西洋史。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陈衡哲对国民政府未能解决的各种社会、政治问题感到忧虑。她经常在诸如教育、青年、妇女地位等问题上进行尖锐而往往是愤慨的批评。她的文章常发表在《独立评论》上，这本杂志以见解开明著称，陈衡哲是该杂志的创办人之一并任编辑。她还为中国读者写了一本西洋史和一本文艺复兴史。评论者称赞她用意味深长的笔调将西方文明的史实重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才能。她的《西洋史》出版于1926年，新版于1932年出版。两版都曾多次印刷。

陈衡哲又善于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她曾代表太平洋关系学会中国理事会，多次出席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国际会议：1927年在夏威夷檀香山，1929年在日本京都，1931年在杭州，1933年在加拿大班夫。1929年在日本的那次会议期间，中国代表计划出版一本书，旨在使西方世界深入了解现代中国的文化情况。1931年太平洋关系学会中国理事会在上海出版了由陈衡哲主编的《中国文化论丛》。其中有一章，陈衡哲对中国文化的近代化问题主张采取合理的可取的办法。她不否认中国必须要有基本的政治、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但是她希望这些改革要通过明智的有责任感的领导者来实行，以便尽可能少付社会代价。

1933年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加拿大会议后，她重访美国，这是她1920年离美

后的第一次。瓦塞学院师生对她的欢迎使她深为感动，她对美国生活中由于汽车时代到来而经历的变化大为惊奇。她在加拿大和美国总共逗留了三个月，10月底回到中国。

1935年，任鸿隽任四川大学校长，是年12月，除她的长女在北京上学外，她全家到了成都。这是一个阴霾的冬天，天气寒冷潮湿，居住的房屋又漏风，陈衡哲病倒了。民国以来地方军阀统治下的四川的贫穷落后使她大为震惊。她在《独立评论》上连续撰文，对当地政治和社会情况进行激烈的然而又是善意的批评。这就引起了四川省当地报纸对她发动了猛烈的人身攻击。1936年7月她离开了成都这种不友善的环境，去她曾居住过多年的北平，她丈夫仍留在四川。她想离开四川是早在报界发动攻击之前就决定了的，而此次事件对她确定离开的时间可能起了促进作用。

她在1936年回北平后，一直耽在那里直到次年夏季中日战争爆发。1937年7月她携带儿女离开敌占区到了上海，那时她丈夫也到了上海。1939—1941年，陈衡哲住在昆明，她的丈夫在那里任中央研究院秘书长。1941年11月，陈衡哲携带她的两个孩子去香港，准备让他们在那里上学。12月，日军进攻香港，她和在重庆的丈夫以及在美国留学的长女中断了联系。1942年6月她和她的孩子们逃离香港，从陆路到达中国的西部。战争后期的几年中，她一直在重庆。她对国民政府统治区内官吏商人普遍的贪污腐败、投机倒把、屯积居奇的现象十分不满和愤慨。在1945年后的那段困难时期，她同国民党政权愈来愈疏远，直到共产党于1949年在大陆上取得胜利后她决定留在上海。

象陈衡哲这一代受过教育的妇女亲眼目睹在中国发生的剧烈变化，其中有从清王朝到民国的过渡和妇女地位的变化，妇女从屈从的社会地位变为在积极参加国家的社会、文化、政治生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当时知识界作出成就的中国妇女中，陈衡哲是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她和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她对中国在近代世界上处于孱弱地位感到耻辱。她的民族主义思想是由于通晓世界历史而发展起来的，这就使她能够透彻地观察国内和国际方面的问题，并能提出合理的解决办法。

陈衡哲生活在一个社会变革和动荡的时代，她渴求中国人民能从贫穷、愚

昧和专横的政治和社会的羁绊下解放出来。她和那些开明的知识界人士向国民党当局指出，倘若要在中国避免一场暴力革命，那非采取根本的变革不可。她的努力失败了，战时和战后的经验又使她认识到中国必须与传统的社会方式加以彻底的决裂，因此她接受了1949年后的制度，但此后她从未发表过公开谈话。

陈衡哲的有关政治和历史的文章写的不多。她的短篇小说集《小雨点》在1928年出版，她的随笔短论集《衡哲散文集》于1938年出版。她写的小说从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角度探索人生，但是由于她对知识界以外的中国人的生活情况缺乏了解而受到局限。虽然她对贫者、弱者怀有朴素的同情性，但她的作品终因缺少内心体察和切身体会而显得没有力量。但是在早一辈的现代妇女作家中，她是唯一能超出自传体的内容从广阔的视野中观察中国社会。她是胡适的早年同事，因此，她应该可以被视为新文学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陈光甫 字：辉德

陈光甫（1880—），银行家。使用近代西方的办法创办和经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他在1936年作为国民政府代表与美国谈判白银收购和对华经济援助，在谈判中他起了重要作用。他是战时币制稳定委员会（1941—43年）委员。

陈光甫虽出生在江苏镇江的一个商人家庭，但并未受正规教育。他父亲因经济逆运被迫离开镇江去汉口，受雇于一家关行。陈光甫从十二岁开始在这同一家关行当学徒，在那里工作了七年，学到了从事中国式的商业贸易的基本知识。晚上，他在一所私立学校里学英语，十九岁时，他的英语已相当流利了，他经邮局考试合格，在邮局当了一年半的职员后，辞退了邮局工作，转到汉阳兵工厂当翻译。

1904年，他担任参加圣路易斯国际博览会的湖北省代表团的随员，这是他第一次去美国访问。代表团回国，他仍留在美国读书。1904—1906年，先后进依阿华州印第安诺拉的辛普森大学和俄亥俄州特拉华的俄亥俄美以美会大学

学习。1906年，他到费城进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财经商业学院，1910年获得商业学位后回国。当时两江总督主办南洋劝业会，陈光甫暂时在该会工作，不久就担任了两江总督署的外事秘书。

1911年12月，陈光甫任江苏银行总经理，由于该行相当时间以来经营不善，因此由陈光甫担负该行的整顿工作。他任职两年，将他在沃顿学院学得的近代银行业务的理论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对江苏银行的成规加以某些改革。按照惯例，省银行必须在省政府所在地，而陈光甫却把江苏银行总行迁到全国财贸中心上海。一般都注重发行货币作为银行利润和周转资金的主要来源，陈光甫却集中注意力于吸收存款。他规定银行不应成为省政府的工具，省政府原本可以向银行索取超额的资金。他又规定发放贷款必须备有可靠的信贷手续和保证。江苏银行是国内第一家银行实行以商品作为抵押的商业贷款，并为此设立货仓。江苏银行还始行约请西方会计师定期查核银行账册。但是，江苏银行处于一个省的机构的地位，使它终于无力避免政治上的压力。当新任的江苏都督显示出要干预陈光甫所实行的银行经营方针的时候，陈光甫终于在1914年3月辞职。

上述的遭遇使陈光甫懂得了在国内一家与政府有关的金融企业是难以维持它的稳定或完整的地位。因此，他决心筹设一家私人银行。他得到少数几个朋友的支持，办起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这些支持者中有他留美时的同学和在海关、邮政、盐税机关的高级职员，他们和陈光甫看法相同，宁愿放弃在洋人控制的机关中的待遇优厚、地位稳固的职位，而献身于这一新企业的发展事业。

1915年6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业，实收资本五万元，那是上海当时最小的一家银行。它面临在中国的外国大银行、政府治下拥有纸币发行权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十数家私人商业银行和数十家钱庄的竞争。陈光甫的银行尽管开办时有这些困难，但不久就显出它是一家成功的企业。从1915年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银行的资本由五万元增加为五百万元，存款由三十四万元增加到一亿九千六百万元。至1937年，银行约有职员一千七百人，分行和支行有八十多处，遍及全国各地，当时只有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超过这个数目。三十年代

中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国内最兴旺的商业银行,从1915年至1944年,陈光甫在上海商业银行任总经理约三十年。然后,他担任了该行董事会的董事长。在他担任总经理期间,他关心公共事业,采取先进措施,为中国银行业开辟了新天地。

现代中国的银行业务很少鼓励个人储蓄,陈光甫则特别注意银行储蓄业务的发展,他鼓励个人储蓄,采用了低至一元即可开存款户的办法。这种办法吸引了大批小储蓄户,这些小储蓄户在开始时不过对此新办法发生好奇而已,但不久却养成了定期储蓄的习惯。这一措施的成功使另一些原来不屑于接受小额款项的银行也开设了储蓄部。陈光甫还开创了多种多样的新的储蓄方法,如零存整付,整存另付,教育储蓄,营建住宅储蓄。会计工作和其他手续顺序方面的机械化,只要是实际有用的,都加以采用。

银行资金增加,陈光甫就专心致力于发展信贷业务,这是当时的一些银行所普遍忽视的。他筹建了专用货仓,储存银行持有的作为借款抵押的货物。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又是中国第一家银行为工厂的原料或产品的货存提供信贷,仅以借方允许银行代表审核其帐目为条件。此外,该银行又是第一个为运输货物提供信贷。早在191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就在上海和南京的火车站附近专设办事处,专事提供贷款偿付托铁路运输的货物的提单账款。这种业务后来扩大到全国其他铁路中心。

由于乡村地区动荡不安,当时大多数银行把它们业务集中在几个大城市的外国租界地区。陈光甫不仅希望把业务扩展到那些十分需要近代银行的内地,而且实际上也这样做了。他先在江苏省的一些商业中心设立支行,又逐步在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等省扩大业务。至1934年,各支行经手的贷款占该行总贷款额的一半以上,各支行在业务上为降低乡村地区的利息做了很多工作。陈光甫不愿在东北各省设立支行,尽管那里有不少重要人物是他的朋友。后来,国民政府的政权在名义上也达到了满洲,但陈光甫预见到在那里会碰到困难,因此他并未在那里设立支行。中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广西、四川、云南开设新的支行。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虽是一个商业银行,但从1931年开始,就开展了农业信贷业务。两年后,上海的总行设立了乡村合作信贷部,1934年改名为农业部。

银行通过农业合作社在乡村地区发放贷款，为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和贮存提供资金，至1934年，该行农业部发放的贷款总数达四百四十万元之多。中日战争前，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南京、郑州、长沙、蚌埠、济南、西安、汉口和广州的各支行的农业部积极支援乡村合作社，鼓励改进农业生产方法、改善农产品运销条件。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经营外汇业务的第一批私人银行之一，那原来是外国银行所垄断的。陈光甫认识到，为了更加合理的发展对外贸易，结束这种垄断局面的重要性。1918年上海总行设立了外汇部，并选派人员到英美有关的银行学习外汇业务。当这方面的业务有了发展，陈光甫于1933年在香港设立了一所支行经营外汇和侨汇业务，特别是侨汇，因为华侨汇到中国各地的款项都以香港作为票据交换地。

陈光甫还关注与商业银行业务密切有关的其他项目。1931年在他的银行里设立信托部，开始时只办理出租保险箱，后来扩展到保险、房地产、代客买卖证券等业务。此外，还为学生设置学费贷款、为急需经济资助的教员设置贷款，在一些主要的大学和学校设立银行办事处办理此项业务。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保险业方面开设了三个附属机构：中国第一信用保险公司，专门办理商业借贷的保险；大华保险公司，专门办理水火保险；保丰公司，是与英国太古洋行合作的保险公司。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最闻名的附设行业是它那很成功的旅行部。这是仿效英国的柯克商行、美国邮船公司和日本的导游局而设立的。该部成立于1923年，专办代购火车票和船票，出售国内旅行支票，和经办外国银行发行的旅行支票。1927年旅行部改成银行的一个附属机构，并定名为中国旅行社，该社从事组织游览、协助留学生出国和华侨归国，出版《旅行杂志》。1935年在南京开设一家大都会旅馆，在西安开设一家新西京招待所。后来又在青岛、徐州、郑州、九江等旅行社分社所在地，开设标准比较一般的旅馆。中日战争期间，又陆续在西南开设一些旅馆，供战时难民使用。中国当时的旅行设施十分拥挤非常糟糕，而中国旅行社是一个办事效率高而又十分可靠的机构，因此获得了高度的国际信誉。

陈光甫除了对中国银行业务近代化作出了贡献外，又在中日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多次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国际财经谈判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第一项重要工作是有关1935年11月的中国币制改革，当时国民政府决定取消银本位而改用纸币。这一改革需要做到白银国有，收回市面流通的银元，为中国货币建立外汇储备金。这一改革之能否成功主要靠中国持有的白银能否换成外汇，而当时唯一可能收购中国白银的是美国。1936年3月，陈光甫率领中国币制代表团去华盛顿，经数周商谈，1936年5月14日签订一项协定，美国同意从中国收购白银七千五百万盎司，该协定增强了中国政府的货币储备力量和公众对新币的信任。面临日本在1937年夏季开始的全面侵略，中国在外汇上的积蓄也便于它自己采购军火。

中日战争的第一年，美国对中国并未采取积极的经济援助。1938年12月，日军攻陷汉口、广州，国民政府被迫撤到重庆，华盛顿方面才有相当的紧迫感，而被迫在收购中国的白银外还采取其他行动。1938年12月，经陈光甫在华盛顿进行详情协商后，美国同意由进出口银行支付一笔二千五百万美元的借款，以中国的桐油偿还。1939年2月8日美国的进出口银行和中国政府设在纽约的世界贸易公司签订了上述的借款协定，世界贸易公司是中国政府为了便于从美国采购物资而设立的。桐油借款的成功，为陈光甫推动中国急需的贷款谈判开辟了道路。1940年4月20日，又签订了第二个协定，增加借款二千万美元，以云南的锡偿还。这是两笔美国战时援华的最早借款，以后的贷款都是仿照这两个由陈光甫商订的协定办理的。

1940年6月，陈光甫回到重庆，他的精力转到中国的战时经济和财政问题方面。1938—1941年，陈光甫担任孔祥熙任部长的财政部下新设的外贸委员会的主席。外贸委员会是一个重要机构，它在重庆的主要责任是监督偿还美国借款的桐油和锡的出口工作，同时又输出猪鬃、茶叶等土产。由于与这些任务有关，陈光甫又兼任了政府办的复兴和复华两个贸易公司的经理，负责收购、转运这些主要的出口商品。

1940年4月，美国财政部和英国政府分别向中国中央银行贷款五千万美元和五百万英镑。这两笔贷款加上提供给其他中国政府所办的银行的借款二千万

美元总共将近九千万美元。这些款项均由专设的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支配，这项款子用来回收市面流通的过多的货币和资助运送给上海和天津外国租界的货物，以便减缓法币在市面上的贬值。委员会的成员由三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一个英国人组成。陈光甫和冀朝鼎两人作为遴选委员会主席的对象，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竭力支持陈光甫为主席，另两个中国方面的成员是中国银行的贝祖诒，中央银行的席德懋。

1945年日本战败后，陈光甫回到上海，1947年和1948年他被邀去主持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的工作，1947年任参议员，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他被选为立法委员。他是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积极支持者，他当选为金陵大学校董会董事长。但是他回上海后的主要事业是恢复他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国内经济形势的迅速恶化，陈光甫只能维持残局，谈不上有什么发展。1949年初共产党攻占华北，陈光甫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主要人员携带银行的重要档案撤到香港，着手改组香港支行。1950年1月英国在外交上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在香港的中国的银行，凡是它们的总行在大陆的，由中国银行领衔都归向北京，而唯一例外的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宣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香港支行与上海总行脱离关系，他把香港支行改组成新的企业，取名上海商业银行，遵照英国殖民地法律在香港营业。1954年10月，台湾特许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部，就是总行原在上海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迁往台湾。

香港的上海商业银行，业务上是一个新的独立银行，主要是由1949年与陈光甫一起从上海到香港的多年合伙人经营。1960年，陈光甫虽年已八十，仍然关心业务，照常到银行视事，并担任他那在香港和台湾的两家银行的董事长。

陈光甫是公认的民国时期从事美国式商业银行业的重要代表人物。毫无疑问，这是由于他在沃顿大学所受教育以及后来与美国银行和银行家来往的影响。他之所以热心从事美国式的企业，是由于他切实认识到需要把西方的理论和中国的商业传统经验加以结合，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也有其乡土背景的影响，他的家乡镇江长期以来就是江苏省钱庄业的中心地区之一。他早年在汉口关行学到了工作经验，后来又在估算民国的银行资金短缺和处理中国商业财经

问题方面取得了广泛的实际经验。

陈公博

陈公博（1892.10.19——1946.6.3），中国早期的共产党员，1922年和共产党破裂后，他和国民党左派在一起。1926年后，他的活动紧密地与汪精卫联系在一起，他是“改组派”的成员（1928——31年），实业部长（1932——35年），日本扶持的南京政府的首要人物。

陈公博的先辈是客家族，从福建移居到靠近湖南的广东省的乳源县。他的父亲陈致美因在清朝政府军中对太平叛军作战有功，升为团练提督，他在广西任上，独生子陈公博出生。陈致美由于未能获得领正薪的官职因而退居广州。他在反满组织三合会中是一个有点名气的成员，在与孙逸仙有联系的革命团体中做秘密工作。1907年，他带了他十五岁的儿子（充当他的秘书），回到乳源筹划湘粤在边境举行秘密组织的起义。起义失败，陈致美向当局自首，被判终生监禁。

1907年前，陈公博生活过得一直很舒适，受一般的经书传统教育，并学一些武艺。他父亲被捕时，他逃到香港，在那里一家由革命党办的报馆当校对。第二年，他父亲的案件渐渐平息下来，他回到广州。由于他父亲被囚而家境十分拮据，因此陈公博在育才书院半工半读，在三年期间他学习了英语和其他课目。

1911年10月，广东的革命派宣布广东省脱离清政府而独立，陈父获释，时年已逾八十，一时被视为英雄人物，选入省议会。当时陈公博年未及二十，也被选入乳源县议会，并充任地方民团军官。他父亲因他太年轻又缺乏经验，不适宜担任这种工作，令他辞去这些职务。1912年初，陈公博回到育才书院当教员。二年后，他进了广州法政专门学校，同时为香港的一家报纸写报道维持生活。1917年毕业后，因对法律不感兴趣，便决定进北京大学学哲学。

那时，新任校长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是当时一次思想激潮的中心，这

次激潮是由陈独秀、胡适以及著名的《新青年》杂志的一些人鼓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复兴而激发起来的。在这些教授们的影响下，学生们组织的社团和出版的刊物如雨后春笋。1919年五四运动时的学生示威游行唤起了全国青年在爱国主义和政治思想方面的新的觉醒。由于李大钊等教授的鼓动，北京大学很多学生对俄国布尔塞维克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发生兴趣。1920年夏，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在北京以及在其他地方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但这一切，当时对陈公博没有发生什么影响，他专心攻读，除了与同房间的同学谭平山和几个广东朋友来往外，很少和北大同学一起活动。

1920年夏毕业后，陈公博和谭平山一同回到广州，陈在法政学堂执教，谭在高等师范学堂执教。他们共同创办了一份报纸《群报》，该报后来间接得到广东新任省长陈炯明的津贴。共产国际的二个俄国代表来到广州和陈公博及报纸其他人员接触，他们从上海陈独秀处带来了在广州成立共产主义组织的建议。陈公博和谭平山鉴于对国内的政治混乱感到失望，而受俄国布尔塞维克革命成功的鼓舞，因而倒向共产主义的事业，他们同意参加在广州建立共产党的核心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他们身为教师和新闻工作人员，所以很快吸收了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加入了新的组织。1920年冬，陈独秀应陈炯明的邀请到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谭平山的活动得到陈独秀的帮助。陈独秀设立了省宣传局，任命陈公博为局长，打算通过这个新成立的宣传局在广州地区进一步开展共产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

1921年7月，陈独秀派陈公博去上海，作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之一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对会议的印象不好，所以在会议闭幕前，他和他从广州同来上海的新婚夫人离开上海去杭州了。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陈公博回到广州，在谭平山任书记的广东支部中担任组织部长，顺利地发展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并在广州工人阶级中扩大党的影响。

此后几个月中，陈公博由于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正确性发生疑问而困惑。他感觉到他对民主制度的知识远为不足，他得到陈独秀的同意，决定去美国进一步研究。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乱，耽误了陈公博出国。叛乱发生后几个

星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杭州召开中央委员会特别全会，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和孙逸仙合作反对陈炯明及其他军阀。由于陈公博和广州《群报》有关系，因此共产党的领导层怀疑他支持陈炯明反对孙逸仙，而把他召到上海总部，责询他被指控的破坏党纪的行为。陈公博认为对他的怀疑是党干涉他出国学习，因此大为愤怒。他在上海写信给陈独秀，否认他被指控的和陈炯明的联系。第二天，他通知广州的同志他的退党决定，11月初，他乘船转道日本去美国。

1923年1月，他在日本暂时逗留期间，和孙逸仙的助手廖仲恺多次会面，那时廖仲恺正在日本和俄国外交官越飞讨论苏俄和国民党合作的问题。陈公博在2月中旬离日本，不久到了纽约，进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当研究生，同时他在纽约的华人聚居区的华侨学校中教书谋生。1924年他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他的学位论文题目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叙述了党的早期历史和背景。他除了主修课经济学方面的学习外，还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发觉他们关于阶级斗争和剩余价值的学说与美国经济生活的实际并不一致，同时，他又认为亚当斯密的英国自由主义学派的原理也难以立足。也许是由于他以前在日本和廖仲恺讨论问题而获得的结果，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孙逸仙的民生主义是最适合中国经济、社会的复兴的原理。

1925年2月，陈公博因广州的廖仲恺邀他去国立广东大学教书，未完成他的博士论文而离开哥伦比亚大学。陈公博到达广州时，正值孙逸仙逝世不久，陈公博任广东大学教授，并一度担任该校代理校长。他得到廖仲恺的支持，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党内和政府内的地位递升很快。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广东省政府进行改组，由廖仲恺任主席，陈公博任农工厅长。8月，廖仲恺被刺后，陈公博任国民党农民部部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当时的军事委员会由汪精卫任主席。

1926年1月，陈公博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更高了。他在党内的飞黄腾达，引起了两方面的攻击，一方面是来自广州政府中的共产党人，称他为叛徒，另一方面是来自国民党内非共产党员的元老，怀疑他可能仍是个共产党人。由于共产党方

面的压力，他的政治训练部主任的职位由左派邓演达顶替了。但当1926年6月在蒋介石领导下开始北伐时，他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10月，国民军占领武汉后，陈公博被任命为新的湖北省政府财政委员，并兼任湖北临时外事委员，一直到外交部长陈友仁等一行到达汉口时为止。三个月后，国民革命军占领江西，他调到南昌担任江西政治会议主席，这是江西政府的最高职位。

1927年初，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国民党内两派发生冲突，一派是控制武汉新政府的国民党左翼和共产党分子，一派是主张将国民政府设于南昌后来又主张设于南京的以蒋介石为中心的新右翼集团。当两派之间的裂痕扩大时，陈公博投向武汉的左派政权，他在武汉政府中很快成为显赫要人。1927年3月他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任国民党劳工部长。

为了抵制蒋介石军事实力的增长，武汉政府把当时在欧洲的汪精卫请回来。1927年4月，在汪精卫到达汉口后，陈公博成为汪精卫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不论汪在反对南京政府方面，还是在武汉地区遏止共产党势力扩展方面，陈都加以支持。6月，他支持汪精卫解散国共联合和清除共产党出国民党的决定。1927年夏，他跟随汪精卫奔走，谋求弥合武汉和南京两个政权间的分裂。当汪精卫突然中止谈判，愤然离开南京，陈亦随同离去。10月，他以汪精卫代表的身份去广州准备另立一个与南京对立的新政府同张发奎合作，陈公博在广州一时曾负责广东省的内务工作，一直到1927年12月广州公社成立时为止。张发奎的部队很快扑灭了共产党起义。在国民党右翼中的陈的政敌尖锐地抨击他，认为他未能防范起义，实系失职行为，陈公博因此被迫辞职。

1927年12月，汪精卫去欧洲，在汪精卫不在时，陈公博成了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扩大权力的左翼集团改组派的主要发言人。1928年初，陈公博离广州去上海，5月间，他出版了《革命评论》周刊，这份杂志反映改组派的政治观点。陈公博利用这份杂志同吴稚晖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笔战，吴稚晖是南京方面尖刻攻击汪精卫的一个国民党的老卫道士。9月南京政府下令封闭了《革命评论》，被封之前，这份杂志的发行量很大，陈公博刊载在杂志上的文章在学生、工人和国民党的青年党员中发生广泛的影响。在此期间，陈参预在上海创

办大陆大学的工作，该校在1929年5月被国民政府封闭。

1928年冬，陈公博和在上海的一些国民党左翼分子组织了“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到了春天，陈公博、顾孟馥和改组派的其他成员出版《民声周刊》，通过这个刊物，他们呼吁国民党回到1924年依靠工、农、资产者的改组时的精神和原则上来。在南京的国民党总部为了反对改组派及其他分裂分子，决定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大部分左翼代表将被排除在这次大会之外。1929年3月12日，大会召开前三天，陈公博和汪精卫一起，还有十来个其他的党内首领联合发表宣言，谴责召开该会是非法的。为了还击陈公博等人，大会在蒋介石的支持者控制下，把陈公博永远开除出国民党，并以此来威胁汪精卫及其同伙。

陈公博被开除出国民党后，他在改组派中积极活动，多次计划推翻南京政府。1930年2月，汪精卫和冯玉祥、阎锡山这两个反对蒋介石的重要军事首领联合，准备在华北另行成立政府，组织政党。3月，陈去天津，他以汪精卫代表的名义为准备召开所谓国民党扩大会议起了重要作用，8月间，会议在北平召开。于是，在北平成立了以阎锡山为首的国民政府，以及以汪精卫为首的与南京的国民党相对抗的新的国民党组织，陈是新党组织部的成员。1930年9月，反蒋联盟失败，陈和扩大会议的一些成员逃到阎锡山的据点山西省会太原。11月，扩大会议终于烟散云消，陈离太原去香港，不久乘船去欧洲。

陈在国外一直耽到1931年9月日本侵占满洲时为止。这一危机使国民党内的许多派系为了国家团结的利益而把他们的分歧置于一旁。陈在回国后与汪精卫一起致力于与南京政权的和解工作。1931年10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恢复陈及其他也因政治原因被开除的人的党籍。接着，在11月举行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精卫、陈公博及其他改组派成员恢复了中央执行委员的职务。1931—32年冬，国民政府进行改组，汪精卫任行政院长，陈任实业部长。

汪、蒋在南京联合期间，陈公博一直充任国民政府的部长。这种勉强的合作，终于在1935年11月初汪精卫遇刺后，12月间离开政府而结束。陈亦就此辞职，不久去欧洲，在德国和意大利游历了十个月。他于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又和汪精卫一起进入国民政府。陈担任了不很重要的政府合作企业委

员会的主任职务，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军训处长。

战争第一年，意料不到的结果愈来愈使汪精卫沮丧，他建议国民政府与日本和谈。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要人对此严加拒绝。1938年12月，汪精卫突然离开了战时首都重庆飞往河内。据说，陈公博虽然和汪一样对战局表示悲观，但并不同意汪弃离国民政府的打算，因此到河内去劝说汪重新考虑其决定，此举未获成功。陈公博既不愿回重庆又不愿和汪一致行动，因此他在香港踌躇了好几个月。1939年冬，陈公博继续劝汪放弃和日本合作的念头，但是汪未被说服。陈公博终因他与汪精卫有长期而密切的关系，勉强支持汪精卫在南京成立由日本操纵的政府。

1940年3月30日，傀儡国民政府成立，陈公博任立法院长，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他在政府中的地位仅次于汪精卫。1940年11月又任上海市市长。1943年8月，达成国际协议，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归还中国，陈又兼任由从前的法租界当时改为第八市区的区长职务。陈公博虽在汪政权中地位很高，但汪的财政部长周佛海的政治影响远远超过了他。又据说，陈公博对他在傀儡政府中的工作缺乏热情而抱着一种若即若离的消极态度，然而1944年3月汪精卫因病去日本治疗时，陈同意担任政府代理主席之职。汪精卫死在日本后，1944年11月20日陈公博执掌了南京政府大权。

1945年8月，日本向盟国投降，陈公博因害怕南京地下抗日势力的袭击而去日本躲避。他身为傀儡政府首脑，于10月初被押回南京，以叛国通敌罪受审。1945—46年冬拘留在南京。在此期间，他撰写了自己八年生活的回忆录，题为《八年来的回忆》，非常客观地分析了他和汪精卫的关系，以及他之所以投身傀儡政府的个人原因。1946年春，他和傀儡政府的其他重要人物被押解到苏州。4月5日他被苏州（江苏省）高等法院判处死刑，1946年6月3日枪决。

陈公博的私生活常被他的同人们指责，他以衣冠楚楚、极不庄重、荒淫无度闻名。但是他对汪精卫忠心耿耿，以及他在临刑前镇定自若，这些即使是反对他的人也表示佩服。他的著作反映出他的独特思想和智慧，虽非异常尖刻，但却是才华横溢和富于创见的。他的政论文章大多散见在当时的报章杂志

上。在他的著作中有一本简短而很有意义的书《中国历史上的革命》，该书出版于1928年，是试图用经济原因来阐明中国历史上人民起义的最早的著作之一。他的政治回忆录《四年从政录》1936年在上海出版，该书记述了他担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时的工作。他的《寒风集》出版于1944年，收集了1933年至1943年间所写的文章，其中记述了他从幼年起直到在傀儡政府中当官的生平和思想观点等情况。

陈公博遗有妻李励庄，他们在1921年结婚，子一，陈公博死时，他在美国学习工程技术，后来母子两人都在美国居住。

陈 果 夫 原名：陈祖涛

陈果夫（1892.10.27—1951.8.25），1926—32年、1944年，任国民党组织部长，使国民党建成为一个严密的组织机构。1928—32年，任监察院代理院长，1933—37年，任江苏省主席；1939—45年，任考选委员会主任；1945年任国民党中央财政委员会主任。他和他兄弟陈立夫，是有名的右翼C.C.的首领。

陈果夫出身于世居浙江吴兴的士绅家庭。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起义时家道中落，后经他的祖父陈延祐从事经商而使家庭经济情况有所改善。陈果夫的父亲陈其霭（字勤士）是吴兴的学者和名人，有弟两人：其一为陈其美（字英士）后来成为孙逸仙的支持者，在1911年革命中起重要作用，另一为陈其采（字霭士）系由日本士官学校培养出来的军官。陈果夫后来投身政治活动是受他的家庭背景和亲属的影响。

陈果夫早年受业的家庭教师，大都是他的家里的人。1905年，由他在湖南新军中的叔父陈其采催促去长沙，进了明德学校，该校校长系胡元秦。1906年，他叔父调离湖南，陈果夫被父亲召回家中。

1907年春，他在南京上了几天学，即回浙江进了杭州陆军初等学堂学军事四年，在此期间，陈其美给他的影响很大，1911年春陈果夫正式加入同盟会。是年春他在杭州毕业后，到南京进第四陆军中等学堂，他在那里帮他叔父散发

宣传革命的小册子以及从事其他工作。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陈果夫急忙赶到那里参加了革命军。

陈其美在指挥革命军占领上海的武装起义中起重要作用，起义成功后他成为沪军都督，陈果夫即去上海当他叔父的助手。他被派去招募他在杭州和南京时的同学参加共和革命，在进行这一工作时，他第一次遇见了蒋介石，蒋介石也是陈其美的门生。陈果夫虽尚年轻，可是体质虚弱，他原定在1912年秋去法国勤工俭学，因肺病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治疗两周，回上海又修养了一些时候，1913年3月去日本，作进一步治疗。当年6月，所谓的二次革命爆发，他奉陈其美之命回上海，在倒袁运动中他起的作用是很小的。二次革命失败后，1913年秋，他在上海住院治疗两个月，那时大部分革命领袖逃往日本，而陈果夫留在上海学习德文，并从事合作社的研究工作。1914年春和朱敏结婚。

1914年，孙逸仙在日本由陈其美等人的帮助改组革命党为中华革命党，设总部于日本。陈果夫根据他叔父陈其采的意思，也参加了这个团体。1915年陈其美回国，在上海法租界设立据点准备进行反袁活动。陈其美企图重占上海，于1915年12月5日发动了一次惊人的但未获成功的肇和舰事件。陈果夫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并起重要作用，他发现了内奸和法租界捕房有接触，经他预先通知，陈其美、蒋介石、吴忠信等人才从法租界逃走。1916年5月陈其美被刺，这对陈果夫和蒋介石是一次重大打击，他们把陈其美看作是良师、恩人和领袖。1916年6月，陈果夫回到吴兴，专心研究地方志，并对中医、传心术和演讲术等发生兴趣。1917年他把注意力集中到是否有神鬼的问题，就此还写了一篇文章。

此后几年中，陈果夫大部分时间耽在上海，这是他个人和政治上的需要。1918年3月，陈果夫由他父亲介绍，在上海一家交易所里当了一名超龄学徒学钱庄业。这个职务也是为了掩护他的政治活动。1920年秋，孙逸仙在上海的一些支持者设立了一家证券商品交易所，为孙逸仙在广东的革命事业筹款，张静江擅长经商，经管了这家交易所，并有陈果夫、蒋介石、戴季陶等人的协助。陈果夫起先专管棉花股票，后又成为经营棉纱和金银的代理行的协理。这些为了筹集政治活动经费在上海的投机生意一度十分兴隆，但在1922年春买卖遭到挫折，大部资财丧失殆尽。陈果夫却因经商获利使他能资助他的弟弟陈立

夫去美国受现代教育。

1924年国民党在广州改组后，孙逸仙任命蒋介石为新建立的黄埔军校校长，军校需要招募新学员，蒋介石认为上海是最好不过的招募地区，而陈果夫是最好不过的担负这项任务的朋友。招募工作是一件必然冒有极大个人危险的事，陈果夫积极果断地担起了这一项工作。陈果夫和他的同事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招募了四千多名学员，用船送到广州，他们在黄埔军校受训后成为军校最初两个团中的核心力量，这两个团统一了广东全省。陈果夫后来又从中华北招募了三千多名学员，其中大部分人进入军校第三、第四期学习。陈果夫在上海还为广州军队筹办军需。

1926年，陈果夫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从他正式参加改组的国民党后，不再用陈祖涛的原名，而改用陈果夫了。孙逸仙去世后，在广州争夺承继权的斗争中，蒋介石主要凭借他在黄埔的军事力量，稳步地增强了他的政治地位。在这一发展中，随着出现了国民党内部左右翼的分裂，在国民党内共产党影响的扩大加剧了这一分裂。1926年5月1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一项由蒋介石提议的禁止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担任重要职务的决议。在紧接着的改组工作中，由张静江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蒋介石替换谭平山任组织部长，而以陈果夫为组织部这一关键部门的秘书。两个月后，在蒋介石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陈果夫由蒋介石推荐，任组织部代理部长。

1926年7月到12月这一紧急时期中，陈果夫在国民党的组织部的工作中与张静江密切合作。1926年夏，陈果夫着手改组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力图限制共产党势力。他又兼任国民党的中央组织和财经委员会的委员，以及中央政治会议秘书。他又担任了新成立的训练党务工作人员的政治训练学校的校长。1925年秋，在广州的首席俄国顾问鲍罗廷认定陈果夫和张静江是所谓国民党的新右翼分子。无疑，陈果夫的活动极大地增加了国民党内反对和共产党联合的保守分子的力量。

1926年12月，陈果夫秘密去江西南昌蒋介石行营，在那里他着手进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改组工作，原来江西省党部被共产党人方志敏所控制。1927年

3月，陈果夫去汉口，那时汉口的国民党左翼和共产党合作，控制了党和国民政府的职务。陈果夫无法对那里的形势施加影响，不得不于3月22日离汉口去上海。他在上海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中的保守分子如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等人一起拟定计划，准备对危害他们在党内的元老地位和权力的左派分子进行回击。所谓清党运动，即清除左派分子和共产党的运动在四月间从上海开始了。

就在这一个月內，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对立的国民政府，陈果夫继续支持蒋介石。7月，陈果夫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和组织部代部长，并和戴季陶、丁惟汾、叶楚沧等人筹建中央政治学校，训练党员用以参加国民政府工作。中央政治学校于1927年8月8日正式开学，蒋介石任校长，陈果夫任总务主任。不久，蒋介石被迫退出政界，陈果夫随同他一起去上海。是年秋，国民党宁汉两派着手弥合彼此间的裂痕，以便继续进行北伐，蒋介石在陈果夫等支持者的帮助下在南京重掌权力。

蒋介石在名义上担任国民党组织部的部长，因为他忙于北伐第二阶段的工作，所以在1928年3月，再次任命陈果夫为组织部代理部长。鉴于取得全国统一的前景在望，国民党要准备应付其迅速扩大的任务，因此需要有个全面规划。在陈果夫的主持下，国民党中央党部将原有的九个机构：组织、宣传、农民、劳工、青年、妇女、华侨事务、商界、军界，合并为四个机构：组织、训练、宣传、民众。下属的各级党组织的机构也按照中央机构相应加以精简。在陈果夫主持下，大批干部派往地方党部，并进行了普遍登记党员的工作。这样，国民党就第一次成为一个机构严密的组织。共产党虽被排挤出去了，但国民党的组织机构却是按照列宁党的模式建立起来的。

1928年10月10日，新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陈果夫当选为监察院副院长，蔡元培当选为院长，但并未就职，继任人赵戴文又离南京回山西原籍。陈果夫实际上负责监察院工作，因此，他就辞去了党的组织部代理部长职务。陈果夫担任监察院的职务一直到1932年，他在监察院的初创时期做了大量组织指导工作。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由于陈果夫的精心筹划和组织，大批蒋介石的支持者参加了大会。陈果夫再度当选为党的组

织部代理部长，他以代理组织部长的身份专程去北平和华北各地视察国民党党务。1929年夏，陈果夫和胡汉民、戴季陶、叶楚沧共同起草了一个有关党的准则和党的德行的重要文件，由国民党中央权力机构予以正式通过。

1928年后，陈果夫、陈立夫在南京发展起来的政治组织，颇为引人注目，很快就以C.C.系而闻名。据一些观察者说，CC两个字母原系用来命名设在南京的中央俱乐部的英文名字(Central Club)的字首，而并非陈氏兄弟的英文姓氏的字首。陈果夫本人坚决否认这一组织的存在，他说，象他这样背景的人决不可能用西方的字母来命名一个中国团体。但是这一代号在国内广为流行，它的通常含义是指陈氏兄弟在国民党中央机构中行使非同一般的个人权力。以后，C.C.系这样的称号，经常为中国共产党、日本人以及西方观察家用以批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C.C.系是否有正式组织的存在那也很难说，但是这两个亲蒋介石的国民党组织工作的老手自1928年后无疑地培植了相当数量的一批个人追随者。

陈果夫以后又任江苏省主席，从1933年10月任职起一直到1937年11月。在他任内四年期间，他对省政作出了不少显著贡献；制止了盗匪的猖獗活动；由于修改税收制度和加强省银行的工作，因而公共的财政得到改善；加强政治控制；教育、公共卫生和交通事业得到发展；严禁抽鸦片。陈果夫历来关心中医，这与他本人身体羸弱有关，1934年10月他新设了一所江苏医政学院。他身为江苏省主席，又兼任淮河水利委员会副主席，他提倡蓄水建坝以利防洪和航运。在他任省长期间江苏省取得的成就他引以自豪，后来，他把这段经历写了一本书作了全面的叙述，书名《苏政回忆》，1951年在台湾出版。陈果夫在江苏任职期间在党内仍保持其元老的地位，1935年10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果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委员。

1937年夏，中日战争爆发，江苏省成为重要战场。11月，日军沿沪宁路向西进攻，迫近江苏省政府所在地镇江，陈果夫把省政府迁到扬州。按照国民政府订定的战区各省省主席的职务应由军事指挥官担任的战时规定，11月底国民政府任命顾祝同接替陈果夫为江苏省主席。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陈果夫即去长沙。

1938年1月，陈果夫担任迁往湘西藏江的中央政治学校的教育长。3月间，他去汉口参加国民党非常会议，修改党章，举蒋介石为总裁。他和中央政治学校的工作人员一起经长途艰难跋涉到达重庆。1939年3月他辞去教育长一职，但仍由他控制、指导学校的训练计划。

陈果夫除中央政治学校的任务外，1939年夏又担任了蒋介石侍从室第三厅主任，该厅专管政府人选。陈果夫在蒋介石直接领导下行事，因此可以施展他的个人影响，而这是战时首都的任何其他官员难与他匹敌的。陈果夫任这个重要职务达六年之久，到1945年8月这一机构撤销为止。

陈果夫患肺结核病愈来愈严重，1943年和1945年曾施行两次胸腔大手术。他在战争初期还经常发疟疾和疝痛。按照他的创议在中央政治学校诊所设立了一个研究所，当时由于缺乏奎宁而用中草药治愈疟疾。

陈果夫在重庆从事多方面活动。他长期关心合作社的发展，他认为这是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的一项办法。1940年全国合作社成立时，陈果夫当选为名誉社长，他又间接地推动消费合作社的发展。他经常很有说服力地写有关这一题材的文章。1941年他写成了一个电影脚本《移风易俗》，由于其用意是在鼓吹发扬中国的正统道德，因此脚本着重于进行道德教育而并不在于为了娱乐。

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陈果夫为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一贯效力再度得到了报赏，他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委员。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国民党决定在即将成立的立宪政府建立后，国民党的经费不能再依靠政府供给而必须自给。陈果夫被选为国民党中央财政委员会主席，负责为支持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开辟财源。1945年秋，他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这一任命使他能按照孙逸仙所制定的经济方略，用农民银行的财源，帮助农村经济的发展以造福农民。国民党为了实现财政发展计划，建立或掌握了一些商业机构，例如报纸、出版社、电影制片厂、广播电台等。1946年11月，任陈果夫为中央合作银行行长，它实际上是国民党的一个金融机构。由于陈果夫在1945年以后的活动从党的组织工作转到党的财经工作，因此关于陈氏兄弟是否利用特权地位积聚私人财富就有很多猜测。这当然成为共产党攻击的目标，陈伯达在他的《中国四大家族》中，不仅把陈果夫和

蒋介石联系起来，而且和蒋介石的姻亲、财政巨头孔祥熙、宋子文联系起来。

实际上，在中日战争后，陈果夫不再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了。1946年12月，他是国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这次国大通过了新宪法。1947年7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医研究院，他是促成此事的推动者。陈果夫的身体更坏了，1947年9月进行了第三次胸肺手术。1948年夏天，他的身体健康剧烈恶化，12月他离开大陆到了台湾，蒋介石已在那里筹建新基地。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时期，陈果夫的很多老朋友相继死去，陈布雷于1948年11月在南京自杀，戴季陶于1949年2月在广州自杀。1950年，正当在台湾的陈果夫肺病迅速恶化时，而国民党的元老、陈果夫和蒋介石的恩师张静江9月间在纽约逝世。1950年8月，陈立夫离开台湾到欧美去了。陈果夫停止了所有的政治活动，把家从淡竹迁往台北以便精心治病。1951年8月25日他在台北死去，年六十岁。9月15日，蒋介石发布正式文告，表彰陈果夫长期而忠诚的为国民党工作。1951年11月4日，陈果夫的遗体葬于台湾，他父亲陈其藩比他长子多活了十年，于1961年3月15日死在台北。

从1925年到1945年二十年期间，陈果夫对国民政府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起很大影响。他对国民党最显著的贡献是他在组织部的工作，在此期间组织部主要是由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主持的，一般认为陈果夫比陈立夫在国民党内更为计谋多端影响尤大。陈果夫在一生中写了不少各种题材的文章，突出的是关于合作运动的文章。他还写短篇小说、剧本、诗歌。他的四十四首诗歌集在1943年出版。他死后，他的全集于1952年在台湾出版，书名《陈果夫先生全集》。

陈立夫 原名：陈祖燕

陈立夫（1900—），1928年后主持国民党调查科达十年之久。他历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1929—31年），国民党组织部长（1932—36年；1938—39年；1944—48年），教育部长（1938—44年）。他和他哥哥陈果夫是以所谓C.C.系的

首领知名。1948年任立法院副院长，后又任不管部长。1950年后迁居美国。

陈立夫生在浙江吴兴，陈其美的侄子。陈其美是孙逸仙早期革命的支持者，1911年革命后任沪军都督。陈立夫是陈果夫的弟弟。幼年在吴兴受旧式教育，后来到上海，进南洋路矿学校。那时陈果夫在上海正和陈其美、蒋介石等人从事反对袁世凯的政治活动。

1917年，陈立夫到华北入天津的北洋大学学矿业工程。陈果夫资助他受现代教育。1923年陈立夫毕业于北洋大学后去美国深造，入匹茨堡大学，1924年获学士学位，1925年获矿业硕士学位。他为了取得实际经验，去匹茨堡、斯克拉顿当矿工并加入了联合矿业工会。他是一个善观察能思索的学生，当他在国内以及在美国求学的时候，着重注意科学技术的发展，他认为这是使中国近代化的关键。他于1925年冬回国时，获得山东中兴煤矿的一席职务，吴兴人、上海银行家、实业家钱永铭是中兴煤矿的股东，他慕这位青年矿业工程师的才学之名，提议聘请陈立夫到煤矿工作。那时，陈果夫正在上海为黄埔军校招募学员，他劝陈立夫放弃工程事业而投身于国民革命。

1926年夏，蒋介石在广州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陈立夫由他哥哥介绍到蒋介石那里当机要秘书，他的顶头上司是黄埔军校的主任秘书邵力子。国民军的力量到达长江流域的北伐途中，陈立夫是蒋介石的私人随从人员。这个年轻的助手，忠于职守，在处理通讯和译电工作方面颇能胜任，因此很快取得蒋介石的信任。

1928年，他在南京任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科主任、国民复兴委员会秘书长。国民党组织部中的调查科的任务是侦察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以及同情共产党或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嫌疑分子并清除出国民党。1928年后的十年间陈立夫主持这个科的工作时，其下隶有三个组，分别对文职人员、军人和其他人士进行秘密侦察。这三个组分别由徐恩曾、戴笠、丁默村负责。这是国民党的一个重要机构，负责清除政府、军队和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保卫国民党的安全。调查科长不但为共产党所抨击，而且一般人也对其所用的手段和他的特权地位加以批评。

由于陈立夫掌握了调查机构，1928年后使他能党内核心中占得有力的地

位。1929年3月，在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陈果夫经心进行筹备，使蒋介石的支持者居于控制地位。陈立夫已经取得了蒋介石个人的完全信任，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他担任委员一职直到1950年。1929—31年，陈立夫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1931年12月，任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

1932年，陈果夫任淮河水利委员会代主席后，陈立夫继任国民党组织部长，他的主要政治使命是巩固和加强蒋介石的政治地位。那时，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在国民党内有比蒋介石更高的声望。陈立夫勤奋工作并取得显著成绩。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两个重要机构，直到1935年是一直自行连任的组织，其中有许多批评和反对蒋介石的人拥有地位和影响。1935年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立夫用审慎地控制党的机器和任命的办法扩大了这两个委员会的委员人数，以保证对蒋介石的支持的绝对多数，陈立夫在1935年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九人常务委员会委员，他的个人声望大为提高。

经陈果夫和陈立夫的努力在南京得到发展的政治组织活动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始终忠于蒋介石，一是顽固地反对共产党。国民党内的所谓C.C.系，即使并无正式名称，但实质上是一个保守分子的紧密联合的集团，这些人在党务工作上具有影响。

陈立夫在南京创办并主编一份日报《京报》，他又负责出版《时事月报》，这是一份仿效美国《当代史事》的杂志。他又是全国文化建设协会的创始人，该协会是一个研究和实现孙逸仙所创立的学说的组织。他又是国民党用以和共产主义作斗争的新生活运动的推行者之一。他是正中书局的创办人和总经理，这是一家由国民党开设的出版企业，发行政治主张和时事方面符合国民党的正统观点的书籍。1935年陈立夫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提出了他自己的计划。那篇文章说，他的目的是：使中国的青年一代了解中国过去的光荣从而获得民族自信的新精神；普及科学成就使中国赶上西方各国；推动通讯工具的发展如中文打字机、译电码机、排字机等；鼓励研究孙逸仙的学说。陈立夫希望这项计划的实现能在中国出现一次文化复兴。

陈立夫的哲学观点反映在他的《唯生论》一书中，阐明了他的生机论。生

机论来源于中国古代的《易经》，它试图复兴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并为孙逸仙的政治和社会学说提供哲学基础。《唯生论》中论述说，他对孙逸仙理论的新的正统的解说远胜于国外输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本书由任达译成英文，1948年以《生命哲学》为名在纽约出版，由哈佛法律学院院长R. 旁特撰写前言。

陈立夫是蒋介石可靠的亲信，他在国内和国际政治问题上起着重要作用。1935年，日本对华北的压力增大，陈立夫和苏联大使鲍哥莫洛夫进行商讨，向他提出了一旦中日之间发生战争，俄国对中国进行军事援助的问题，并就谈判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据说，鲍哥莫洛夫建议陈立夫和斯大林进行个人谈判，1935年12月25日，陈立夫化名李永清和新任驻德大使程天放同船去欧洲，一路上两人避免在公开场合露面，以免暴露陈立夫的身份。陈立夫在柏林等候莫斯科的消息耽搁了好几个星期，但并无斯大林的回音，1936年4月，陈立夫回到中国。

1936年，蒋介石不顾来自日本的侵略威胁，重新制定进攻中国共产党人的计划，那时共产党人已从江西转移到西北。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1935年夏第七次代表大会规定的统一战线战略，坚决要求停止内战全国联合一致抗日。1936年12月，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拘留，张、杨向蒋介石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这些要求反映了共产党的主张。西安事变发生时，陈立夫在南京，他知道此事与共产党直接有关，因此，他与在上海的共产党员潘汉年联系，说服共产党促使叛乱的国民党将军们缓和下来。周恩来到西安调解，陈立夫原定伴同宋子文去西安结束谈判，但因病未能前往。12月25日蒋介石获释。

陈立夫本人后来评论西安事变时认为，这次事变对当代中国历史进程影响很大，并导致1937年夏中日战争的爆发。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按战时需要立即加以改组，陈立夫被提名在全国军事委员会中任高级职务。1938年1月，他继王世杰而任教育部长。1938年春，国民党非常会议在汉口召开，选蒋介石为总裁，这是国民党内最高的职位，是蒋介石盼望很久的，在此之前只有孙逸仙居有过这个职位。蒋介石终于当选为总裁，反映了陈立夫在战前的岁月中奋力从事组织工作的结果。1938年1月，陈立夫继张厉生再次出任国民党的组织部

长，他任职至1939年12月底，然后由朱家骅继任。接着陈立夫任国民党社会部长，这是中央的一个新机构。

1938年陈立夫之所以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不仅由于器重他的组织才能，而且由于他个人关心中国青年的信仰素质和政治品德。在近代中国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的艰难时期，他担任教育部长将近七年。虽然在他任职期间教育部的工作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可是他自己对担任教育部长时的工作非常得意。他的主要助手是前清华大学校长顾毓琇，和前西北大学校长赖琏。陈立夫对教育部的工作专心致志，经常到大学和其他高等院校作报告，讲他个人的唯生论哲学，讲中国各方面的文化传统，讲孙逸仙的学说。陈立夫把教育工作看作是能够实现他的愿望的一项工作，他的愿望是向全国青年不断灌输正当的政治原则，回击共产主义在知识上和心理上的引诱力。从理论上说，他的目的是要在教育界给予适当的领导和政府的协助以反对这些有害的倾向，但在实际上，他狂热反共却引起了学生和教授们的反对。陈立夫在战时的重庆，还是中美文化联谊会副会长，会长是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

1944年11月，朱家骅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再次任国民党组织部长。他的主要任务是筹备订于1945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国民党在大陆召开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通过了准备行宪的党的宣言和制定了国民党的行动纲领。会议选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共460名之多，比上次大会的人选增加了二百多名，党的中央机构再次为蒋介石的坚决支持者所控制。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基本政治分歧未获解决。同年秋天，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到重庆和蒋介石商谈国事。毛泽东在那里还会见了陈立夫。这是毛和一个国民党最坚决的反共分子的单独见面，在这次难忘的会见时，陈立夫说，只有孙逸仙的三民主义才是中国获得民族解放的道路。他对毛说，如果国民革命的主张获胜，中国将成为独立富强，倘若毛的主张取得胜利，将使中国成为克里姆林宫的附庸。1946年1月，陈立夫是国民党出席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团团员，会议讨论战后中国的政治秩序。会议毫无结果，国民党内反对和共产党妥协的那一派立即在1946年8月作出决定取消

最初的协定。1946年7月，司徒雷登任美国驻华大使后，陈立夫在会晤司徒雷登时，曾两次表达了他对于“共产党及与此有关的问题”的观点，他坚持认为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之间不可能有中间道路。但是对长期的战火感到厌恶的中国来说，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情绪，那就是赞成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并采取政治妥协的办法以解决共产党的问题。因此，国民党准备用武力解决这个问题，就处于政治上一开始就不利的地位。顽固坚持国民党正统立场的陈果夫等人就和许多中间分子疏远了。美国调解人马歇尔将军对他自己的使命所作的最后评价中说，他的努力之所以失败，国民党“反动派”和共产党双方负有相等的责任。

战后几年中，陈立夫及其密友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不断恶化感到灰心。1946年11月，陈立夫在南京出席国民代表大会，国民党控制了会议，共产党和民主同盟拒绝参加。会议通过的新宪法反映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最高层领导的政治倾向。1948年，陈立夫辞去国民党组织部长的职务。二十多年来国民党机构中的这个重要岗位只有四个人负责主持过：陈果夫、张厉生、朱家骅、陈立夫。1947—1948年，陈立夫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

1948年春，选举总统、副总统实行宪政，陈立夫支持官方内定的蒋介石和孙科为候选人，结果李宗仁击败了孙科当选为副总统，打乱了官方计划。于是孙科被选为立法院院长，陈立夫为副院长。

1948年6月，陈立夫接受道德重整运动的邀请去美国出席一次会议。国内内战对国民党军队日见不利，国民党寄重托于美国增加军事援助。那年正是美国的总统选举年，南京的很多高级国民党官员希望胜利在望的共和党能援助他们的反共事业。陈立夫在美国向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递交了蒋介石的私人信件。9月，陈立夫回国，据报道说，他声称倘若杜威当选总统，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将采取特别措施。但是1948年11月，杜威落选，正在那时，国民党军队丢失了整个满洲，被共产党所占。

1948年底，孙科任行政院长，陈立夫在孙科下面任不管部长。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屡遭挫败，迫使蒋介石于1949年1月辞去总统职务。与共产党进行和谈失败后，孙科辞职，何应钦继任行政院长，陈立夫留任不管部长。1949年

4月，南京失守后，陈立夫随国民政府一起迁往广州。据美国大使馆一个官员称，陈立夫依然相信国民党能组织全国抵抗，并且在更多的外援到达之前，能够支持下去。6月间，阎锡山组成新阁，陈立夫仍留任原职，9月，随国民政府一起迁往重庆。四川的局面也很快难以维持，1948年12月8日，陈立夫、阎锡山等国民党高级官员离开成都飞往台湾。

蒋介石也在12月抵达台湾，开始建立新的政治基地工作，1950年3月他又恢复了总统职务。7月国民党常务委员在台北开会，决定重整党的机构，建立了一个由十六人组成的新的中央改革委员会。二十多年来都是国民党中央核心集团中的一员的陈立夫，不再是这个新机构的成员了。1950年8月，陈立夫及其全家离台湾去欧洲，他在那里参加了另一次道德重整运动的会议。他们全家又从欧洲去美国。

陈立夫在新泽西州的莱克伍德住下来过安静的田园生活。他没有去参加1951年11月在台湾举行的陈果夫的葬礼。十年后，因为他父亲陈其喬病危，蒋介石召陈立夫回台湾，他父亲于1961年3月死去，陈立夫到台湾料理丧事。陈立夫的朋友和老同事一千多人在台北飞机场迎接他。虽然有这样的欢迎，陈立夫还是在料理丧事后马上离开台湾回新泽西州他那个家里去了。

陈立夫于1926年冬在上海结婚，他的妻子孙路清是陈立夫的家乡吴兴的一个有才华的艺术家。他们有三个儿子都在美国受高等教育，还有一个女儿。

陈立夫在中国的活跃生涯中，他是一个既有影响又有争议的人物。他为国民党内和他共事的很多人所尊重而被共产党所咒诅，还有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中国一个最危险的人物。一般都认为，他的政治影响是很大的，不少人对他的机智、勤勉、忠于职守表示钦佩；对于他的唯生论可能没有人能给以适当的概括。陈立夫绝对忠诚于国民党及其领袖，而毫不留情的反对共产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在国民党内所采用的不少政治手腕则与列宁以及在二十年代苏联顾问带来中国的手法是很相似的。

陈 策 字：任先

陈策（1876.4.24—1939.2.19），1915年签订的恰克图条约的中国首席谈判代表，该条约规定外蒙的国际地位。1915—1917年任中国驻库伦（即乌兰巴托）都护使兼办事大员。1920—1927年任驻法公使。1939年在南京任日本支持的政府的外交部长，后被刺身死。

陈策，福建闽侯人，出身在小康的书香之家，幼年受传统的儒家教育。1891年当他十五岁时，开始学西方语言，接着在福州造船学校上学三年，在那里，他所受的主要课程是法文。1894年他父亲送他到武昌继续学外国语。1894—1897年他在盐务局的一所附属学校学英语，1898—1901年他在按照张之洞的意愿所创办的武昌自强学堂学法语，陈策在他班上学习成绩名列第一，1901年二十五岁时毕业，他被聘在原校教法语。据说由于他没有接受其他地方要他担任教席的聘请，而决定留在湖北教书，因此赢得了张之洞的青睐。

1902—1903年，陈策对政治改革家梁启超的思想发生很大兴趣。陈策的父亲对他儿子在这方面的热情非常担忧，嘱咐他在政治观点方面应持更为克制的态度。

陈策在武昌时由清政府选中去欧洲留学。他和一批中国留学生先到柏林，然后独自一人去巴黎，他是在1903年春到达巴黎。在巴黎大学学法律，兼任中国使馆随员，因此他在法律方面的学习增添了实际的外交工作经验。1905年慈禧太后派特别使团到欧美考察外国的政体，陈策担任该团的翻译。后又继续读书，1907年在巴黎大学法学院毕业，同年任公使馆秘书，随陆征祥出席在西班牙召开的第二次和平会议。

1907年12月陈策从欧洲回到福建老家。曾在1905年出使考察外国宪政的戴鸿慈召他去北京。陈策到北京后曾担任有关法律和宪法改革的多种职务，并任外务部外事局主事。1909年他父亲去世时回福建，不久又回北京任翰林院编修。1910—1911年他负责外事局的政务工作。

1911—1912年的革命，对陈篆在北京的职位影响不大。外务部外事局改组为外交部后，陈篆继任外政司司长。1913年12月，被任命为中国第一任驻墨西哥公使。墨西哥原来只有一个领事馆处理所有有关中国的事务。陈篆为国内纷乱的政局所困扰，因此对能有机会再次去西方感到高兴。然而当陈篆准备就绪即将离京时，外交总长孙宝琦请陈篆暂缓去墨西哥，代之以去参加在西伯利亚的恰克图召开的中俄蒙会议。

陈篆对此并非毫无异议，但还是接受了新的任命，担任中方首席谈判代表，出席1914年9月到1915年6月在恰克图举行的会议。陈篆力求最大限度保持中国在外蒙的地位，但由于俄蒙的反对、中国的积弱，以及日本以二十一条加于中国政府的严重压力，使陈篆所力争的要求无法实现。恰克图会议标志着外蒙的国际地位的格局到了一个新阶段。中国、沙俄、外蒙三方恰克图条约在1915年6月7日签字。条约规定外蒙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条约同时列入中俄之间协定同意外蒙在内政方面享有自治权的内容。

1915年夏，陈篆回到北京，外交部通知他，派他去外蒙古，任驻库伦（即乌兰巴托）都护使兼办事大员。陈篆对此表示不能接受，而外交部则赞扬他在恰克图谈判工作中爱国尽责，对他进行安抚，最后，他不得不去库伦。1915年9月，他到达外蒙首府，为执行恰克图条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开始进行工作。1916年7月，他成功地促使外蒙接受“宗藩”的名称，表示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但是这种在礼节上增长中国的威望，并没有对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实权带来任何有意义的增加，陈篆就在外蒙设立中国银行一事要求库伦政府予以同意，但遭拒绝。他希望调离库伦的工作岗位，经过将近一年与北京通信联系，1917年5月，他终于离职回北京。

1918年春，他在陆征祥手下当外交部次长。早在十年前出席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时，陈篆就曾与陆征祥共事。陈篆又兼任督办边防事务署外交处长，这个处专门管辖蒙古及边疆的事务。1918年，陆征祥任中国首席代表去法国参加巴黎和会，陈篆暂代外交总长。五四运动爆发，从而对外交部的压力很大。1919年6月，陆征祥免职，陈篆正式继任外交总长，但为期极短。三个月后，陆征祥复职，陈篆仍为次长。

1920年9月，陈篆被任命为驻法公使，他在法国担任中国驻法公使一直到1927年。有些留法的中国学生不满北京政府所执行的政策，陈篆是北京政府任命的驻在巴黎的代表，因此经常要对付学生的反对活动。1922年3月的一个夜晚，陈篆参加一次私人宴会后回使馆时，被一个左翼的中国学生开枪射击，但未命中。1925年6月和1927年3月先后两次，中国学生强行进入中国驻巴黎公使馆，抗议外国对中国事务的干涉。

陈篆在巴黎期间，曾于1923年和1927年担任国联中国代表。1928年他在回国前，曾任国联大会主席，并出席过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劳工会议。

1928年新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陈篆那赫赫一时的外交生涯也从此结束。他回国后，在北平闲居了一段时期，然后在上海当开业律师。1934年初他被任命为南京外交部顾问。1936年中，张群为外交部长，任命陈篆为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副主席。

1937年底南京被日军占领，1938年3月由日方成立了一个所谓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名义上由梁鸿志担任领导。由于陈篆曾担任过驻巴黎公使和国联代表，因此，他被邀担任这个政府的外交部长。从1938年起一些爱国的中国恐怖主义分子组成了一个集团，号称铁血军，专门暗杀和日本勾结的中国头面人物。1939年2月18日，陈篆由大批警卫护送，从南京到上海与家人团聚过春节。第二天，他正坐在全家共餐的首席，一群荷枪的人冲入他在上海愚园路的住宅，向陈篆开枪，陈被击中，死在送往医院途中。

陈篆保留的个人笔记，记录了他在国外的旅程，这是继承清代外交界许多前人的惯例。在题为《恰克图议约日记》中，他记录了1914—15年去恰克图谈判的旅程和经历。他的《奉使库伦日记》记录了他于1915—1917年在库伦当都护使的经历。这些都收在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止室笔记》中。

陈铭枢 字：真如

陈铭枢（1890—1965.5.15），著名的广东军人，第十一军军长，1929—1931年广东省主席，1931年十九路军总指挥。他以率领1933年福建事变而闻名。1949年投向北京政府，1957年因其为右派被共产党批判。

陈铭枢，广东合浦人，在这个广东西南的小县里出过一些地方军事首领。他出身于富裕家庭，受过基础教育。他和当时不少有志青年一样，决心从事军事生涯，进了广东陆军小学，十八岁时提拔进南京陆军中学。他在那里受到共和革命宣传影响，成了当地同盟会支部的会员。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陈铭枢随同宋教仁等革命首领去武昌。11月，他投身于广东军人姚雨平部队，这是革命军的一支部队，正在包围南京张勋的清军。12月2日南京陷落后，陈铭枢随同姚雨平部队追击张勋直迫徐州。

民国成立，陈铭枢进保定军官学校继续学习军事。1915年袁世凯称帝的意向已很明显，于是陈铭枢回广东，参加策划炸死袁世凯的亲信广东督军龙济光的活动，但因计谋泄露，陈铭枢被捕入狱，后又越狱逃往日本，在日本学习政治经济。

此后五年中，有关陈铭枢的活动很少为人所知。据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日本，有一材料说他在1917年曾回广东，那里正由广西军阀当权，陈铭枢在粤南沿海的阳江地区自建的独立营任营长。1920年后期，陈炯明为国民党夺回广州，他的参谋长邓铿组建了粤军第一师，陈铭枢任第一师的第四团团长。1921年他参加了击败广西军人的战役。1922年，陈炯明和孙逸仙关系破裂，陈铭枢左右为难乃离开部队。四团乃由陈济棠任团长。

1924年初国民党改组后，陈铭枢又回军队，在由李济深率领的粤军第一师任第一旅旅长，1925年他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东征的最后一个阶段的战役又负责救平骚扰粤东海丰地区的邓本殷的部队。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组成后，其所属部队进行全面整编。前粤军改编为第四军，由李济深任军长，陈铭枢为第

十师师长。1926年初北伐前夕，陈铭枢和白崇禧奉命去湖南劝说唐生智参加国民革命运动，此行获得成功。唐生智的支持使国民革命军的部队在北向进军时，有了一个决定意义的开始。

1926年夏，北伐开始，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留在广州守备后方基地，而第四军副军长兼十师师长陈铭枢奉命和张发奎的第十二师一起北向湖南进军。8月，陈、张部队在湖北南部汀泗桥战胜吴佩孚部队引得全国注目。

9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从湖南调第一军到江西时，令陈铭枢负责围攻武昌。10月，陈铭枢率第四军十师、十二师及唐生智的两个团攻克武昌。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汉三镇后，陈铭枢任武汉警备司令，并在邓演达手下任总政治部训练部部长。北伐进军不断获胜，国民革命军不断扩大。第四军的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陈铭枢任军长。

陈铭枢担任武汉警备司令，对唐生智在湖南、湖北日益增长的政治野心起着抑制作用。1927年初，武汉成为国民政府临时所在地后，这两个军人之间的冲突日见激烈。武汉政府和蒋介石南昌行营之间的关系日见紧张，而唐生智却和武汉共产党和国民党左翼分子联合，1927年8月，唐生智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翼分子的政治支持下把陈铭枢从武汉赶走。

当时，蒋介石的部队从南昌向南京、上海进军，蒋介石认为他和武汉的分歧已无法克服，乃在南京成立了对峙的政府。那时张发奎指挥的蔡廷锴十一军调入江西，当时共产党领导人贺龙、叶挺于1927年8月1日举行南昌起义十一军正驻在南昌地区，起义军撤出南昌，蔡廷锴被迫参加共产党部队由南昌向南撤往广东，蔡廷锴在途中设法脱离并率十一军一部进入福建。陈铭枢因蔡廷锴的呼援立刻进入福建，重任军长。

此时，共产党从南昌撤出的部队在广东溃散。张发奎回师广东，举行兵变，企图逐走李济深。陈铭枢奉李济深命率部南返，在东江地区击败张发奎，使李济深在广州重新掌权。1928年在广东的所有部队编为第八路军，李济深任总指挥。陈铭枢的权力扩大，巩固了他的军权，继续任第十一军军长，并任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委员，广东省政府委员会委员。

1928年下半年，李济深离去广东省政府主席之职，由陈铭枢继任。1929年

陈铭枢又被选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9年初，李济深和中央当局发生了一些政治上的纠纷而被监禁于南京。陈济棠趁这个机会而任第八路军总指挥，取得在广东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其权力超过了陈铭枢，而陈铭枢原是陈济棠的上司。陈铭枢仍留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他制订发展广东省经济的计划，成绩虽很有限，但他为广东的公路网的建设打下了基础。陈铭枢的十一军缩编为二个师，由蒋光鼐和蔡廷锴任师长，调往江西参加讨伐共产党的战役。这两个师不久又改编为第十九路军。

1931年5月，蒋介石拘捕元老胡汉民，预示了国民党内的严重分裂。反对蒋介石的军政首领在广州开会，决定在广州成立敌对政府。陈铭枢拒绝参加这次南方反叛，辞去了广东省政府主席的职务，离广州去香港。在香港他住的旅馆发生火灾，他从窗口跳下，腿部受伤，成了瘸子。

南京方面为了报答陈铭枢的忠诚，任命他为江西剿共军右翼军总司令，这一任命实际上是恢复了他对第十九路军的控制。

1931年9月，日军侵犯满洲，使广州和南京之间的内战危机得以避免。陈铭枢陪同国民党元老张继、蔡元培去广州劝谈，此行取得成功。国民政府1931年12月在南京改组，孙科任行政院院长，陈铭枢任副院长兼交通部长。早些时候，在1931年11月间陈铭枢被任命为淞沪警备司令，调十九路军负责警备任务。

1932年1月，十九路军在上海奋力抗击日军引起了国际上的重视。蒋光鼐、戴戟、蔡廷锴是当时的英雄人物，因为他们直接指挥了战斗，而陈铭枢也分享了荣誉，因为他是这一部队的总指挥。但是在南京怀有猜忌的最高当局对公众给予十九路军爱国立场的赞誉却并不以为然。十九路军不久就被调往福建了。

陈铭枢在广东省主席任内，特别是在上海驻守期间，已蕴育着他的个人政治抱负。1931年和1932年期间，他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小小的社会民主党，其中包括了一些在国内被称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他又出钱创办了一家出版社取名“神州国光社”，出版社会主义的书刊。据说，陈铭枢是受了武汉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思想影响，陈在1927年曾与邓演达共事。邓演达是反对南京政府的第三党首领之一，1931年11月被南京方面逮捕处死，那正是陈铭枢开始组织他那个小小的社会主义运动团体的时候。1932年下半年陈铭枢

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时，交通部所辖的民生航运公司、招商局和长江电信局的贪污案都和他有牵涉，由于这些问题，又因十九路军的业绩所引起的猜疑，迫使陈铭枢辞去交通部长职务，出国去欧洲游历。

1933年初。陈铭枢回国，他在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敦促下，决定着手进行反对南京当局的活动。十九路军在群众中依旧保持其爱国勇敢的声誉，而且陈铭枢估计了中国的总的政治形势，他发现很多人反对蒋介石扩张权势，陈铭枢认为只要他一旦决定作为先导，那末一个真正的反蒋联盟将迅速得到多方面的响应。

陈铭枢同他准备争取作为同盟者的一些对象进行初步接触，结果令人相当满意，于是他在1933年11月决定行动。反对南京当局的福建事变乃于1933年11月20日爆发，第二日在福州成立了人民政府，李济深任主席。福建起事人公开谴责蒋介石的政权，并提出政纲号召抵抗日本侵略和成立民主政府。陈铭枢等人希望以抗日的口号使他们反对南京政府的运动得到普遍支持，因为南京政府当时正和日本进行不得人心的和谈。李济深实际上是福建政府的挂名首脑，而陈铭枢则是主要的组织者和决策人。十九路军的一些领导人虽然支持，但有些人，例如蔡廷锴显然并非心甘情愿。福建事变还吸引了少数国民党的反对派，如陈友仁、徐谦，以及第三党的一些领袖人物如章伯钧、黄琪翔。但是陈铭枢所想要达到的目的超过了他的实际基础，福州新政权未能获得重要的外界支持。事实上，由于福建政权否认三民主义，又在公共场合取走孙逸仙像，因此，不仅他们与广州的反对南京势力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堵塞了，反而引起了他们的反对。南京方面立即采取行动镇压福建事变，1934年1月中旬，福州政府瓦解，它存在了不到两个月。

陈铭枢和参加福建冒险行动的几乎所有的领袖们一起逃到香港，陈铭枢在那里住了三年。1935年李济深发起组织一个新的称为人民革命同盟的政治团体，再次申言抗日的主张，陈铭枢也参与此事。

1936年，陈铭枢又去欧洲游历。1937年夏中日战争爆发后，陈铭枢和其他一些国民党反对派领袖回国。国民党下令，恢复因政治原因而被开除出党的所有党员的党籍，国民政府则宣布对以前的反对派予以政治赦免。但是陈铭枢由于他在福建的不幸事件中起主导作用，因此在战争期间从未对他有过什么重要

的任命。而他很多的昔日友伴如李济深、蔡廷锴等人都曾在战时至少一度担任过前线重任。

陈铭枢在抗日战争中长期默默无闻，加剧了他对国民政府统治集团的不满。1944年，他和共产党的脱党分子前第三党首领谭平山一起在国民党内活动着手组织一个反对派集团。1945年在重庆正式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会”，鼓吹恢复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逸仙提出的政纲。日本投降后，陈铭枢住在南京，办了一所家禽养殖场，他在上海充当李济深的私人代表。

1949年秋，陈铭枢出席了共产党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新政府。他以三民主义同志会代表身份出席1949年九月会议，但是他在三民主义同志会组成的出席会议的代表团中，名列谭平山之后。1949年10月他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先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及交通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三民主义同志会后来并入李济深担任主席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陈铭枢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委。

在新政权成立初期，陈铭枢也是佛教界的一个活跃分子，他参加了中国佛教协会的筹建工作。他象不少中国人一样，长期信奉佛教，自号“真如”，可见其对佛教的虔诚，这是一个佛教徒的称号。陈铭枢在不得志时常常寄身于研究佛学，如抗战时在重庆，据说他受教于著名佛学家欧阳竟无的门下。但在北京成立中国佛教协会后，陈铭枢并没有积极参加其活动。

陈铭枢在新制度下的命运也并不愉快。他比他以前的同僚蒋光鼐、蔡廷锴等人有更多的政治兴趣和野心。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他成为全国批判的主要对象，谴责他从事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活动。在1957年7月14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他受到严厉批判，指控他曾发表诽谤毛泽东的言论。对他进行严厉批判的有他旧日的密友如李济深、蔡廷锴等人。1957年7月15日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陈铭枢作了全面的“检讨”，那时他已年近七十了。他的右派帽子到1963年初才摘掉。

1965年5月15日，陈铭枢在北京去世，终年七十六岁，官方的《人民日报》底页登载了简短公告，仅仅提到了他是政协全国委员，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他的治丧委员会由何香凝主持，有张治中、邵立子、王昆仑等人参加。

陈璧君

陈璧君（1891.11.5—1959.6.17），汪精卫的妻子，主持日汪政府，一直到汪精卫死后。1946年，她以叛国罪被判监禁终身。

陈璧君的幼年经历不详，原籍广东新会，她出生在马来亚槟城，她家经营橡胶。她家里的家产并无确实估计，但总之是一个富裕家庭。她的一个兄长和一个堂兄都是受英国教育的辩护律师。

1908年，孙逸仙和他的密友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到马来亚，计划在那里扩大同盟会组织以促进反满革命事业，同盟会是两年前在东京成立的。当时才十几岁的陈璧君为孙逸仙的事业所吸引，并看中了汪精卫的美貌和仪表。汪精卫回日本时。陈璧君带了一些钱，离家伴同汪精卫去日本。陈璧君的父亲与当时的革命者并无密切联系，显然，陈璧君的去日本未经她父亲的同意，但她母亲却一直支持她。

孙逸仙同意陈璧君参加同盟会的活动，指定她留在东京总部。同盟会经济上的需要，陈璧君力所能及的给以支助。当时同盟会在经济方面相当困难而又很少办法，所以陈璧君的支助很受欢迎。陈璧君、何香凝、秋瑾是同盟会中三个著名妇女会员。陈璧君与汪精卫在日本时友情日深，1910年她随同汪精卫和其他人到北京，执行暗杀清朝摄政王的秘密使命。第一次因密藏的炸药被发现失败了。陈璧君离中国去马来亚募捐，汪精卫同另一人仍留在北京。1910年8月，汪精卫和他的一个同伴再次密谋刺杀摄政王，在摄政王将要路过的桥下放置炸弹。密谋不慎计划失败，巡警在北京全城搜查，4月间将汪精卫逮捕。

汪精卫谋刺摄政王失败的消息传出时，陈璧君和胡汉民正在马来亚，他们估计汪精卫可能被处死刑。后来传出他被判监禁终身，陈璧君和胡汉民当即会同其他同盟会会员在槟城陈璧君的家里商量营救办法，陈璧君的母亲拿出她全部私房钱供营救之用。1911年初，陈、胡到香港继续设法营救汪精卫，但无结果。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在广州举行，陈、胡等人赶去参加，但当他们到

达广州时，黄花岗起义已经失败了，陈、胡等人马上返回香港，胡汉民和其他人等则躲在九龙的陈璧君家中。

武昌起义后约两周多，1911年10月27日，北京当局释放了汪精卫。汪于是南下去上海，12月25日在上海会见了从欧洲、香港回国的孙逸仙。

1912年民国成立的前夕，汪精卫和陈璧君结婚，何香凝当陪娘。据报道结婚典礼在1月1日举行。婚后，夫妇两人去欧洲蜜月旅行。第一次大战期间，他们在法国，很少参与国内的政治活动。他们于1917年下半年回国，投身于孙逸仙。当时孙逸仙在广州领导一个反对派的军政府并筹划重整独立的军事力量。此后七年中，汪精卫是孙逸仙的亲信随从之一，但陈璧君并无显要地位。1923年，广州设立一所纪念1920年被害的革命烈士朱执信的学校，孙逸仙派陈璧君和她的弟弟空军军官陈昌祖去美国向华侨募捐。1924年黄埔军官学校成立后，据说陈璧君典卖首饰以充该校经费。1924年11月，她是陪同孙逸仙最后一次北上的随行人员之一，1925年3月孙逸仙逝世前不久，汪精卫代拟孙逸仙政治遗嘱时，她也在场。

孙逸仙逝世后，汪精卫仍是一名全国重要的政界人物，以后1932年到1935年间在南京任行政院院长。在此期间，陈璧君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但是，当日本在1937—1938年开始入侵中国时，蒋介石进一步巩固他作为国民党和全国领袖的地位，汪精卫在国民政府中的个人权力更是有名无实了。

汪精卫决定离开国民政府而在日本的卵翼下成立另一个政府，动机何在还值得推敲。不论其原因如何，而汪精卫的去到南京，在陈璧君的一生中开始了新的一页。在日汪合作期间，特别在1940年后，陈璧君奔走于广州、南京之间。她由日汪政府任命为广东省政务长，这个职务持有该地区的最高权力，其权力超过该省省长。这个情况引起了汪政权内部的小小矛盾，因为从此以后的历任广东省长都与陈璧君有裙带关系，起先是她的弟弟陈耀祖，接着是她的侄儿陈春圃，1945年日本投降前几个月中是她的姊夫褚民谊。陈璧君耽在广州便于与日本军事当局打交道，日本军事当局对这个汪精卫的老婆至少在表面上另眼看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璧君设法把胡汉民的遗妻和女儿以及几名医生从香港弄到中国大陆。

汪精卫为几年前枪伤所苦，1944年3月他不得不到日本去医治，11月10日死在那里。临死时陈璧君及其幼子在旁。那时，战争结局已日见分晓，一些知心明友劝陈璧君退出政治舞台，她的侄儿陈春圃拒而不当广东省长。陈璧君却认为日汪政府的头目倘弃离职守，那末日本一旦失败，他们在离中国之前，必将在其占领区对中国人大肆泄愤，因此他劝褚民谊当广东省长并亲临广州督导。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她在广州。8月底，陈璧君、褚民谊被拘捕。1945年11月她被关押到南京。1946年她被转解到苏州，那里关押着不少日伪政府的头面人物。

4月16日提审陈璧君并以叛国罪起诉。这次审判全国极为注意。在她的证词中，陈璧君强调汪精卫的忠诚爱国并认为和日本和平相处是保存国家利益的唯一现实办法。她拒不承认汪精卫有任何错误，亦拒不承认汪精卫是卖国贼。她辩解说汪精卫政府并不比重庆的蒋介石政府丧失更多国家利益。虽然她的申辩得到同情，但是当局更关心的是应该予以惩罚，而并不是予以谅解。1946年4月23日被判监禁终身，在苏州服刑。

三年后，1949年春中国共产党军队横渡长江前夕，国民政府作了前所未有的紧急决定，判有期徒刑的投日犯全部释放，判终身监禁的则移送到上海华德路监狱关押。陈璧君移送到上海监狱，在1949年落入共产党的监管之下。新的政府当局在统治稳定之后，有两位著名的妇女准备为陈璧君说情，她们是宋庆龄和何香凝。共产党坚持要求陈璧君发表公开悔过声明，然后才能释放。陈璧君拒不接受乃继续监禁。1959年3月她因病移送到狱中医院，陈璧君在汪精卫死了约十五年，她自己被监禁了十四年之后，于6月死去。陈璧君在国内没有亲人，她的尸体火化，骨灰由上海运到广州。1960年初经共产党当局批准，她的骨灰送到香港，在那里开了追悼会后把骨灰投入海中。

陈璧君是一个性急、粗暴而又果断的妇女，她结婚后，一直对汪精卫发生很大影响。她的私财在家庭中也起了重要作用。陈璧君和汪精卫遗有五个孩子，两男三女，有一个女儿是天主教修女。他们全都住在国外。

说 明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自1973年12月出版《大事记》、《人物传记》第一辑以来，陆续按《大事记》、《人物传记》、《专题资料选辑》等门类，累计发行三十四辑。为便于读者使用本刊，编印凡例做了重要改动并将本辑以前出版的《丛稿》列表如后，供读者参考。

《丛稿》编辑组感谢为本刊提出改进意见的同志们。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编辑组

1980.2

《丛稿》门类	辑次 (内容)	发行时间	
大事记	序编 (1905.8—1911.10)	1978. 1	
	第一辑 (1911.10—1912)	1973.12	
	第二辑 1913年	1975. 8	
	第三辑 (1914年、1915年、1916年)	1975. 8	
	第四辑 (1917年、1918年)	1976.11	
	第五辑 1919年 (民国八年)	1978.12	
	第六辑 1920年 (民国九年)	1978. 7	
	第七辑 1921年 (民国十年)	1978. 1	
	第八辑 1922年 (民国十一年)	1979. 7	
	第十一辑 1925年 (民国十四年)	1978. 8	
	人物传记	第一辑	1973.12
第二辑		1975. 4	
第三辑		1976. 6	
第四辑		1977.10	
第五辑		1978.11	
第六辑		1979. 5	
第七辑		1979.11	
专题资料选辑	第一辑 《中国社会党》等	1976.11	
	第二辑 《清末新军编练沿革》	1978. 5	
	第三辑 《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	1978. 3	
	译稿	第一辑 《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	1978. 6
		第二辑 《史迪威资料》	1978. 2
		第三辑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第一分册	1979. 6
		第四辑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一分册	1979. 7
		第五辑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一分册	1979.10
		第六辑 《马歇尔使华》(一)	1979. 7
		第七辑 《汇丰——上海香港银行》	1980. 1
		第八辑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第二分册	1980. 2
	增刊	第一辑 《孙中山年谱》(上)	1976.11
		第二辑 《孙中山年谱》(中)	
		第三辑 《孙中山年谱》(下)	
		第四辑 《李公朴先生年谱》等	1978. 3
第五辑 《黄炎培日记摘录》		1979. 1	
第六辑 孙晓村等回忆录、罗隆基日记		1980. 1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稿 第八辑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二分册)

作者=(美)包华德主编 沈自敏译

页数=116

SS号=11004758

出版日期=1980年02月

出版社=中华书局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张道藩

张作霖

张宗昌

章宗祥

张资平

张元济

赵尔巽

赵恒惕

赵元任

陈诚

陈济棠

陈其美

陈嘉庚

陈锦涛

陈庆云

陈炯明

陈友仁

陈衡哲

陈光甫

陈公博

陈果夫

陈立夫
陈篆
陈铭枢
陈璧君
编者说明

目录